

炎黄春秋



宋耀如(三排左)一家。二排右为宋庆龄

抗战前夕陈立夫秘密赴欧之谜

**在首都建设规划上敢于
持不同意见的陈干**

**于光远：我在中宣部工作时
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知青上山下乡引发的思考

从姚文元的札记看

“四人帮”覆灭前的罪恶心态

宋氏三姊妹的父亲宋耀如传奇

从战犯到居港爱国作家蔡省三

1997

9

总第66期

纪念建军70周年暨《将军世纪行》首映座谈会在京举行



1997年7月26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上海东方电视台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举行纪念建军70周年暨电视片《将军世纪行》首映座谈会。中央军委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副主席及萧克、李德生等50多位老将军、老战士出席。萧克同志在讲话中指出：要继承和发扬南昌起义所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不避艰险、不怕牺牲、不屈不挠地同反动势力斗争，坚定不移地向革命目标前进的精神；失败了总结经验继续奋斗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的时代精神。

萧克同志强调，一定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我军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会上放映了《将军世纪行》第一集：《八一枪声》。

(王科元)



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萧克、李德生在座谈会上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镗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徐 孔 洪 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陈崇保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
戏楼胡同 1 号

邮编: 100007

电话: 64072452

64031144 转 2191 或 2004

印刷: 河北省丰润县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M

出版日期: 每月 8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 4.00 元 零售价: 5.00 元

目 录

春秋笔

- ②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
中国丧失一次联苏抗日的机会
——试解抗战前夕陈立夫秘密赴欧之谜 奎 松
- ⑩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引发的思考 辛 平
- ⑱ 邓小平授意创办《思想战线》
被“四人帮”扼杀经过 邢方群
- ⑳ 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于光远

明星篇

- ⑳ 在香港开辟“反蒋第二战线”的方方 张开明
- ㉔ 我的爸爸刘伯坚与宁都起义 刘 豹
- ㉔ 在首都城市建设规划上
敢于坚持不同意见的陈干 郑天翔

时代风

- ㉔ 赴港观礼归来随想 柯 华

遗闻录

- ㉔ 从姚文元的札记看“四人帮”覆灭前
的罪恶心态 李耐因

赤子心

- ④① 老报人顾执中两次避难香港 刘小清

同心结

- ④⑤ 从战犯到居港爱国作家的蔡省三 吴 琼

人海浪

- ⑤① 九旬重新入党的传奇老人傅柏翠 许人俊
- ⑤⑦ 宋氏三姊妹的父亲宋耀如传奇 解力夫

文荟园

- ⑥④ 用毕生精力探索民族音乐的安波 白 岩
- ⑥⑦ 解放前夕《闯王进京》演出回忆 田 奇 李 犁

九州景

- ⑦① 摩梭人母系家庭的待解之谜 吴 象

古今谈

- ⑦⑥ 明清社会礼大于法造成的冤案 杜婉言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

中国丧失一次联苏抗日的机会

——试解抗战前夕陈立夫秘密赴欧之谜

● 奎松



抗战之前
的陈立夫

陈立夫欧洲之行留下秘密

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南京政府出于反共需要，断绝了与苏联政府的外交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注意到“倭寇之所最忌者为我联俄”，因此事变发生几天后，南京政府外交部就指示正在莫斯科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莫德惠，以个人名义向苏联方面非正式地探询恢复中苏外交关系的可能性。

1932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作出与苏联复交的决定，并由在日内瓦出席国际军缩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颜惠庆同苏联代表李维诺夫秘密商谈。这年的12月12日两国正式复交。据蒋介石日记称，这是他计划中的对日“第一打击”，他计划进一步利用同苏联的关系来制约日本，即所谓“总以与俄有关系之点，研究打击方法，先使其精神受胁迫然后再与接洽”。

但是，出于对苏联与中共的恐惧，在此后的几年里，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同苏联的关系并没有大踏步的改善。直到1934年夏，国民党对南方红军根据地的围剿全面得手，蒋介石这才选派力主联苏抗日的历史学家蒋廷黻前往莫斯科，“联络其感情”。然而到这个时候，日本的侵略与蚕食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弄出一个伪“满洲国”尚嫌不足，又公然策划制造所谓的“华北国”。蒋介石南京政府已退无可退。在这种情况下，联苏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从南京政府到舆论中人，许多人都盼望推动苏联对日本开战，至少也要同中国并肩对日作战。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南京政府政要中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旧对苏联出兵寄予热望。结果当然是一厢情愿。

不过，如果我们深入到当年中苏交涉的秘

密档案中去，我们会发觉，早在抗日战争爆发的一年半前，中国未必没有与苏联结为军事同盟的可能性。对此，主要当事人之一的陈立夫几十年后在他前后出版的中文的和英文的回忆录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谈论他1935年底至1936年4月间的这段神秘经历。陈立夫明确告诉读者，当时蒋介石给他的任务就是到苏联去“商讨军事同盟”问题。令人奇怪的是，陈立夫此行无功而返，直到两年之后，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之际，中苏两国政府才最后订立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即两国之一在与第三国发生战争时另一方必须保持中立；这样一个绝非是什么军事互助和军事同盟的条约。

南京政府从1935年底就开始派人去苏联“商讨军事同盟”，为何两年后只是这样一个结果呢？概括陈立夫几次回忆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问题全都出在苏联方面。据陈立夫说，这首先是因为苏联大使当初建议他“以蒋先生的私人代表的身份去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时，苏联方面对谈判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因此，蒋介石给陈交待访苏任务时，也只是要他第一步力争与苏联谈判结盟，次一步则谈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其次是因为他赴欧后停在柏林等待苏联政府批准入境，斯大林犹豫不决，以至日本报刊开始风传陈立夫秘密赴俄寻求中苏结盟，使苏联方面担心他的使命可能泄露，更加不愿其入境，迁延三月之后，蒋介石不得已而将其召回。

但是，陈立夫的上述解释有些不合情理。首先，中苏谈判既为政府间事，陈立夫赴苏自然必须得到苏联政府的同意或邀请。且条约谈判本应由两国外交人员出面，苏联方面同意南京政府派出负责党务工作的陈立夫前往，自然应当了解中方用意，它怎么会对谈判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其次，既然谈判得到过苏联政府的同意或邀请，它又怎么会毫无理由地让陈立夫在柏林白白“蛰居”几个月？除非其中另有情节，否则苏联人不可能不了解，陈立夫在欧洲呆的时间越长，其使命也就越容易泄露。

显而易见，蒋介石当年秘密遣陈立夫赴欧洲，后又悄悄召陈返国，这确实是一个让人费解的谜。其中真相，也许作为密使的陈立夫本人也

并不十分清楚。因为策划和操纵者是蒋介石。要了解事实真相，还要借助于近年来俄国公布的前苏联的各种档案资料。

蒋介石亲自出马要求结盟

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的想法，是南京政府提出来的。蒋介石下决心要争取与苏联缔结军事互助协定，从莫斯科外交档案上看，应该是1935年7月初的事。当时，正是日本制造华北事变，逼迫南京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放弃对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实际控制权的关键时刻。1935年7月3日，在蒋介石授意下，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秘密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缔结中苏两国军事互助条约的问题。他声称，日本军队已经在察哈尔安营扎寨，并要求往河北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派遣日本顾问，它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准备迅速渗透绥远，然后开始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因此，日本军队的这一行动，不仅是对中国的侵略，而且也是明目张胆地威胁苏联的安全。在做了如此这般的说明之后，孔祥熙郑重地提出：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恐怕只有中苏两国共同合作，才有可能制止日本人的进一步扩张了。“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

鲍格莫洛夫显然没有想到孔祥熙会提出这样一种建议。自1932年底两国复交以来，南京政府就一直在同苏联谈判互不侵犯条约问题和贸易协定问题。由于蒋介石力图通过互不侵犯条约来约束苏联同中共的关系，阻止苏联插手外蒙古和新疆的事务，而苏联始终怀疑南京政府极力对日本妥协意在鼓励日本北进，只是拿对苏交涉作为压迫日本让步的一种筹码，因此双方一直未就互不侵犯等谈判达成谅解。想不到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尚未得出结果，孔祥熙竟然又提出互助条约的问题来，这自然让鲍格莫洛夫感到惊异。

孔祥熙夜访苏联大使馆之前，代理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已经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所谓《秦土协定》，承认中国军

队撤出察省主要地区；孔祥熙夜访之后仅三天，作为南京派驻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又正式签字承认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提出的所谓“备忘录”，放弃对河北及平津地区的控制权，即所谓《何梅协定》。但是，南京政府中人很清楚，日本人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此。1935年9月24日和10月4日，日本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以及日本外、陆、海三省相继发表“多田声明”和“对华政策三原则”（即广田三原则），公开表明了必欲分离华北的意图。面对这一严峻形势，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向苏联求援了。

10月17日晚，孔祥熙再度不打招呼迳直来到苏联大使馆，告知鲍格莫洛夫说，明晚蒋介石希望能够在孔的宅邸与大使单独会晤。

18日晚，鲍格莫洛夫如约抵达孔宅，在等待蒋介石到来的时候，孔祥熙显得有些焦虑不安。孔祥熙很神秘地告诉鲍格莫洛夫：日本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坚持要签订反苏的军事协定。因为日本人说，不稳住中国战场，他们就不能对苏开战，所以日本必须在华北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政府，他们不相信蒋介石。日本人说如果蒋介石同意缔结军事同盟，那么他们就不反对南京对华北诸省的主权，否则，他们扬言要“捣毁”南京政府。

这次会晤十分秘密，除了蒋及鲍大使之外只有孔祥熙一人在场兼作翻译。

鲍格莫洛夫首先向蒋说明了苏联政府的立场，表示愿意根本改善两国关系，但仍主张要通过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来达到这一目的。

蒋介石回答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定将改善中苏关系，因为如果两国都受到威胁，那威胁来源是共同的。缔结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是必要的，但问题是，这些条约都只是表面性的，希望中苏之间能够有一个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

鲍格莫洛夫问：您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协定？

蒋答复说：我国与苏联之间应该有一个“非表面性”的协定。实际上我们希望在下列两个问

题上得到苏联政府的回答：第一，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订一个多少能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我要强调的是，我在这里不是以中国政府代表的身份，而是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来提出这一协定的。第二，如果苏联政府给予肯定的回答，那么我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什么样的想法。

鲍格莫洛夫很清楚蒋介石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暗示的这个“非表面性”的协定是什么。但他很怀疑仍在对日妥协的蒋介石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因此，他没有回答蒋介石的话，反而问道：是否有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和缔结反苏军事同盟的事情？

蒋答道：日本政府并没有正式提出这些要求，只是非正式地提出了第一个要求，至于第二个要求，问题是笼统提出的，没有指明苏联，只是要求结成反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同盟。

鲍格莫洛夫强调：您能够了解，我所感兴趣的不是泛指的布尔什维克，而是苏联。

对此，孔祥熙答道：应该认为，从日本的观点看，这样提出问题是包括苏联在内的。

鲍格莫洛夫接着问蒋介石：那么，如果日本政府一味要求中国政府缔结反苏军事同盟，中国政府将持什么立场？

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绝不会同意这样的建议。

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来提出这样的要求，清楚地显示出华北事变的发生给了蒋介石强烈的刺激，南京政府的对苏政策因此有了重要的变动，它异常迫切地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

苏方通知：不反对 与南京缔结互助条约

蒋介石亲自出马要求结盟，引起了莫斯科的重视。

莫斯科这时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也非常紧张。这是因为，日本是俄国的宿敌。除了1904年沙俄在旅顺战败，耻辱地把它在南满势力范围拱手交给了日本人这一痛苦的记忆之外，1918年以后日本乘苏俄新政权无力东顾，不仅把自

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了北满，而且进兵苏俄的远东地区达数年之久。此后，日本始终利用它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地位，虎视眈眈地窥视苏联的远东，经常不断地通过张作霖和张学良给苏联制造麻烦。自从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之后，它更进一步沿着外蒙古边界夺取中国的热河省，蚕食察哈尔省，染指绥远省，企图建立“华北国”，一方面要求南京与其缔结反苏军事协定，一方面大力在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修筑飞机场。所有这些举措，都不能不使莫斯科感到严重忧虑。

在近两个月时间里，苏联政府对各方面的情报反复研究之后，苏联政府对蒋介石的建议作出了比较积极的反应。苏联外交部向鲍格莫洛夫发出秘密指示，明确地答复说：“苏联政府不反对（缔结军事互助）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详情待函告。请将上述内容告知蒋介石。”

在苏联政府由外交信使传递给鲍格莫洛夫的具体指示中，进一步说明：苏联政府相信有必要支持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主战派，如果中国确实投入抗日战争，我们准备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援。尽管，指示中对蒋介石是否仍然想在与日本的交涉中打苏联牌持怀疑态度，但它明确要求鲍格莫洛夫告诉蒋介石：“我们同意蒋介石关于合作互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即“苏联政府愿意就他提出的以互助抗日条约的形式签署一个条约”。

1935年12月19日，蒋介石在孔祥熙陪同下与鲍格莫洛夫共进早餐时得知上述消息，十分高兴，当即表示了对苏联政府的感谢。并且急切地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得知苏联政府对于这一谈判的详细复文？

在谈话当中，蒋介石似乎是顺便问起鲍格莫洛夫近日与国民党中委陈立夫以及南京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见面的情况。他特别问道：邓文仪是否向你讲起了希望会见加伦将军（即布留赫尔）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协助安排这一会晤。谈到这位曾经在20年代作过他的顾问，亲自参与策划和指挥了北伐战争的苏联将军时，他显得颇动感情，说：每当忆及加伦将军对我国的帮助时，我的感激之情总是油然而起。不难看

出，蒋介石在这里是暗示希望能够与加伦将军再度共事。

就在蒋介石这次会见鲍格莫洛夫的两天之后，邓文仪就受命赶回了莫斯科。几天后，陈立夫化名李融清，携俄文翻译张冲，化名江淮南，以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员身份为掩护，也赶赴欧洲，准备转道柏林，前往莫斯科。显而易见，这些举措都是对苏联方面赞成两国进行军事互助条约谈判的积极反应，陈立夫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派去莫斯科进行此项谈判的秘密代表。只不过，蒋介石似乎没有将陈立夫动身之事正式通知苏联大使，他也不想让陈立夫直赴莫斯科，而有意要他绕道欧洲，在柏林停留，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寄望于莫斯科压迫中共屈服

蒋介石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只要认真研究一下蒋介石1935年12月19日与鲍格莫洛



逃到台湾后的陈立夫（右）与蒋介石

夫的谈话内容，就不难找到答案。

在这天的谈话中，鲍格莫洛夫一上来就向蒋介石转达了苏联政府关于愿意与南京具体谈判军事互助问题的决定。对此，蒋介石表现得很高兴。然而，他并非无意地提起了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蒋介石说，我希望能够与你就中苏一般关系交换一下看法。你一定了解1923年1月的《孙文越飞宣言》吧？我认为我们需要以这一宣言来作为这种关系的基础。蒋介石所以提出《孙文越飞宣言》的目的，是要求苏联重申他们赞同宣言中关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承诺，并以此规范苏联的对华政策。然而，鲍格莫洛夫没有表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他简要叙述了苏联方面的观点，强调说，苏联拥护中国的政治团结和经济稳定，因为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将是远东和平的最主要因素。

蒋介石怀疑鲍格莫洛夫并没有真正领会他的意图，因此进一步强调说：我认为，必须把《孙文越飞宣言》作为中苏关系的基础。我很遗憾，过去中苏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误会，特别是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问题，苏联方面有所误解。其实，我决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且相信共产党像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但是，共产党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我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对此我也很遗憾。今天，我很高兴从你这里听到苏联支持建立统一的中国的消息。我相信，只有中国达到统一，才能保证顺利抵抗外国侵略。没有统一，中国将永远也不会强大。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中国统一，那是再让人高兴没有的了。

鲍格莫洛夫表示：我同意您的说法，没有政治上的统一，中国就不能抵抗外国的侵略。我可以再一次重申，既然您有稳定远东和平的愿望，我们将欢迎中国得到统一。

从上面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可能同苏联建立军事互助同盟的前景其实是又喜又忧。喜的是他竟然能够说动苏联与之联手对日，忧的是中苏结盟苏联会不会继续暗中支持共产党。因此，他刚一得到苏联同意讨论军事互助条约的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提醒苏方，苏联政府

务必要遵守当年在《孙文越飞宣言》所承诺的内容，不能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很明显，几年来在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如今依旧制约着蒋介石的政治思维。他无论如何不放心苏联与中共之间的关系，担心中苏之间的接近可能给他带来严重的不利的政治后果。

中国共产党问题毕竟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被迫联苏抗日，并不等于他准备把中国共产党问题搁置一边。恰恰相反，自决定联苏之日起，蒋介石就在寻找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的办法，除了坚持要苏联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不得支持中国共产党以外，他这时已经明确提出了“政治解决共党问题”的设想。希望通过政治的方法，使中国共产党彻底放弃武装对抗的政策，服从南京政府。

蒋介石关于“政治解决共党问题”设想的提出，实际在他得到苏联政府愿意讨论军事互助问题的答复之前。前苏联档案显示，大约在1935年11月底12月初，蒋介石已经从回国述职的邓文仪那里得知消息，共产国际刚刚在莫斯科召开过第七次代表大会，重提统一战线政策，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已公开发出呼吁，要求中国不分党派团体，共同建立全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组成抗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蒋介石因此要求邓文仪将有关材料找来并译成中文。蒋读后，颇感兴趣。联系到苏联受到日本威胁的情况，蒋介石确信，这件事很可能是莫斯科看到中国苏维埃革命遭到失败，而日本进攻加剧，因而要求中共妥协的一种信号。为此，蒋介石很快召集陈立夫及其CC系骨干，明确提出“政治解决共党问题”的意图，亲自部署寻找中共关系，争取与军事上处于绝境（此时红军正陷于分裂中，一方面军4000余人刚刚到达偏僻的陕北地区，人数较多的四方面军则进入了更偏僻的西康地区）的共产党订立城下之盟。与此同时，他还不失时机地要邓文仪与陈立夫前去拜会鲍格莫洛夫，一方面打探苏联政府的确实意图，一方面透露南京政府有意政治解决中国共党问题的积极态度。同时，蒋介石要求邓文仪不等过春节，立即于21日从上海动身赶回莫斯科，利用

邓与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的关系，与王明就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可能性进行接触。

显然，1935年12月19日蒋介石听了鲍格莫洛夫一再表示“苏联拥护中国的政治团结”，“欢迎中国得到统一”的谈话。使他对苏联支持他政治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有了更多的幻想。在鲍格莫洛夫告诉他，1936年1月8日前后即可收到莫斯科有关谈判的具体指令之后，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命令陈立夫迅速准备秘密绕道欧洲，一面就近指导邓文仪与王明的谈判，另一方面准备在邓、王谈判取得接近之后，立即开始与苏联政府接洽讨论军事互助条约问题。

蒋介石所以选派自己的亲信、CC派头子、既无外交经验、又无军事经历的陈立夫去苏联谈判如此重大的两国军事互助问题，清楚地反映出他首先看重的其实并不是缔结军事条约的具体方式和技术问题，而是这种结盟的政治后果问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问题。在蒋介石看来，苏联政府同意与南京政府商谈军事互助条约问题，自然是建立在它承认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政府的基础上的；既然苏联赞同由南京来实现中国的统一，那么它出面说服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统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问题应当可以在莫斯科迎刃而解。

但是，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仍旧多留了一个心眼儿。他这时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由邓文仪首先在莫斯科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谈判，在达到预期目标后，第二步再由陈立夫出面与苏联政府秘密商洽军事互助问题。后者须视前者的结果为转移。这说明，蒋介石在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关于支持他政治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的确实承诺，和与中共取得正式妥协之前，他并不准备立即与苏联政府缔结军事协定。

陈立夫、邓文仪不明所以

邓文仪是在1936年1月3日到达莫斯科的。直到1月13日，他才同中共代表团的代表潘汉年见了面。随后，从1月17日到2月23

日，邓文仪与王明总共进行了四次具体的商谈。从保存至今的这些谈判纪要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得知陈立夫到达柏林后的一些情况。

根据1月13日和17日的谈判纪要，邓文仪清楚地讲述了国民党在国内是如何寻找共产党进行接触的，和他这次来莫斯科的具体使命。邓说：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到王明先生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用去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曾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找红军谈判，但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后蒋先生看到王明先生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即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

从1月17日邓文仪与王明的第一次正式谈判时所讲述的情况看，邓文仪看来并不知道陈立夫已经到了柏林，蒋介石似乎还无意要陈立夫立即介入谈判。从谈话的内容看，邓文仪这时的态度相当积极。他除了代表蒋介石提出在中国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条件以外，突出强调了国共两党合作和联苏抗日的愿望，因此，尽管中共代表王明对南京方面的条件并不赞成，仍旧明确表示愿意谈判。只是王明提出，由于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均在国内，因此，两党谈判应当也只能在国内进行。对此，邓文仪也当即表示赞成。

1936年1月22日，双方进一步谈判时，邓文仪明确告诉王明，他已经收到蒋介石的来电，同意他和中共代表一同返回南京进行谈判。根据双方当天商定的办法，决定中共代表团以潘汉年为代表，由邓文仪陪同，于25日从莫斯科动身前往海参崴，然后乘船经上海去南京进行谈判。

但出人意外的是，就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即1月23日，邓文仪突然求见王明，说蒋介石

来电要他取消同中共代表同去南京谈判的计划，马上改去柏林见李融清，准备参加李融清所进行的谈判。据邓文仪声称，李融清不仅负责与苏联的谈判，而且还要直接参与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的谈判。而蒋介石也明确要求，必须首先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达成协议，再拿着协议到国内苏区去签字。

邓文仪没有告诉王明究竟谁是这个神秘的“李融清”。不过，事实上他也没有能够在柏林见到这个“李融清”，更不要说去参加由这个“李融清”在柏林主持的对苏联谈判了。20年后邓文仪回忆说，1936年2月他接到蒋介石的电令以后就急匆匆赶往德国柏林，“等候会见我国派赴欧洲的高级代表，……会商重要外交问题”，可是一连几天也未见到这位高级代表。在柏林会同南京驻欧洲各国武官开了五天会之后，他才又接通知说他可以前往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会见这位代表，“但在布达佩斯住了三天之后，仍未得到消息，第四天我在一家书画店买画，刚巧遇上陈立夫先生也在那里买画”。

邓文仪对这次经历的疑问直到20年后都找不到答案。无独有偶的是陈立夫几乎也有大同小异的回忆。据陈立夫回忆说，蒋介石这时也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说，赴苏时机尚未成熟，命令他离开柏林到欧洲其他国家去走走。于是，他带上张冲，两个人开始了十分惬意的欧洲旅游。只是数日后得知邓文仪到了柏林，他才通过驻土耳其大使贺耀组，通知邓到布达佩斯见了一面。至于所谈，已与中苏谈判和国共谈判没有太多关系了。

蒋介石突然决定中断上述谈判的原因呢，是否如陈立夫回忆所说，是苏联政府拒绝南京政府的代表前往谈判呢？否！历史资料表明：邓文仪接到蒋介石要其停止与中共代表谈判，改赴柏林电令的当天，鲍格莫洛夫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明确告诉蒋介石：苏联政府“愿意随时给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代表去莫斯科的签证，不管他前去的目的如何”。蒋介石反而当晚打电报要邓文仪停止与中共谈判，接着又告诉陈立夫对苏谈判时机尚未成熟，要其离开柏林。

这一情况表明，蒋介石这时（1936年1月）的态度与一个月前已经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为“剿共”得不偿失

仅仅一年半之后，1937年7月日本就开始了大举进攻，中国被迫应战，从此进入到八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如果在此之前，南京政府能够同苏联谈判结盟，那么整个形势就有了另一种可能。中苏若结盟，首先日本大举入侵中国就不能不考虑背后苏联出兵的危险，其次即使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方面也有理由要求苏联提供更大规模的直接的军事援助，以遏制日本的军事推进，减少中国的损失。

蒋介石突然决定放弃这一千载一时的外交机会，实际上是蒋介石1936年1月22日与鲍格莫洛夫谈话的结果。

这一天，蒋介石再次在孔祥熙的宅邸会见了鲍格莫洛夫，听取鲍格莫洛夫传达莫斯科复文的主要内容。但是，在鲍格莫洛夫花了将近20分钟说明莫斯科复文内容之后，他敏感地注意到蒋介石的反应相当冷淡。当他结束介绍，转而询问蒋介石如何解释日本报纸有关南京方面已经表示接受“广田三原则”的消息时，蒋介石完全是答非所问。

这次会见总共进行了两个小时，除了鲍格莫洛夫占用的不足20分钟以外，其他大部分时间几乎都被蒋介石占用了。蒋介石的话题几乎就是一个：苏联必须劝告中共服从南京政府。蒋介石不厌其烦地说明：“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那时中国政府就能抗日了”。

鉴于蒋介石喋喋不休地劝说苏联出面来影响中国红军，而莫斯科对此又有明确指示，鲍格莫洛夫不得不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他讲话中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

眼看无法说服鲍格莫洛夫，蒋介石转过脸去同孔祥熙商量一下，然后通知鲍格莫洛夫说：

我认为可以依据这样的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即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

鲍格莫洛夫重申：按自己的意向同中国红军谈判这是您的内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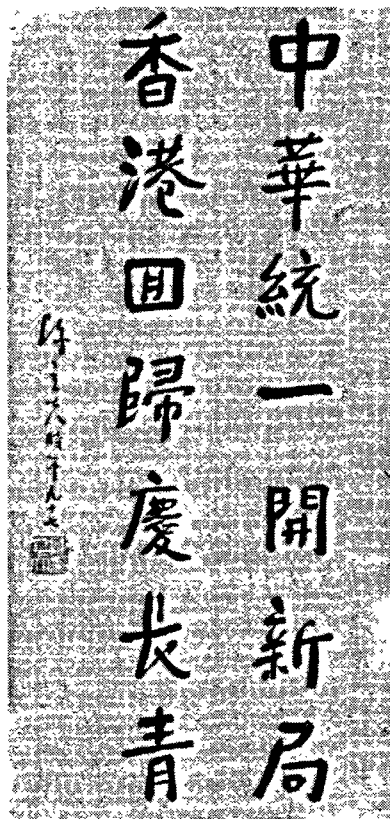
蒋介石说，尽管如此，我仍要求你向苏联政府转达我们的这个想法。

蒋介石之所以坚持要求苏联充当国共之间的调停人，坚持苏联必须劝说中共放弃武装，服从南京，根本上仍旧是“攘外必先安内”的观念在起作用，他这时仍旧把消除共产党的威胁看得比联合苏联抵抗日本要重要得多。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明，以及鲍格莫洛夫的态度，更加剧了蒋介石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恐惧。于是，蒋介石恍然发现他前此对苏联态度的估计可能完全错了！

几乎就在一天以前，蒋介石还相信与莫斯科中共代表的谈判能够取得预期的结果，因而同意将谈判移到南京来举行。而与鲍格莫洛夫谈话后，蒋介石清楚地意识到，苏联其实丝毫没有压迫中共向南京输诚的意思。这意味着，莫斯科并不准备为了同南京的结盟而放弃它昔日的盟友。这种前景对于蒋介石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可怕的。一旦同苏联签订了军事互助条约，当日本对西北发动进攻，苏联军队根据条约出兵中国助战之际，有谁能够保证他们不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帮助那里的红军呢？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在与鲍格莫洛夫会谈的当天晚上就改变了主意，决心停止对苏谈判。

蒋介石坚持要鲍格莫洛夫把他的强硬态度转告莫斯科，并期待着苏联方面回心转意。莫斯科随后给鲍格莫洛夫的指示甚至更强硬，它明确表示：苏联政府不仅不能承担劝说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责任，而且不能接受以《孙文越飞宣言》为中苏关系的基础的建议。因为这样做“会给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背后插上一刀。这样的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妥当的”。这样一来，陈立夫赴苏谈判就更无指望了。

为了根本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不惜暂时放弃与苏联结盟的可能性，这是蒋介石这时在对苏外交上所下的一大赌注。他为此断然停止



时年 97 岁的陈立夫为庆祝香港回归题写的对联

了邓文仪在莫斯科已经开始了的接触与谈判，决心自行解决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但是，国内开始的秘密接触与谈判也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顺利。相反，陕北红军大规模“东征”山西，以及随后西南红军大举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情况，更使蒋介石心怀恐惧。此后蒋介石一度不再不提与苏联结盟问题，而且不止一次地公开扬言：红军是他目前最大的敌人，无论联俄或抗日，都必须首先“完全抹去红军这个问题”。他甚至声称：俄要我与中共合作，而我要他投降，如中共不答应，则决不抗日，如俄要我容共，我决不联俄。

然而，不仅中国共产党这边一个西安事变彻底打碎了蒋介石收编中国红军的梦幻，而且苏联那边也是时过景迁，不论南京政府怎样要求，莫斯科的态度都是婉言相拒，直到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最终也只是与蒋介石政府签署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了事。

(责任编辑 洛松)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引发的思考

● 辛 平

50年代初期，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 全国人民医治战争 创伤中，遇到了中 小学毕业生升学和 就业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全国小学毕业生就达260多万人，要继续升学有83万余人，而初中所能容纳的应届小学毕业生有限，只能想尽各种办法再增招18万余人，即便如此，仍与要求升学者的数目相去较远。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山东省率先采取了应急措施：积极挖潜，增加班次，并提倡社会办学，接纳一部分人继续学习。同时，动员一部分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山东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解决小学毕业生出路问题……如不及早采取措施，认真地加以解决，年复一年，会使我们长期被动，并酿成许多恶果。”中共中央于1954年1月7日转发了山东分局的报告，指出：“……山东和其他几个地方的经验，都证明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不仅解决了他们的出路问题，同时

对推动互助合作化运动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都能发生积极作用，这对农业的社会改造和提高农业生产是有好处的。”

当时，中央已经注意到农村劳动生产力素质较低与互助合作化运动的矛盾，而动员大量的不能继续升学的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生产劳动，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良药。

据教育部统计：1954年高小毕业生人数约429万人，加上1953年不能升学的在内，估计将达500万人以上。如将1955年至1957年的计算在内，今后4年高小毕业生的人数估计将达1700万余人。初中只能吸收500万人升学，还剩余1200万人不可能升学。一些大城市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曾经酝酿过搞请愿活动。因此，初中毕业生的升学问题成为更加引人注目的问题。教育部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动员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去从事工农业生产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轻视体力劳动者的剥削阶级思想从中作梗……这一事实也暴露出中、小学教育工作中一个严重的原则错误……没有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很多教师仍有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剥削阶级观点。”教育部把出现工作被动的责任

推给了中、小学教师，而中共中央在批转教育部的报告时则指出：问题的根子还在教育部，“中央教育部应在这方面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

然而，经过做思想工作自愿到劳动生产第一线的中、小学毕业生并不多，不少人仍希望能有机会加入到下一年的升学队伍中去。

1955年，合作化运动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进入飞速发展时期。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他告诫在场的各位书记：“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面。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为了配合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形势，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特别指出：“新中国成立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要求各地青年组织积极地帮助他们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向广大知识青年提出下



欢送首批赴内蒙古知青的场面

乡的号召。

这年9月初,毛泽东读到《彰武县第三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社会互助网》一文,发现农村合作化需要大量的财会人员,他提起笔在这篇文章上写了一段批语:“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9月4日,中共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编辑的内部刊物《互助合作》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郟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继续发挥上述观点,挥笔批下了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广为宣传的名言:“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中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对于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马上做出了反映,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特别写上了一条:“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

业。”在这里首次出现了“下乡上山”的概念,但是这里面并不包含“接受再教育”的内容,它的出发点,首先是解决就业问题,其次则是使广大青年到农村去,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做一番改变农村面貌的事业。

到1958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兴起,工交等行业和基本建设突然膨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不仅可以吸纳城市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同时还在农村招募了部分工人,就业似乎已不成问题,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工作也就暂时停止了。从1954年到1958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只有15000多人^①,这个数字与历年来就业的中小學生相比,仅占百分之零点儿。

“大跃进”运动 受挫,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有2600万人被精减下放,中国形成第一次人口倒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次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

由于“大跃进”的失误,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为了消除“大跃进”运动带来的消极因素,

中国进入全面调整阶段。

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大力压缩盲目扩大的基本建设规模,大幅度精简城镇人口。在“大跃进”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如潮般地涌向城市,1958年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比1957年增加了2000万人,到1960年,全国职工人数近6000万人,与之相伴的是农村户口的家属纷纷迁入城镇,三年内吃商品粮的人口猛增3000多万,给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造成巨大的压力,致使交通、住房、教育、食品供给等状况日趋恶化。

196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根据“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决定大力压缩城市人口。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一次讲话中指出: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少不可。“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1961年共下放城镇人口1300万,粮食销量减少40亿斤,精减职工872万人,工资总额减少了15亿元。

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

^① 还有一种说法是79000多人,见《十年后的评说》,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142页

人口的决定》，要求全国城镇人口应当在1961年末的1.2亿基础上，再减少2000万人。

在此形势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又成为宣传部门的一个重要话题，被作为精减职工的前奏。1960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回乡知识青年邢燕子的事迹，并配发了社论。社论指出：成千上万的机关工作人员、工人、毕业生、复员军人走向农村，“农业战线的实力大大加强了，支援农业的规模空前地扩大了”。与宣传舆论相配合，歌颂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的豫剧《朝阳沟》等文艺作品被褒奖，下乡知青邢燕子、董加耕、侯隽、张韧等人被树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楷模。

1963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做出决定，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准备在今后15年左右时间内，每年动员和组织城镇上百万的青壮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到1963年6月，全国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毛泽东闻知此事后兴奋地说：“我们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这句话一样适用于五年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中国的经济刚刚走上好转的轨道，毛泽东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山下乡被称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涂抹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60年代，正是中国和国际上的多事之秋，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与苏

联的关系日趋恶化，中国与美国的对抗因越南南方战火的扩大而加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把阶级斗争和防止修正主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提出：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为了防止中央出赫鲁晓夫，毛泽东提出了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特别是在毛泽东提出“反修防修”的理论之后，接班人的问题就更成为热门话题。1964年5月4日，《人民日报》为纪念“五四”运动，发表了题为“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变成一体”的社论，社论中除了要求广大知识青年做“祖国第一代既会写写算算，懂得科学知识，又会使用犁把锄头，农业机械的新型农民”，还对广大知识青年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既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的新一代的农民、工人、士兵，新一代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就是我们要培养的新型接班人，他们不仅将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

成为领导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基层干部，并且从这支队伍里，会涌现出各种人才，成为各个岗位上的骨干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无尽源泉”。这些标准，无疑向广大知识青年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对于那些充满幻想，满怀政治热情的青年更具有吸引力。河北束鹿县有一个下乡知识青年，因在社员大会上大讲要当好接班人，使村党支部书记极为恼火，认为这个毛孩子刚下来就想接老子的班，为了不让这个知青具有接班的政治资本，干脆让团支部开除了这个知青的团籍。此时正值“四清”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之际，农村有点权势的人不仅对工作组心存畏惧，而且对知青也心怀芥蒂，“干部怕下乡青年揭底子，会计怕下乡青年接位子”，因而多方设法排挤、冷淡下乡知青。1964年5月9日，中共中央曾批转了《团中央关于参加农业生产知识青年受到歧视、打击、污辱的四份材料》，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纠正知青在农村受到的各种不公正的对待。

到1965年8月，10年来累计



知青在农村接受再教育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突破 100 万人大关。9 月 25 日《人民日报》为此指出：“它是推动党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大事；它为我国知识青年开创了一条最广阔的革命化道路。”

从 50 年代起，毛泽东就不停地对教育制度提出质疑，并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要求；1965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讲：“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对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从这段话中，已经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毛泽东的“再教育”思想。

红卫兵运动兴起，“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被卷入了运动，继之而起的返城风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 年 5 月 29 日，清华附中的十几名学生悄悄地聚集在离学校不远的圆明园废墟上，宣告载入中国史册的“红卫兵”诞生了，他们的誓言是：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从此，数千万被狂躁心绪驱动的红卫兵，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冲出校门，散布在社会的各

个角落。他们高举破除“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旗，将“火种”撒向全中国。

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很快被卷入红卫兵运动。随着揭批不断深入，不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开始怀疑上山下乡政策，甚至认为上山下乡也同“修正主义路线”有关。一位知青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广东，许多红卫兵的小册子……收集了刘少奇关于上山下乡的讲话，所以我们认为这一定是刘少奇的政策……我们要回省城，向全社会提出这个问题，还要弄清这到底是不是刘少奇的路线。1967 年 1 月，全国各地知青组织代表汇聚北京，要求回城，参加城市的文化大革命。还有人策划成立全国性的知青组织。为了对知青返城问题加以制止，中共中央于 1967 年 1 月 11 日发出通知警告说：知青返城是受了坏人利用，其发展的结果可能带来性质的变化。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号召广大知青“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积极返回本单位，参加夺权斗争和农业生产”，对于“以种种借口长期在城市逗留”的知青，命令他们立即返回原单位，撤销所有的联络站。对于犯错误的知青给以改正的机会，对于从事破坏活动的要依法惩办。一个星期后，北京市公布了一个全国性知青团体的名单，宣布它们为非法组织。

红卫兵历史使命终结，为上山下乡运动再次吹起号角，毛泽东抓住时机，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文化大革命”逐渐发生了角色易位，1967 年 1 月以前，大专院校红卫兵是运动的主角。以上海“一月风暴”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由红卫兵时代转向工人时代。此时，中共中央内部的斗争已经有了分晓，1 月 13 日，刘少奇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承担路线错误的主要责任，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等职务，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此时在中学红卫兵中，多数红卫兵组织已经名存实亡，一些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清华附中的卜大华于 1966 年 12 月写了《向中央文革质疑》和《向江青同志质疑》的大字报：“怀疑有一个人，非常残暴，想把所有的老干部都踩下去”，“担心会出现斯大林时代的大疯狂”。马甸中学出现了“万万岁刘少奇”之类的当时称之为“反动”的口号。育才学校的一位学生说得更深沉，谁正确谁不正确，“十年以后看”。

在这样复杂混乱的情况下，北京部分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主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父母或被打成“黑帮”，或被打成“走资派”，或“靠边站”）组成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他们中有不少人被捕。中学的红卫兵运动走入了低谷，许多人游荡在社会上，有些人干起了打、砸、抢的勾当。

1967 年 3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同时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号召所有的中小學生都回到学校，进行教育革命。3 月 25 日，“首都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到会祝贺。这标志着中共中央

将红卫兵运动引入正轨。

一些中学生对文化大革命中无休止的争斗已经感到厌倦，1967年7月，北京二十五中高三学生曲折（这是插队时改的名字）发出了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之内，就有300余人报名参加。他们按照“文革”时期特有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认定自己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不可能构筑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由此推断，“要取得创建新型大学的资格，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于是，他们以五六十年代下乡的知青为楷模，希望能到“广阔天地”中去干一番事业。但正式决定“上山下乡”时，几百人只剩下了10个人。他们向北京市劳动局汇报了上山下乡的计划后，得到热情的支持，经联系，他们被安排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10月9日，他们来到当年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天安门广场，在上千名赶来送行的同学、朋友和有关领导面前，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庄严地举起了右手，宣读了他们的誓词：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

10月11日，《人民日报》赞扬了他们的革命行动。视为“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声。

几乎与“红卫兵大学”成立的同时，毛泽东于7月13日深夜登上了南行视察的专列，一路上，毛泽东对“文革”以来发生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特别是如何着手结束这场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在毛泽东看来，能否顺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最关键的是如何解决红卫兵的问题。随着各地夺权斗

争的深入，不少地方的大专院校、中学和群众组织武斗接连不断，死伤时有发生。为了稳定局面，毛泽东决定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武斗的重点大专院校及中学。7月27日，由数千名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为了抵制“工宣队”进校，“井冈山兵团”头头蒯大富命令红卫兵对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进行袭击，致使“工宣队”6人被杀害，731人受伤。毛泽东听说此事后震怒，马上召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于7月28日凌晨3点至8点，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话，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训斥，最后警告他们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8月18日，《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发表了题为《坚决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社论，要求红卫兵更加坚决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在毛泽东的各项指示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再教育”理论。

“再教育”理论的由来——由于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误解，导入重体力劳动轻脑力劳动的误区

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做出了一个基本判断：“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肯定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这个基本判

断很快就被毛泽东所推翻，1957年3月，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纠正“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说法，毛泽东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同年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中，中共中央专门下达了《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这样划右派的目标便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为数50余万的右派，其正式的称谓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早在1939年，毛泽东曾分析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他断定：“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经过十数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践及建国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反而从小资产阶级上升为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了。

毛泽东一直主张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工农中去，与他们打成一片。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起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经过同工农在一起并熟悉了他们之后，“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

知识分子不干净了……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以个人的经历论断：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因此他不断地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提出质疑，向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发出到工厂、农村去的号召，并将“右派”分子有计划地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进行劳动改造。1958年4月，毛泽东在东湖会议上讲：“对知识分子我们已经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封了他们在斗争中迷失方向而且动摇，那他们还有什么资本呢？”5月发表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著名论断。这里的“卑贱者”指工人、农民，“高贵者”指知识分子，表现出毛泽东对体力劳动者的赞美和对脑力劳动者的蔑视。

1962年，中共党内如何在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而在与美国的对抗和与苏联的论战中，毛泽东对青年一代越发感到担忧：“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事。”这种忧虑又联系到了教育制度，他认为，中国的学校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了政，在这样的学校中青年学生受到了毒害，不能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此，他提出：“培养革命后代，一定要让他们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养成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的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教育革命的深入，毛泽东提出了“再教育”理论

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写的“编者按”，毛泽东指出：“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的评论员文章，对“再教育”进行了诠释：“为什么叫再教育？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再教育。”此外，文章还对“再教育”的内容和途径做了说明：“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不仅知识分子需要“再教育”，面临的大批需要安置的城市无法安置的知识青年更需要“再教育”。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个指示的发表，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

毛泽东为什么在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上要特别强调接受贫下中农的

再教育呢？

毛泽东来自农民，对于农民有深刻的了解，他又非常同情农民、爱护农民、乃至过高地估计农民，不仅将农民作为民主革命时期实际上的主力军，而且将农民看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力量。尽管他也批评农民，但在总体上是肯定的。因此，他在农民与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之间，始终把农民视为教育者，就连他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他要求毛岸英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拜农民为师。要儿子以农民为师当然有深远的意义，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谁能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这一点毛泽东比谁都看得清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仍将自己相当大的精力放在农民身上，试图通过“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等运动，不仅使广大农民摆脱贫困，而且也使农民在较短的时间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尽管毛泽东也深深懂得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时时告诫人们“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在毛泽东眼中，经过历次运动的农民，与被定为资产阶级属性的知识分子及其教育下的知识青年相比，自然具备教育者的资格。

毛泽东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从青年时代就对学校的教育方法表示反感，因此导致他不重视正规教育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特别是在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他更加迷信于自己以往的经验，过分夸大直接经验的作用，而忽视间接经验和书本知识，甚至片面地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而脑力劳动则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劳动。因此，将与工农相结合作为缩小三

大差别和培养接班人的唯一途径。

李庆霖斗胆上书毛泽东诉说苦衷，周恩来主持专门会议研究知青工作，推出新的知青政策

当时在知青中盛传着这样一副对联：“老子有能儿返城，老子无能儿务农”，横批：“比爹”，表现了广大知识青年及其家属对于“走后门”返城的反感。为了制止这种“不正之风”的蔓延，中共中央下发了40号文件，禁止走后门当兵；12月10日，再发出44号文件，要求坚决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走后门招工入城的，必须退回。但是，不论中央如何三令五申，“走后门”依然长盛不衰。这种现象在知青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兼之林彪事件所引发的震动，以及知识青年在农村所遭到的窘况，促使人们开始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反思，运动初期的狂热逐渐降温，从真心实意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转向被动式地接受现实。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斗胆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李庆霖反映了知青在农村的情况，说他们在农村无法养活自己，“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李庆霖还用了大量笔墨指控“走后门”，他说，在知青中，一部分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依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招工、

招生、招干去了”。毛泽东见信后复了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1973年4月25日 毛泽东
毛泽东复信后的第四天，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解决知青工作问题，特别强调一定要把上山下乡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周总理带病听取了汇报，主持修改会议文件，接见会议代表，做了重要讲话。他说：不能让主席再把自己的工资寄去了！财政部门要对知青经费做预算，搞个规划，上山下乡是个长期任务。1973年到1980年下乡的人数，头四年每年150万，后四年每年100万，加起来1000万，每人补助600元，就需要60个亿。这次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形成了一个报告和两个附件。附件之一《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统筹解决问题六条办法：（1）切实加强各级党委对知青工作的领导；（2）切实解决下乡知青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3）大力加强对下乡知青的培养教育；（4）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5）对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做坚决的斗争；（6）将上山下乡的长远的全面规划同整个经济建设、开发边疆和文教科研的规划衔接起来。

为了配合“六条办法”的落实，从1973年8月开始，严厉打击迫害、摧残知青的坏人，并于11日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104号文件，向全国通报了判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两名奸污迫害女知青的军队干部死刑的案件。由于各地多存在占用、挪用、乱用，乃至贪污、挥霍安置费的情况，造成部分知青未能完全享用到国家拨给的专款和补助，同时开始了全国清理知青安置

的工作。直到1979年，国务院知青办和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知青经费管理使用的暂行规定》，才算形成了比较详尽具体的法规性文件。

至于“走后门”问题，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被说成是：“刘少奇和林彪一伙为了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妄图毒害和争夺青年一代”而刮起的邪风。为此规定，在知青招工、招生、征兵、要经知青小组评议，征求带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意见。

文化大革命结束，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得到落实，知识青年问题变成非常突出的问题，上山下乡运动步入尾声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由此结束。1977年12月至1978年1月13日，为解决好知青问题，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从1968年到1978年，上山下乡知青已达1680万人，其间又有一部分人上学、进工厂、当兵等离开农村、农场，实际在乡（场）的知青还有950万人。这次会议后，对上山下乡政策又进行了调整，留城面进一步扩大，对返城就业的政策也适当放宽。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0月31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这次会议直到12月10日结束，共开了41天。在此期间，由云南支边知青开始，出现了全国性的知青要求返城的活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的六条措施，突出了解决就业和解决好知青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实际困难及对下乡知青切实加以

保护等内容。会议上形成的另一个文件是《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试行规定》，共拟出了40条细则，以便落实《纪要》精神时加以实施。

继之而来的是知青大返城，除了招工招生之外，多数知青利用历年来的知青政策，寻找种种理由，费尽周折，踏上返城之路，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大概就是办理病退。据统计，仅1979年云南的8万余名知青几乎走完，仅剩下2000余人；北大荒的知青当年走掉32万人，剩下的不足百分之二十五……

中国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60年代正是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大发展的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国家的经济开始腾飞，城市极大地吸收了来自第一产业的人口。然而就在此一时期，有位美国人却惊奇地发现，与世界发展趋势相反，“中国是第一个策划了人口倒流去乡村的社会”。

将被及三分之一以上城市家庭的近1700万知识青年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历史事实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中城市已经接纳了农村数千万人的剩余劳动力，到本世纪末，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达到两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要流入城市，这代表着现代化过程中，人口的主要流动趋向。不将过剩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相反却要由政府出钱将大量城市劳动力送往农村，其结果是必然扼制现代化进程。中国一定要走向现代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不是任何人为因素的结果。

自从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之后，中央对知识青年政策进行了调整，其中有一项重大的调整就是提

高了上山下乡知青的安置费。在此之前，平均每个知青的安置费只有230—250元，1973年增长到人均500元。有人概算，仅10年内国家共拨出安置费近100亿元，约占国家总支出的1.2%。这还不包括知青探亲报销的路费，口粮及生活困难补助，因重病及重伤给予补助的医疗欠款，每年举办的各级各类知青会议及培训班的支出，各级知青机构的列支，等等。这样巨大的开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很难估算，能让知青自食其力吃饱肚皮就算不错。在当时这笔账只能从政治意义上考虑，也许根本没人敢想用这笔钱去建工厂，能够解决多少人的就业问题？能够创造出多少财富？创造出来的财富又可以再建工厂，再次解决就业问题，如此滚动发展，可以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然而，巨大的财政投入却没有带来什么经济效益。这笔账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去算都是一笔糊涂账。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提出，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他建议，在减少知青下乡的前提下，将知青经费中不必支出的部分用来扶持城市安排知青就业。国务院知青办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研究了具体落实的办法。历史有时很奇怪，当你转了一圈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时，可能意味着人们的认识出现了新的飞跃。从1980年开始，利用经济手段解决城市知青就业问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无声无息中划上了句号。8月7日，国务院知青办在《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中说，今后知青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要从有利于解决劳动就业的原则出发，实行城乡统筹，把城乡两方面安排知青的工作逐步统一起来，要从城乡两方面广开生产门路，

予以安排。上山下乡从就业问题触发，到解决就业问题结束，前后经历了整整27年时间。

当我们处在世纪交替的门槛上时，我们不难发现，上山下乡运动使中国付出的最大代价不是物质，而是人才。到本世纪末，我国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将有80%到了退休年龄，接替他们工作的有相当一部分是40—50岁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些知青中的部分幸运者虽然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由于教育中出现的难以弥补的断裂，以及过早地涉足社会与政治，使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鲜有成就，虽然，有的人在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方面崭露头角，甚至成果颇丰，然而就这一代人应该给国家和社会所做的贡献来讲，是大打了折扣的。据预测，到21世纪，对各类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将急剧增加，全世界都将出现较严重的人才短缺。日本预测，到2000年日本将缺少科技人员160万，到2010年缺少445万。下个世纪，世界各国科技人员的需求量将是现在的2—3倍，竞争最激烈的将是人才竞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能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

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付出过中国这样的惨痛的代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全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邓小平曾说过，教训也是财富。这句平实无华的语言，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纠正以往的错误，有能力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尽管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已是一个“迟来的春天”，但春天毕竟来了。一个能够承受磨难和接受教训的民族，必定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责任编辑 仲文 洛松）

邓小平授意创办《思想战线》

被“四人帮”扼杀经过

● 邢方群

在我从事报刊编辑工作的大半生中，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在《思想战线》杂志时，与“四人帮”斗争的那段经历。

1975年秋，我从全国总工会五七干校回到北京，那时全国总工会没有恢复，《工人日报》也无复刊消息，我感到很苦闷。正巧，我的老领导胡耀邦同志调到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党组书记，我便写了封信给他，问能不能给我在科学院安排个工作。这时，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正在遵照邓小平（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主持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的指示，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副主任胡绳、于光远的直接领导下，筹办《思想战线》。学部提出要我。我当时考虑，在政治斗争复杂而尖锐的形势下，以到中国科学院较为稳妥，因为自然科学领域的斗争要少些。如去《思想战线》，又会处在思想政治斗争的前线，风险很大。在我犹豫的时刻，原团中央书记胡克实也劝我去《思想战线》。他说，近几年，有些人阉割毛泽东思想，歪曲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弄得是非颠倒，人们的思想陷于混乱。《思想战线》刊物的宗旨是维护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我听了以后，毅然下决心去了学部，到《思想战线》杂志社上班。

1975年10月4日，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向国务院呈送并请转中央政治局的关于创办《思想战线》杂志的请示报告。当天，乔木就报送小平同志，请他审阅批示。小平于10月5日签署

意见：“拟同意，请主席批示。”经主席圈阅后，小平于6日批示：“请政治局同志传阅后退胡乔木。”

报告确定，刊物的性质是一个理论性、批判性、讨论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月刊。

方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报告强调：《思想战线》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开展不同意见的争鸣。勇于坚持真理，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其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必须坚决斗争，严肃批判，决不能让它自由泛滥。

同时提出，刊物要面向全国，面向广大群众，注意同工农兵结合，实行开门办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等等。

刊物主要内容，是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在组织机构方面，确定《思想战线》杂志社为学部直属单位。设主编一人，副主编若干人。由林修德兼主编，梅关桦任副主编（按，以后杂志社增加了一些同志，学部确定，成立杂志社临时领导小组，林修德任组长，邢方群、梅关桦任副组长，罗烈任组员）。

1975年10月6日和11月24日，政研室领导召集学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林修德、刘仰、宋一平和《思想战线》负责人去政研室开会。会上，胡乔木作了讲话，他对刊物的性质、方针、任务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胡绳、于光远也发了言，对杂志的选题和作者队伍提出重要意见。

乔木还说，政治研究室要尽力给刊物以支持和帮助，除了共同研究明确方针任务之外，还准备采取以下措施：

一、每期的选题内容，政治研究室与学部一起讨论确定，就主要的文章、主要的观点交换意见。

二、刊物发表的重要文章，我们可以帮助定稿。

三、派两个联络员常来常往，便于相互了解情况，随时解决问题。

在筹备出版期间，乔木、胡绳、于光远等不断地给《思想战线》杂志出题目，并且告诉编辑部，某篇文章可以约某位同志写；他们还还为杂志约了一些同志写文章。政研室联络员郑惠常打电话给编辑部，传达乔木、胡绳、于光远给杂志出的选题，并对送审的某些文章提出修改意见。郑惠有时也来编辑部了解情况。胡绳也亲自来编辑部看望我们，并且听取我们的汇报。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为什么这么重视《思想战线》这个刊物？对此，于光远在他的著作《文革中的我》作了回答。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在当时特殊形势下成立的一个有些特别的机构。当时邓小平已经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需要有一个机构协助他工作。而那时党中央好几个机构都在“四人帮”手中，这个机构如设在党中央就很难工作，因此设在国务院，由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政研室的工作一方面是整理毛泽东的演讲记录和文稿，准备出版毛选五卷；另一方面的工作是组织起草两个文件。除了这两项工作之外，还有就是用学部名义编辑出版一种政治思想性刊物，定名为《思想战线》。这件工作由胡绳抓，是他联系学部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可以设想，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同“四人帮”那时的笔杆子上至张春桥、姚文元，下至梁效、罗思鼎、洪广思、唐晓文、宫效文、钟佐文

的文章大异其道，事实上是唱“对台戏”的。

《思想战线》在筹备创刊过程中，“四人帮”对它进行造谣中伤、恶毒攻击，矛头直指邓小平同志。

1976年2月25日，姚文元在电话中对《红旗》杂志负责人说：“他们有一篇讲三项指示为纲的文章，讲法比刘少奇凶得多。我刚拿到手，可以看到问题的尖锐性。他们准备放在《思想战线》作为第一篇。”1976年3月1日，姚文元又在电话中说：“批《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要联系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胡乔木关于《思想战线》的讲话，也可以批判。”在1976年4月26日下午，姚文元同《红旗》杂志负责人谈话时，诬蔑邓小平同志派人去学部工作是搞复辟，办《思想战线》是和党中央唱对台戏。《红旗》杂志1976年第五期，就登了一篇文章，诬蔑邓小平指示学部筹办《思想战线》是为了制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和“梁效”写作班子，在各种场合诬蔑《思想战线》。他们扬言，“《思想战线》出一期，我们就批一期”。“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党羽在1976年2月也对上海文教组讲：“他们想搞一个修正主义舆论工具，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

尽管“四人帮”及其爪牙围攻《思想战线》杂志，但杂志编辑部在学部和政研室的领导下，顶着阴风恶浪，继续工作，终于把试刊第一期稿子编出，打出清样后，经学部领导审阅，然后送交胡绳。胡看过，转胡乔木审定。只等乔木同意了，就付印出版。但就在这时，全国掀起批判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同志，于是，《思想战线》杂志不得不停止出版了。

“四人帮”垮台后，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指示学部，派几十人到《红旗》杂志社帮助工作。于是学部从《思想战线》杂志社和有关研究所，抽调了三十多人到《红旗》杂志社，我是副领队。大约一年左右，学部去的人多数陆续回到了学部。这时学部已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同志留在《红旗》继续工作。鉴于这一情况，有关领导认为应全力办好《红旗》杂志，所以《思想战线》杂志没有继续筹办。

（责任编辑 一 尘）

我在中宣部工作时 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 于光远

周扬的名字，我老早就知道了，直到1940年6月，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才第一次和他相识，但也没有同他交谈。四年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大学，下辖行政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学院三个学院，任命周扬为校长。我于1943年在“抢救运动”后从西北局调到行政学院接受甄别。1944年甄别结束，党组织没有让我回西北局，决定我到延安大学工作，成了周扬的部下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是我与周扬第一次同事。以后又几次相处，但时间都很短。抗战胜利后我到北平办《北平解放报》后，重返延安，参加几个地区的土改，1948年到中央宣传部。1954年周扬来到中央宣传部当副部长，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我是科学处处长，又成了他直接的部下，相处时间就长了，对他也就有了较深的了解。他在同科学处的同志接触时说，他认为党的科学工作比文艺工作更为重要，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不得不事实上更多地管文艺方面的事情，希望同志们对他有所谅解。

五六十年代，中央宣传部在文艺工作方面的事情很多：“胡风问题”、“丁陈（丁玲、陈企霞）问题”等等。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周扬当然每次都参加，每次都发言，对这些问题他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而我作为中宣部的一个处长，虽然每次开部长办公会议我都列席，在会上对这些方面的事我也听到许多，但当时我认为文艺方面——特别在人事方面的事，太复杂了，实在听不清楚。心想反正自己不管文艺处的工作（文艺处处长是林默涵），也就不去仔细听，经常利用开会的时间作“副业”。有人把周扬描写成特别喜欢在政治上整人，我了解的周扬，并不是这样的人。当然我对文艺界的事几乎完全无知。

关于胡风与周扬的关系，我所知道的只有30年代在上海的口号之争和鲁迅文章中所写

的关于“四条汉子”那些话，其他一概不知。直到“胡适批判”之后，在中宣部里我又听到了还有一个“胡风批判”的事。关于胡风问题，开头的一段，给我的印象是又一场学术批判，一场与文艺路线有关的学术批判。按说，既然是学术批判，同兼任理论、科学两处负责人的我，并非没有关系。如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事，就找到了我。我也就管过一阵子。可是对胡风批判，完全没有给我任何任务，连要我关心这方面的话，部领导也一句没有对我说过。我本来就没有接触过文艺界的事，情况不了解，乐得不闻不问。

1955年初我在部长办公会议上才听说胡风问题不简单，可能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在活动。不久就公布了一批材料。《人民日报》发表这个材料时所加的编者按语中，把胡风等人定为“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以后又公布了第二、第三批材料。编辑部加了注，还有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加的那些份量很重的按语。

坦白地说，在延安批评《轻骑队》时，我就曾产生过一个疑问：什么叫“反党”？“反党”与不能算做“反党”的错误之间的界限究竟该如何划分？为此我曾请教别人，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关于这个问题也没有讨论的机会，所以我这个疑问一直没有解决。不过以前我认为“反革命”与“不是反革命”的界限还是比较清楚的。看了这几批材料，学了毛泽东那些按语，知道了不少事情，也受到了教育，可是我对什么是“反革命”却糊涂起来了。从公布的那些信件中，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反革命活动来。我在等证明他们真是反革命的证据，这样的证据我始终没有见到。

在看到的那些批判材料中，胡风和他的朋友我都不认识，只看到一个谢韬的名字。一问，就是我认识的在人民大学工作的谢韬，对他我倒是很熟悉的。但我不知道他对文艺有兴趣。

可是在我的脑子里，无法把这个我认识的谢韬同“反革命”连起来。

那时有一段时间中宣部部长会议经常讨论胡风问题。在把胡风和他朋友们打成反革命集团这件事上，部长是十分积极的。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我们多次听到，认定胡风等是反革命是党中央、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中把问题提得那么尖锐、那么明确。那时毛泽东虽然没有署名（把它们作为毛泽东的著作正式发表是在《毛选》五卷出版时），但是不仅我们这些参加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的人，而且可以说许许多多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当时我认为，毛泽东这么说，必然会有充分的根据，没有朝另外一个方向去深思。

在反胡风的“斗争”中，周扬当然是主角之一，每次讨论他都发言。但我实在记不住他和别人在会上发言的内容，甚至可以说一点也回忆不起来。部长办公会议是那些熟悉情况、有意见可发表的人讨论的场合，他们之间早已有共同的信息为基础，不了解有关人和事的人，即使听了，仍然不懂。周扬也是处理“胡风反革命问题”十人小组的成员，但组长不是他。而且这个小组的许多工作是公安部长在抓。周扬在部内一直被部长认为是“政治上不那么尖锐，带有书生气的人”，部长常常说周扬是“好人”（带有某种贬义的“好人”），说他把胡风和“党”的斗争，视作“文艺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不到“政治上的反革命”的高度。这样的话，我就是在部长办公会议上听到的。当然部长的话说得很温和，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听明白。对这种批评，周扬也从不辩护。当时我还听说毛泽东对周扬也有“政治上不尖锐”的批评。参加部长办公会议的还有一些处长，我请几位和我共同回忆了一下，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印象。我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也许有人会说，你说了一大篇，对胡风问题什么也没说清楚。我承认事实就是这样。好在胡风集团这个涉及到许多人的大冤假错案已经正式平反。而且有许多人写了文章。文章的作者有的是作了调查研究的，写的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结果，有的是当事人，写的是自己亲身的经历。文中所写的周扬的言行，我想大都会是事实。事实是最雄辩的。我是个局外人，而且并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上面写的那些只是在中宣



周扬同志

部期间给我留下的印象。

丁陈事件对我来说与胡风事件有一点不同。丁玲和陈企霞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丁玲这个人和她被捕后在南京的那段历史，1939年我一到延安就听人们讲得很多。后来，她的《三八节有感》发表后，人们对她又特别议论了一阵子。但一直没有见过她。直到1946年我同她从张家口一起出发去桑干河流域搞土改，算是相识了，不过不在一个村工作，建国后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她当过一个短时期的文艺处长，一起开过会，但没有交谈过。没留下什么印象，好的不好的都没有。我同陈企霞倒比较熟悉。1940年我在延安中央青委机关，他同我都是“轻骑队”的积极分子。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闲聊。我认为他有一个优点：看问题尖锐。我喜欢听他讲话，只是感到他说话似乎过于尖刻。1941年下半年他从中央青委调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当丁玲助手之后，我们再没有联系。

1955年提出“丁陈反党集团”后，我有这样一个思想活动：从40年代起我一直不明白什么叫“反党”。这是个很重的罪名，但是我一直不懂得怎样的行为是反党。我觉得“反党”似乎是一个模糊概念。连什么是“反党”也不清楚，却在中宣部办公会议上对丁陈究竟在什么事情上“反了党”讨论来讨论去，我实在没有去认真听的兴趣。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虽然说得非常多，我却越听越不明白。

在讨论丁陈反党集团时，我听到又把丁玲和陈企霞的历史问题翻了出来。丁玲的历史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连我这样对她的经历毫无知

识的人，1939年一去延安就听人讲了很多。我想既然是老问题，想必组织上早审查过，建国初期她来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组织上一定审查清楚了，而且问题的性质一定不严重，否则不能让她担任党内这样一个重要职务。陈企霞也是延安整风中经过审查的，我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又成了有问题的。可是也没有听说发现了什么新的材料。有没有历史问题是个硬问题，查清楚就是了。当时部领导对这件事抓得很紧，我估计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一定作过什么指示。对这，我当时没有听到，我只是根据中宣部所开展的批判都有毛泽东的某种指示这个一般规律来判断的。我想对丁陈也不会例外。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中写了这么一段话：在1956年12月的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审查丁玲历史反党集团问题专门小组”汇报之后，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周扬这么讲是不真实的。周扬这种解释令人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对这篇文章提出的这一点，我倒觉得并不“奇怪”。毛的讲话要不要人传达，不是周扬能作主的。过去的历次批判也不都传达。而且周扬讲的这件事我想陆定一是一定知道的。那次部长办公会议上周扬讲这句话时陆定一在场，他没有说否认周扬的话，可以反证周扬讲的是实话。根据多年与周扬的交往，我相信周扬不会也不敢无中生有地把毛泽东没有说过的话歪曲成毛说过，周扬也不会当着陆定一的面说假话。周扬可以有这种错误或那种错误，但周扬不具备这篇文章中所描写的说假话的那种品质。

至于在处理丁陈“案件”过程中许多复杂的情况，有待于弄清楚。可惜知情人一个一个地逝世，完全弄清楚的难度相当大。

我认为这个事件一定有“左”的指导思想这个大背景，而这个大背景是不容忽视的。

那些年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上我听到文艺界受批判的事可真多，凡是在部长办公会上讨论过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事件，而这些事情，我回想了一番，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指示：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在前，小说《刘志丹》、电影《早春二月》、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后，都有毛泽东的指示。丁陈事件毛泽

东作了什么指示，至今我不知道，可是我相信周扬的话，也会有。

我还有一个疑问：毛泽东为何对文艺发表这么多的指示，是否每篇都是他看了作品后的感想？有一些我不怀疑，有一些我怀疑是江青在其中发生了作用。对电影《武训传》和《海瑞罢官》进行批判这两件事中，江青是出了面的。其他江青未出面的事情中有一些江青也可能起了作用。她起作用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对这我只是怀疑，我不掌握材料，因此不能使我作出有事实根据的判断。

在文革结束周扬到科学院后，有一次在安儿胡同，我对他谈起陆定一文革后在北京医院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这个人之后接着再整另一个人。”陆定一对中宣部的工作能作这样一个反思，使我对陆产生很高的敬意。周扬听了我的话苦笑了一下说：“可不是么！事情就是这样。”陆定一讲话向来概括性强，周扬不会说出陆定一那种高度概括的语言。“文化大革命”后，周扬对自己在中宣部（或更早以前的那些年份）做过的事也常作反省，在许多场合他还向许多文艺工作者道歉。那时我听说在周扬作这种反省时，有人还认为周扬不应该那么做，因为许多整人的事并不是周扬自己决定的，而是中央决定的，周扬无权去检讨。但是周扬还是反省、还是道歉了。对于在我们党内统治了许多年的“左”的指导思想错误，经过“文革”，陆定一有了很大的觉悟，周扬也有了很大的觉悟，而有一些人却不觉悟。

周扬这么做我认为是很正确的。尽管当时“运动”中出现的事情有当时的大背景，周扬却没有因此推卸自己个人的责任。他能这样做说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是有原则的人。也说明他是一个服从真理的学者，而且他作检查和道歉也不是不冒一点风险的。那时在意识形态部门还有一股不小的势力阻碍他改正错误。

我还认为他在“文革”前在文艺界所犯的错误，在不同的事情上，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我还是喜欢说一句话，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要掌握真理必须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我对许多事情还没有作具体分析，不便发表意见。因此我在这里想再一次声明，我说的有些话并没有把握，说出来只是表述自己的一些认识，更多的是有一些疑问，我写的目的也是提高自己认识，希望不吝指教。

反右派斗争开始,运动不断,1958年反右补课,1959、1960年反右倾机会主义,七千人大会后才有了一个短时期的比较宽松一点的气氛,这时候聂总搞“科学技术四十条”,我参加了这个工作。此外工业有个二十条,教育也有个多少条,这些我都没有参加。文艺先是有个十几条,后来成了八条,我知道这是在周扬主持下搞的。我看过,只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我认为对周扬在文艺工作上的是非功过,不仅要研究1954—1957年他的表现,还要研究60年代他的表现,尤其是他主持起草的文艺八条。应把这八条的内容,和柯庆施、张春桥,也许还有江青等反对八条的活动联在一起研究。由于我不是文艺界人,文革前对文艺太不关心了,所以不太了解,没有资格写中国文艺工作、文艺思想的事情,可是我真希望有人研究一下,这对我了解周扬会有很大的帮助。

1962年春,在广州同时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一个是讨论第二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还有一个是讨论戏曲电影等工作。这两个会议受到周恩来、陈毅的特别关注,聂荣臻等领导人主张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个主张得到参加这两个会议的人的肯定。广州文艺工作方面的会,是一个在党的文艺工作历史上很重要的会议。周扬参加了这两个会议。

1961年—1962年春这种比较宽松的环境可惜时间很短,广州会议后不到半年,毛泽东8月间在北戴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广州会议的基本精神也就被否定了。

后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中,对原先刘少奇起草的那个稿子予以否定,提出把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为运动的目标等等。在这段时间内,周扬一直在斗争漩涡的中心。在1965年他被任命为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但我观察到他情绪不高,有一种想离开这场运动远一点的倾向。在这期间他常去天津。他去天津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做,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他去天津小站搞社教,这是不对的。去小站是陈伯达的事,周扬并未参加。他去天津名义上是研究青年的问题,我看出他不过是借个题目去走走。当他在天津的时候,我也曾为其他的事去过天津。见面后我向他汇报了科学处的工作,也同他进行了单独的谈话,在谈话中听出他一些心声。

1965年下半年,医生检查出周扬患了肺

癌,在阜外医院动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并且幸亏是早期。手术后他去了天津休养。他也就因此暂时离开北京尖锐的斗争。

正当周扬在天津养病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在北京爆发了。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陈伯达做了权力很大的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风声传到天津,周扬从天津打电话给陈伯达,想了解有关这个运动的情况。陈伯达同周扬的私交是不错的。可是周扬的电话陈伯达根本不接。周扬在中宣部中是仅次于“大阎王”陆定一的“二阎王”,同时他又是“又长又黑”的那条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红得发紫的陈伯达又怎能不和周扬划清界限、接他的电话呢?我想,从陈伯达不接电话这件事中,周扬是会得知有关文化大革命对他将是一场很严峻的政治运动的信息。

我不知道周扬何时从天津被弄到北京(后来才知道是1966年12月)。在文革初期,周扬从来没有在中宣部大院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挨过斗(也是最近我才知道他被弄回北京后,在部队的一个礼堂他和陆定一俩人被中宣部的群众各斗了两个晚上。可是当时没有让我参加)。在文艺界据说周也挨了斗,我更不知道。只是在沙滩中宣部大院里见到许多批判他的大字报,在教育楼参加“声讨”周扬的大会,看到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出的批判他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见到过他这个人。在周扬被带回北京前,他其实一直在天津。当时都说周扬在上海养病,这是中宣部陶铸等保护周扬的一个措施。许多红卫兵组织要去揪斗周扬,没有找到他。按照当时还在台上的刘少奇的指示,要周扬“有病养病,病好了再接受批判”。半年之后他才从天津回北京,回京后没有回家(他家就在中宣部院内的子民堂),直接关在安定门外的一个部的招待所(那时陶铸还没有垮台。后来听说那几次斗争会周扬就是从被监护的地方揪出来挨斗的)。后来周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1975年6月,林默涵被中宣部解除监护,恢复自由后,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感谢,毛在信上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病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于是周扬在7月14日被释放出狱,获得自由。不过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中央宣传部,到了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了。

(责任编辑 方实)

在香港开辟

“反蒋第二条战线”的方方

● 张开明

自1946年7月至1949年5月，作为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方方，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勋。同时，方方还和香港分局领导成员一起，广泛地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许多佳话，谱写了动人的篇章。

广泛团结在港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建立“反蒋第二条战线”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国民党军队前线节节败退，后方危机重重。国民党为维护其独裁专制统治，对民主党派采取了高压政策。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非法”，明令解散民主同盟。其他民主党派也因受到残酷迫害而转入地下活动，致使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和上层爱国民主人士处境非常困难。时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的方方和分局领导成员，积极配合上海、南京、重庆等地的地下党组织，帮助爱国民主人士脱离虎口，安全地转移到香港。从1947年秋到1948年春，大多数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都云集香港。为了做好统战工作，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派章汉夫、许涤新、胡绳、乔冠华、林默涵、



方方同志

廖沫沙、邵荃麟、龚澎、肖贤发等同志到香港。

方方的夫人苏惠，于1942年之后撰文回忆方方当年在香港开展党的统战工作时说，为了接待和安置好大家的生活，在当时分局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自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争取和团结工作。他们中间派别很多，思想也各不相

同，有的政治上非常靠拢我们党，有的则对我们党还不够了解，也不够信任，甚至还有暗中反对我们的。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方方一再强调必须采取慎重、灵活的方针，他用吃豆腐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统战工作不能太硬，要软些和灵活些。他说，只要他们反蒋，我们就要团结，就要“求同存异”。

在这期间，方方还亲自撰写文章，阐明中国共产党实行统一战线的性质、目的、对象及要旨。方方及其所领导的香港分局按照党中央指示，积极在华南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反蒋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方方还同分局领导成员尹林平、章汉夫、连贯、潘汉年、饶彰风、许涤新、夏衍等同志一起，组成了一个专门的领导小组。

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促进民主党派投入反蒋爱国斗争，打破“中间路线”和“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方方热诚地关心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经常会见他们，或与他们一起座谈，或登门拜访，促膝谈心，耐心地倾听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由于他礼贤下士，诚恳待人，许多民主人士、爱国人士和爱国侨胞都把他当作自己的“知音”。不少民主人士在方方和香港分局其他同志的启发和引导下，要求参加人民的解放事业。1946年12月，中国劳动协会主席朱学范，因为发表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反对召开伪“国大”的声明，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而转移到香港。方方代表我们党设宴欢迎他，向他转达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怀和问候，表示我们党支持“劳协”在香港开展活动的立场。12月6日，当朱学范在香港遭国民党特务暗算，被汽车撞伤时，方方带着刘少奇的慰问电赶到医院去看望，使他深受感动。从此，朱学范更加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更积极地投身到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去。1948年初，朱学范由香港安全抵达东北解放区，毛泽东、周恩来向他致电“表示热烈欢迎”，对于他“决心与中共

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的行动，表示极为“欣慰。”

方方对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老人的敬重和关心，也是令人感动的。他经常登门看望她老人家，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何香凝在香港的生活比较清苦，常常要亲自动手操持家务。她曾经向方方和苏惠赠送了一幅梅花和一个条幅，在条幅上写着二十个苍劲娟秀的大字：

卅年没洗衣，水冷如针刺。

欲酬平生志，何惜十手指。

诗言志。这是何香凝老人当时的生活情感和爱国爱民志向的生动写照。

在此期间，方方依靠德高望重的何香凝老人做了大量的争取、团结民主人士的工作。他通过老人说服有关的民主人士以团结为重，顾全大局，终于使他们的思想趋于一致。方方也经常去拜访李济深，向他说明、解释我们党的政策和主张，争取他靠拢我们党。根据香港分局和方方的安排，香港工委还先后派出李嘉人、谭天度、李镇靖等同志去帮助李济深开展工作。1948年1月1日，由国民党的民主派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柳亚子出面，在香港举行了由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的反蒋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等组织的联席会议，公开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柳亚子、蔡廷锴、蒋光鼐、朱蕴山为主要领导人。他们在成立宣言等文件中，提出了“民革”的宗旨，其主要内容是：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和平，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成立由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民革”宣告成立，在香港和全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给予国民党蒋介石一个沉重的打击。1948年1月5日，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支持下，在方方的具体帮助下，沈钧儒、章伯钧、邓初民等民盟领导人，在香港召集民盟进步成员，举行一届三中全会，重建了民盟中央领导机关，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独裁政府压迫、解散民盟的非法行为，并宣布民盟由中立的第三者转到中国共产党一边，拥护人民解放

战争，提出了粉碎蒋介石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反对美国侵略中国、与一切民主党派结成民主统一战线等四项主张。当时，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也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方方等同志的帮助和影响下，积极投身于反蒋的爱国民主运动，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方方十分注意做好知名人士的工作，同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解释我党的各项政策，促使一些民主人士放弃幻想，转而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尤其是“民革”正式成立、“民盟”重建领导机构，宣告了在国共两党之外走“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幻想的破产。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马叙伦、郭沫若、邓初民、侯外庐、李章达、邵荃麟等均出席了由中共香港分局通过《华商报》出面组织的批判“自由主义运动”的座谈会。他们的发言和批判，有力地打破了一些人对“中间力量”的幻想，教育和帮助了动摇不定的民主人士，使他们不搞“第三势力”，不搞“第三武装”，转而支持人民解放战争。著名的爱国将领蔡廷锴就曾拒绝了宋子文的拉拢，主动把家乡的全部武装交给当地游击队，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贡献，一时被传为佳话。

领导以香港为中心的“新政协运动”，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准备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的号召，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些口号发出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集会，发表宣言和声明，表示热烈响应，并通电全国，要求同胞们共策完成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伟大事业。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香港为中心的新政协运动迅速开展起来了。

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做好召开新政协的

准备工作，方方和分局其他领导人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加强与民主党派的联系，认真做好民主人士的工作。方方亲自撰写题为《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的文章，在《群众》周刊上发表。同时要求在港的左翼报纸、刊物大力宣传中共“五一”口号，向各界人士指明，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的道路，就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道路。方方还采用与民主党派召开座谈会的形式进行半公开的活动。座谈会每周召开一次，边聚餐、边座谈，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轮流主持。如轮到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持，就在李济深家里举行；轮到民盟主持，就在沈钧儒家里举行。每次座谈都有中心议题，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融洽无间。在这期间，方方还曾亲自主持召开过有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王绍鏊、谭平山、茅盾等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召开新政协的若干问题，征询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的意见，促进他们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贡献力量。

方方非常重视发挥爱国民主人士在人民革命事业中的作用。他说：“帮助朋友，使朋友能在共同的方针、口号下发挥其自己的能力，是我们当前统战的唯一努力的方向。”他对我党与民主人士合作出版的《华商报》十分关怀，要求办报的同志把它办成一张接受我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报刊，鲜明地高举爱国、民主的旗帜，宣传我党的主张，扩大我党的影响。方方又通过香港工委与民主人士创办了达德学院，推选陈其瑗从美国回来当院长，并邀请了许多有名望的专家、教授到学院任教。达德学院办得生动活泼，名闻遐迩，吸引了许多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有志青年，纷纷从华南和全国各地前来求学，许多人后来成为革命事业的骨干。

方方还把团结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作为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分来抓。根据党的指示，他派出饶彰风等一批干部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联系各阶层的华侨。方方和分局的同志很注意做好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工作。在我党工作的影响下，陈嘉庚先生发动广大侨胞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实现

和平、民主、独立的各项主张。在他的带动下，广大侨胞积极出钱、出力，捐献了大量的物资，支援祖国的解放战争，迎接全国的胜利。

周密部署，巧妙安排，出色完成 秘密护送民主人士离港北上的 特殊使命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形势下，新政协运动迅速由讨论阶段进入实际行动阶段。1948年8月9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方方并香港分局的电报，指出：“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随后，方方、潘汉年等和以解放区救济总会特派员名义赶到香港的钱之光着手研究秘密护送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的工作。此间，中共中央又指示方方、潘汉年、刘晓等设法把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电报转给她。电报上写道：“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为了胜利完成护送民主人士离港赴解放区的这一特殊使命，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成立一个专门领导小组进行工作，由潘汉年、连贯、饶彰风、夏衍、许涤新等同志具体负责。方方亲自与小组的同志们进行反复研究，对民主人士如何顺利地离开香港，走哪条路，租用哪个国家的轮船，谁来负责护送等等，都作了周密的布置和巧妙的安排。1948年8月，方方亲自布置分局委员、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分局政治秘书李嘉人负责护送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并委托他俩向中央作工作汇报。然后，又组织了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其中有些人的离港，还充满传奇性的动人情节。特别是李济深如何安全离开香港，是个大难题。他是一个中外关注的人物，桂系以及英美两国还有一些政治势力要拉拢他，国民党

反动派要暗算他。港英当局在半山区的干德道李济深的住宅对门租了一层楼，派了两个特工人员住进去监视李的行动。港英当局的警方官员也经常以“关心安全”为名上门探访。如何使李济深安全、顺利地离开香港，方方、潘汉年、连贯、饶彰风等同志殚精竭虑，进行周密安排。李济深接受连贯的建议，当晚在家宴客。他故意只穿一件小夹袄，而把外衣挂在客厅的衣架上，只见室内觥筹交错，李济深与亲朋畅饮。宴会正进行中，李济深离席，外衣依然挂在衣架上，他先到厕所转一转，然后悄悄出了家门，在二十米远的地方，上了一辆刚刚到达那里等候他的小车，直到《华商报》董事长邓文剑家，方方、连贯、饶彰风等同志在此迎候。郭沫若、沈钧儒等七人已先行到达。晚上九时，陈先生与李济深夫人同车回家。李济深则由饶彰风陪同送到停泊岸边的小船上，再由杨奇、周而复护送到海中的一艘远洋货轮上。在船上的还有邓初民、彭泽民、朱蕴山、章乃器、茅盾、梅龚彬、洪深、施复亮等。这艘远洋货轮是到东北做买卖的，因此，多数人都化装为商人，以应付检查。为了不致暴露，船主特地把李济深等几个著名人物暂时安顿到底舱的房间里。翌日清晨，经港英水警检查通过，货轮即离港北上。三天后，《华商报》才刊出一则消息：“李济深离港北上参加政协。”到了这时，国民党反动派才如梦方醒。至1949年3月，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蔡廷锴、马叙伦、谭平山、茅盾等一百多人，全部安全到达东北解放区，又转赴华北解放区，为筹备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97年7月1日，当举国欢庆香港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伟大历史时刻，人们也同样深深地怀念当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同志。为了中国人民壮丽的解放事业，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方方和香港分局领导成员所建立的辉煌业绩将永远彪炳史册，他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坦诚交往和亲密的友情，宛如潺潺的香江之水，世代涌流，激励来兹，启人心扉。

（责任编辑 一尘）

我的爸爸 刘伯坚 与宁都起义

● 刘 豹

1894年腊月十四日，我的爸爸刘伯坚诞生于四川省巴中县（今平昌县）龙岗寺小镇上，靠祖父刘显贵开个小客栈，维持生计。

他4岁时就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以后，在具有维新思想的老师指导下，他喜欢读梁启超的《中国魂》。课余，他还贪婪地博览《三国》、《水浒》、《楚词》、唐诗、宋词……他钦佩岳飞“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严明军纪，立志效法祖狄“闻鸡起舞”的精神。

1919年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他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真理的追求。不久，他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赵世炎、李立三等8人在巴黎组成“劳动学会”，后来，陈毅、王若飞等也参加了“劳动学会”。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爸爸刘伯坚以及旅欧的广大青年异常兴奋。他参加了由赵世炎、周恩来发起的、在巴黎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宜。1922年3月，刘伯坚在比利时建立了旅比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组织，他担任旅比支部书记，并和熊味耕一起，介绍聂荣臻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初，刘伯坚和赵世炎介绍聂荣臻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3年11月，中共旅欧总支部选送刘伯坚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旅莫期间，他还先后介绍了郭隆贞等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冯玉祥赴苏联“考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派刘伯坚以华人协会、《前进报》等团体代表的身



1926年春，刘伯坚在苏联莫斯科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份，在莫斯科做冯玉祥的工作。

刘伯坚和冯玉祥住在一起后，利用和冯玉祥一起散步、吃饭等各种时机，谈论革命问题。冯玉祥对刘伯坚很赏识。

同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冯玉祥一再要求刘伯坚随同他一起重整旗鼓，东山再起。8月17日，刘伯坚受党组织的委派，陪同冯玉祥将军由莫斯科秘密回国，并为冯玉祥和国民党准备在五原誓师起草了《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军共同对全国民众的宣言》等七种宣言书。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绥远省五原县（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五原县），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五原誓师，正式脱离北洋军阀体系，参加以推翻军阀统治为目的的国民革命。旋即成立国民军总司令部，冯玉祥任总司令，刘伯坚为政治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军中最高领导人，也是我党早期派往旧军队工作的重要领导干部之一。他在西北军从事革命工作时，一方面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在西北军中组织和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办学校轮训军政干部，宣传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致力于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从而团结、教育、争取了一批有胆识、有才干的爱国将领，如吉鸿昌、赵博生、董振堂等。他既能同邓宝珊、于右任等上层人士建立深情厚谊，又能在广大群众中组织工会、农民协会等各种群众团体，发展党的组织，为党培



刘伯坚与王叔振的结婚照

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种革命斗争。

1927年春天，刘伯坚等共产党人在西安创办了两所比较大的正规学校，一所是隶属于冯玉祥部队的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另一所是具有国共合作性质的中山学院。但学校均由共产党人来领导。邓小平担任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处长，这年他23岁。

部队进驻西安后，国民联军积极准备出师潼关，声援豫、鄂，与北伐军会师中原。战争的胜利，不但夺得了武器、装备，而且成为兵力补充的来源之一，西北军很快发展到20万人。

以刘伯坚为首的大批共产党员，担负了国民军几乎所有部门的政治工作。他们充分地发挥了共产党员的革命积极性和坚强勇敢精神，对国民军进行了强有力的革命教育，是这支军队得以重新崛起，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根本保证。

后来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里，对刘伯坚作了以下记述：“至于政治部，则有刘伯坚主其事……刘伯坚系苏联东方大学毕业，为共产党员，办事极有精神……他自己每日工作18小时，整日孜孜不倦，真是眼食俱废，故工作有特殊成绩。部属同事间对之深为信仰敬佩，我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就抹杀事实，说他不好。是为是，非为非，刘确实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我即无法不钦佩他。”

大革命失败后，我的爸爸刘伯坚和妈妈王叔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为党做秘密工作。1928年春，爸爸

刘伯坚由党中央派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该学院是苏联陆军的最高学府，培养具有正规化和现代化军事知识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同学有刘伯承、左权等。6月，爸爸出席了我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秋，爸爸从莫斯科回国，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1931年7月，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派原属冯玉祥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入赣“剿共”，进占宁都。这时，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吞并我东三省。蒋军嫡系和二十六路军之间监视与反监视的矛盾重重，激起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强烈不满。在生死莫测的险恶困境之中，赵博生、董振堂和广大爱国官兵希望能通过刘伯坚找到红军。他们先后派人去上海，想找刘伯坚汇报筹划起义的详情。

同年12月初，赵博生、董振堂又秘密派出代表去瑞金找到了刘伯坚。当晚，刘伯坚立即转报毛主席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负责同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派刘伯坚具体负责起义的领导工作。刘伯坚代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携带电台秘密来到离宁都城八九十里路的固厚村和赵博生、董振堂的代表秘密联络，指挥宁都起义。

1931年12月14日，在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领导下，著名的“宁都起义”爆发了。一万七千余人脱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营垒，加入红军的铁流。刘伯坚在固厚的欢迎会上，曾引用列宁关于“起义是一种艺术”的话，高度赞扬了这一大规模起义的重大胜利和圆满成功。他还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授予起义部队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并任命了红五军团的总指挥、副总指挥、参谋长、军长。从此，红军中又一支坚强的战斗力量迎着革命的风暴光荣地诞生了。

在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过程中，刘伯坚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力争把这支起义队伍完整地改编成为红军的第五军团。当时正是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在如何改造宁都起义部队的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王明等人对宁都起义拉出来的这支队伍，怀疑，信不过，坚持“要兵不要官”的错误主张，提出要把这支队伍全部分散到红军各个部队里去。刘伯坚坚决反对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做法，他站得高，看得远，不仅看到这支部队暴动的巨大作用，还特别注意扩大它的政治影响。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改编为我军的第五军团后，进步很快，作战勇猛，革命坚决。

宁都起义产生了红军第五军团，中央苏区的红军由原来的四万人左右，一举增至六万多人，这对于壮大人民革命力量，起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宁都起义后，驻

扎在广昌的白军，吓得惊慌失措，仓皇向南城、南丰等地逃窜。至此，中央苏区发展到21个县，总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左右，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鼎盛时期。

宁都起义在我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1938年12月，在纪念宁都起义7周年时，毛主席曾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刘伯坚在策划宁都起义后，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他领导的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宁都起义的官兵一下子由白军当了红军，许多人缺乏思想准备，加之北方军队到南方来，水土不服，吃不惯江西的红米饭，又怕爬山路下水田，对艰苦生活过不惯。还有一些营团以上的干部对红军制度、对土地革命的政策不太理解，有思想情绪。面对这些实际情况，刘伯坚就博引古今，晓以大义，披沥肝胆，诚挚相待，常常与干部作彻夜长谈，说形势、讲政策，宣传红军的宗旨和中国革命必胜的光明前途，把许多本来是满面愁苦的军官说得满心喜悦，愉快地留下来当红军。

不少宁都起义的军官，后来成为我军卓越的将领。他们说“要不是伯坚同志，我们当中许多人就很难在革命阵营里呆下去。”

黄镇曾回忆说：“我和姬鹏飞、王幼平、李达、孙毅、苏进等，都是宁都起义过来的，都在伯坚的领导下工作过，都受到他的尊重和爱护。当我们这些人一提起伯坚同志时，都很思念和敬重他，总是把他当做我们的亲兄长和革命的启蒙师。他对我的教诲很深，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勤奋好学，诲人不倦，艰苦朴素，从来没有摆过官架子，各方面都起到表率模范作用。他胸怀宽广，善于团结人，那时正是王明极‘左’路线干扰时期，要不是刘伯坚善于做团结人的工作，将会有许多起义过来的军官离开红军。”

红五军团的政治工作非常活跃。刘伯坚亲自给红五军团创办《猛进报》，组建“猛进剧团”，举办文化娱乐训练班。在连队里建立了军人俱乐部、“列宁室”；官兵们办墙报，开娱乐晚会、唱歌、识字念书，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短时间的教育、整顿和改造，年轻的红五军团，迅速地走上巩固和创造铁的红军的道路，不久就以崭新的姿态和兄弟部队并肩战斗，活跃在反“围剿”的战场上。

1934年春，爸爸刘伯坚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挤出红五军团，在于都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毛主席来到于都，他一到于都就找刘伯坚广泛了解党内军内以及人民群众中的种种情况，他们推心置腹纵谈形势和任务，常常谈到深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的爸爸刘伯坚在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关头，被安排留在苏区打游击。我的妈妈王叔振在闽西从事妇女工作，发动群众支援革命战争。当时，妈妈怀着身孕，她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生活和工作中的许多困难；妈妈临产时，环境异常艰苦，她只能熬着疼痛，自己用火把剪刀烧了烧，为自己接生。生下熊弟一个月，为了不影射革命工作，她和爸爸商定将弟弟送给当地的贫农黄映达、满菊夫妇抚养。现在福建省连城县展出了妈妈的革命事迹和她送子给黄映达家的遗书手迹。她想等革命胜利后，来认领自己的儿子。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后来自己竟会惨死在王明路线的屠刀之下。

1935年2月，爸爸不得不把我——他心爱的第二个儿子豹儿寄养出去。他通过地方党组织找到了贫农郭贱姑老婆婆。一天，郭贱姑来到了赣南军区政治部，爸爸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她，并亲切诚恳地对郭贱姑说：“我要随部队打仗，不能把豹儿带在身边，现在把豹儿交托给您抚养，等革命胜利了，我会来接豹儿的，到那时我会很好地报答您老人家的。如果我牺牲了，就让豹儿做您的孙子。”在一旁的警卫员罗高听到此话又看到此情此景，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傍晚，爸爸把我放在一只箩筐里，另一只箩筐装着衣服，由一个红军战士挑着。爸爸拄着拐杖和几个红军战士一起送我。我们走的是山路，在山沟里走。山坡上，有高大的松树，稀疏的毛竹，还有数不清的杂乱的灌木。道路崎岖难行，天黑了，爸爸等人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前进。夜色阴暗，看不见人影，红军战士身边虽然带着手电筒，但是由于敌情严重，环境恶劣，不是特殊情况，是不准用的。爸爸和同志们寂静无声中走着，四周一片漆黑，只能听到四野草虫的唧唧声，山溪淙淙的流水声。忽然远处哨兵厉声叱问：“口令！”走在前面的罗高当即回答。爸爸拄着拐杖送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还是依依不舍，难分难离。

要走出山口时，爸爸停住了脚对我说“豹儿，爸爸不能再送了，你要听婆婆的话。”这时，走在前面的罗高，跑过来向爸爸敬了最后一个军礼，爸爸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心情沉重地说：“你们疏散以后，要特别珍重，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要坚决相信胜利不属于反动派，而一定属于人民。”罗高听了后，难以抑制自己的内心激动，说道：“请主任放心，我有办法对付敌人。”

我看到爸爸要离开我，就哭着对爸爸说“爸爸，别把我送给老百姓，让我随您打仗去！”爸爸听了儿子乳声乳气的话，忍不住落下泪来，他哄着我说：“现在爸爸要跟敌人打仗，不能带着你，等打了胜仗后，爸爸一定会来接你的！”我接过话说“爸爸，您一定要来接我啊！”爸爸久久地站在那里，望着离去的儿子和战士的身影，慢慢



刘伯坚于江西大余县监狱
写给妻子王叔振的绝笔信

地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想不到，这次爸爸和我的离别，竟成了永远的离别。

在陈毅同志领导的赣南游击战争中，爸爸奉命率部在向赣南油山地区突围转移时，为掩护宣传队的一些小战士，不幸身负重伤，无法行动，在万分危急的时刻，他命令身边的战士赶快冲出去，他说：“能够冲出去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的力量。”他自己则以负伤之躯，掩护同志们突围。他把生的希望让给部下，表现了一个红军指挥员的高尚品德。后终因敌众我寡，落入敌人魔掌，被押解大庾（今大余）县城广东军阀余汉谋军部。1935年3月11日，敌人给他钉上了沉重的脚镣手铐，由大庾县监狱移到绥靖公署候审室。在移送路上，敌人故意押着爸爸走一条繁华的青菜街，以显示敌人反共的武功，威吓群众，妄图从精神上解除爸爸的斗志。结果敌人失策，爸爸正气凛然、气宇轩昂，拖着一副十多斤重的铁镣，向含泪伫立的乡亲频频点头示意，从容不迫地走过大街。他那为工农解放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气概，深深地铭刻在大余人民的心目中。在候审室内，他带着铁镣，写下气吞山河的《带镣行》，展示了革命先烈为着“工农齐解放”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胸怀。

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踽踽复踽踽。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祥。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他知道敌人要对他下毒手，又用他铁镣紧锁的手，给他的兄嫂写下了扣人心弦、催人奋进的遗书：“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鲜血不是空流了的。”他还在遗书中反复叮

咛亲友，不要为营救他到处奔走。在面临生死抉择的严重关头，他毫不犹豫地摒弃这一线生机，用生命和鲜血来维护党的尊严、党的荣誉。这充分地体现了共产主义者的伟大的献身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党的事业。

国民党反动派从刘伯坚身上一无所获，恼羞成怒，决定杀害他。在“就要上杀场”的一刹那，他挥笔疾书，给妻子王叔振写了最后一封信：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真寄陝西凤呈大嫂及五、六诸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

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要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致以

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我的爸爸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妈妈竟未能见到他的这一绝笔。就在爸爸牺牲前后几天，一个风雨之夜，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几名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人，把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机要科科长王叔振，带到闽西长汀县四都乡西面的姜畲坑，秘密地杀害了。

12时，临刑的时间已到，粤军（广东军阀）头目问刘伯坚还有什么后事要办，爸爸安祥地说：“有的。枪毙我后就葬在大庾梅关。”

“为何要葬在梅关？”

“第一，我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让我长年和庾岭红梅为友，傲雪斗霜迎春。第二，葬我在梅关，站得高，看得远，让我能看到南国烽烟燃遍全国，让熊熊的革命烈火把法西斯制度彻底烧掉！”

粤军头目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气道：“刘伯坚这个人，死到临头还这么硬。”

3月2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向余汉谋转达蒋介石的密令，对刘伯坚等五人下了毒手。临刑前，刘伯坚昂首挺胸，引吭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刘伯坚光荣牺牲在大庾县城东北郊的金莲山麓，时年40岁。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在首都建设规划



我怎么也想不到陈干会先我而去。我总觉得他比我年轻得多，谈起话来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想不到1994年11月3日那次谈话，竟成了最后的倾谈！他心脏病第三次复发，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出院后，我去看他，一谈起来，陈干简直是又讲又画，滔滔不绝，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陈干说，听到一些情况，心里很憋气，早就想说一说心里的话。

陈干感到憋气的是，这些年北京街头出现了一些怪物，如“××广场”，就是一怪。这个庞大建筑，四周并无广场，而恬然命之曰“广场”。还有，北京城里城外，出现了许多“城”，几间房子就可以叫一座“城”，不知道这是从什么地方移植来的“文化”。使陈干憋气的主要还不是那“广场”二字。这个“广场”又称之为“集商业、办公、文化、娱乐等设施为一体”。陈干找来了图纸，边说边解释：“这个巨大的火柴盒，东起东单路口，西到王府井路口，长有几百米，高度达80米，超过中央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一倍。它比天安门广场建筑群高出一倍，大会堂、

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以及故宫等等，简直成了陪衬它的盆景。”我问他：“你听到大家有什么意见？”陈干说：“先前我不知道，出院后听到种种议论。北京规划设计部门，建设部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等各方面的专家，绝大多数都反对。”我又问：“那为什么就干起来呢？”陈干一脸愤慨地说：“陈希同搞专制，一言堂，不让人说话！”陈干再次给我讲了那个“火柴盒”有害的状况：“就是这一个又蠢又不协调的设计，陈希同也不许说一个不字！我听几位同志说，陈希同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找去看这个方案，当着外商的面，他竟说，谁也不许提反对性意见。谁要是提了，谁就是没本事，谁就辞职。他甚至当众对外商说，我同意了，就算定了。”陈干怒不可遏：“多么专横！多么无耻！”接着，陈干又给我讲了一个可悲的笑话，他带着激动的神情说：“很多同志早就对陈希同等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上的霸道和瞎指挥有意见，但敢怒不敢言。这次的‘××广场’事件，冲突就更突出了。报纸上披露了王府井新华书店即将拆除的事后，引起全国的关注。但他们还是加紧开工了。”陈干愤愤地指着陈希同不准人提不同意见的那个方案说，新华书店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这个图上作为附属建筑，面积又很小，怎么能这样对待国家的新华书店！怎么能这样对待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这一谈就是将近两个小时，陈干毫无倦容。临行时，说要写意见书。我说，可以告诉其他同志，把情况详细整理一下，我也看看。

陈干回去过了两天，打电话说，已告诉一位同志整理材料。没想到，不久就传来陈干逝世的

上敢于坚持不同意见的陈干

● 郑天翔

噩耗。

陈干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设计师。他一生献身于首都城市建设规划，他热爱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为国家建设的日新月异而兴高采烈，他也对党内严重的消极腐败现象忧心如焚，更对首都建设中那些专横霸道、瞎指挥、踢开规划、拿原则做交易的人愤愤不已。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一个党性坚强的共产党员。陈希同执意要搞那愚蠢的“××广场”事件，深深地刺痛了他。

这些年来，我和陈干都从第一线退下来了，我们一见面总是聊个没完。聊的最多的还是有关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特别是关于北京建设的事情。

1949年，北京解放不久，陈干就参加了首都的建设和规划工作。从1953年起我们共事，参加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工作。陈干是北京最早的城市规划专家之一。他从头到尾直接进行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制订和多次的修改工作。他勤于动手，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再加上有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历史知识，在实践磨练中逐步成长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城市规划专家。全国许多城市的规划工作，他都参与过，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建设，他都去考察过。因而，每次来和我交谈，总是使我获益。

我们谈论最多的是社会主义城市究竟怎样建设？很显然，社会主义城市建设同资本主义城市建设有明显的共性。然而，社会主义城市建设同资本主义城市建设有没有本质的区别？在我

们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时，是不是要照搬西方城市的模式？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北京，是不是要照抄世界大都市？陈干说，他仔细观察过，高楼上那种大疙瘩（指旋转厅），北京比东京还多。常听人说，“国外就是这么办的”。城市建设是复杂的工程，它既反映生产力，也反映生产关系，既反映基础，也反映上层建筑。我们首都的城市建设，既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也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既要遵循现代化城市的一般规律，也要遵循社会主义城市的特殊规律，更要遵循首都和这个文化古城的特殊规律。很显然，这是亟待我国城市建设专家共同研究、探讨的课题。我曾多次建议陈干写一本关于北京城市规划的书，他说，准备写北京城市规划史。从历史事实出发，总结其丰富的实际经验，探索首都北京城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陈干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责任。

社会主义首都城市建设的特征，表现在北京的城市建设总方针上，就是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为人民服务，归根到底，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旧北京保存了大量封建时代城市规划、建筑艺术和技术的光辉灿烂的遗产，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的珍宝，是中华民族卓越才能的见证。然而，旧北京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也不适应为中央、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们首都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任务，一方面要保护北京珍贵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还要把旧北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北京。陈干和他的同事们，在总体规划工作中具体地体现了这个历史

的转变。在制订规划和实际操作中，我们有过一些失误，在十年动乱中，北京的总体规划和文化古迹遭到浩劫。然而，毕竟历史性的转变是实现了。

新中国建国 47 年，首都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最近这十几年，城市建房以每年千万平方米以上的规模进行，市政设施各个方面高速发展，这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建设上也是罕见的。北京的面貌日新月异，国人振奋，世界瞩目。1956 年 6 月，周恩来总理视察北京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工作，临行时说：“这个规划示意图应该叫快意图，这个室叫快意室。”看到快意图的许多部分由纸上搬到了地上，我们从“快意室”过来的人能不兴高采烈！然而，也有令人不快意的事情。既然是首都，是政治中心，那么处理首都建设问题时，就不能不讲政治。前面提到的“××广场”，就是一个同政治中心极不相容的东西。试想，那样丑陋愚蠢的“一体”，有什么资格屹立于长安街上？而且以其庞大的块头凌驾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之上！而事情并不止此。东单公园也叫庞然大物占领了。东单公园建国以来，一直保留了 40 多年。不是没有人想在这里进行建筑，只是因为它是公共绿地，怎么忽然间就高楼矗起来了？再看一看，北京城的其他地方，有多少历史文化古迹和景色秀丽的胜地不受切削和侵犯？一些房地产资本，甚至是空头资本，以最大限度地千方百计追求这些黄金地段。事实上他们正主宰着北京城市建设。他们占的街、占的道、占的山、占的水、占的学校、占的体育场，眼睛里哪有什么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哪里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陈干曾经自豪地跟我说，他接待过欧洲某大国的城市建设代表团。他们看到北京市区内的公园、绿地那么多，赞不绝口，自认弗如。陈干常常以北京的河湖水系、公园、森林、绿化自豪，以它们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性质而自豪。他说，这在世界大城市里是少有的，是北京的一大特色。为了这个特色，陈干和他的同事们付出辛勤劳动。他们跋山涉水，调查勘察，在 1953 年就提出了引潮白河水入京的意见，在 1956 年就具体确定了密云水库的位置

和引水入城的路线。陈干和李准、沈其等人顶着“大绿地主义”的帽子，为规划首都北京的集团式分散布局和园林化，达到不眠不休的地步。他认为从城市布局上看，分散集团化和园林化是最优越，最有中国特色，最具有民族风格的布局。当拜金主义借着现代化的名义盛行、总体规划已经被置之脑后时，他的忧思与日俱增。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的城市建设方向，确实是一个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陈干正在思考和探索这个问题。然而，他却匆匆促促逝去，去得那么突然！我们应该把经验总结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科学。陈干同志有志于此，也有能力探索这样的科学。然而他壮志未酬，给我们留下的是深深的痛楚和遗憾！（作者为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曾任北京市市委副书记）

（责任编辑 仲文）

广告

食道癌治疗有新药

郑州市邙山中医院肿瘤专科研制成一种中药丸，患者口中含化，对治疗食道癌、贲门癌、胃癌有显著疗效。此治疗方法尤其适合于不宜作手术、化疗、放疗或愈后又复发的患者。对已滴水难进的病人，含化药丸 1—3 天，大部分即可饮水进食。疼、咳、肿、呕吐皆可治。对一般的患者，按照医生指示用药后，大部分饮食能恢复正常。可汇款购药，设专人负责咨询。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南阳路中段生产路 7 号付 1 号

来院路线：从郑州火车站乘 4 路或 39 路汽车到海棠寺站下车，向北 50 米（郑州市邙山公安分局西对面）即到。

联系人 宋国厂

电话：(0371)3832221

邮编 450053

赴港观礼

归来随想

● 柯 华

1997年7月1日零时零秒,我们中国内地观礼团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大厅,亲眼目睹英国国旗准时降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高高升起。

在英国国旗降落前片刻,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代表英国女王讲话说:“今夜这个重要、独特的仪式……凝聚了香港历史的改变与延续”,“香港将交还给中国”。香港和平有序地回归,标志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新的曙光在前!我不由得想起了近30年前的一桩往事。

1957年,我陪同聂荣臻元帅应邀参加加纳独立庆典。典礼在户外进行,代表英国王室的是肯特公爵夫人(肯特公爵是王室第七位继承人)。在豪华的帐篷里,她高高地端坐在特制的座椅上,俨然“主人”般矜持地接见各国贵宾。她在致词中,对加纳国徽上“正义”二字,作了特别的阐释:“正义意味着君主与她的臣民之间的合理关系”。恩克鲁玛总统驳斥说:“我们将把一直到今天将我们束缚在英国身上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枷锁抛弃在身后!”但是,驻加纳的英国总督克拉克仍然大言不惭地说:“我自以能身为一个大不列颠王国的殖民主义者而感到骄傲。”英国人所允诺的加纳独立,远不彻底。担任加纳三军司令的仍然是英国人,加纳外交部除部长外,有些主要官员也仍然是英国人,加纳主要出口农产品可可的价格也是由远在伦敦的英国人确定的……所幸的是,在以后的年代里,经加纳人民继续奋斗,加纳的独立才获得了新的胜利。

两相比较,自非同日可语。

从香港观礼归来,欣喜之余,就如何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想到一些问题:

一、香港今后与内地的关系,比之过去与英国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内地官员去香港的也会比过去英国官员去香港的多得多。英国部级以上官员仅数十人,司级官员也不外百数十人,而前者我国在职的几百人,后者多达几千人。我很替董建华先生和陈方安生女士以及二三十位香港司级官员着想,他们将如何接待内地如此众多的官员?接待这些官员又将如何正常地进行他们自己的工作?我想,中央将会做出严格规定,国务院港澳办会做一个好的“守门员”;我还以为,一切因私到港的内地官员不得拜会特区政府官员;一切因公有必要与特区官员接触的,应经港澳办统一归口管理安排。迎送、宴请等也应有严格限制,总之,一切礼节从简。

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一系列大政方针,中央定将坚决贯彻无疑。我只想到: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内地应多考虑“两制”问题,香港则应多考虑“一国”问题;内地各部门、各省市对香港只有兄弟协作和支持帮助的义务,而无干预特区工作的权利;凡事首先要从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着想,不可有只顾自己部门或地方利益的狭隘利己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对香港应兴应革的事情,宁可慢些,稳些,不可求急求快,尤应尊重特区政府的意见。

三、要充分考虑由于历史原因和实行不同制度所带来的价值观的差异,思想、生活方式的差别。香港市民中还有相当部分是在1949年以后由内地迁去的,在过去的社会大变动中,由于相当长时期里“左”的干扰,致使现在香港一些同胞在思想感情上或留有伤痕。至于青年人,由于英国的管治,他们无缘或很少有机会接受民族、祖国观念的教育。但他们都在艰难困顿中创家立业,为香港繁荣做出了贡献,他们爱港、爱国,应该善待他们,尊重他们,以增进理解和沟通,切忌“左”的思想作怪。对此,董建华先生和香港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已注意到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更令人欣慰。

(责任编辑 杨肇林)

从姚文元的札记看

“四人帮”覆灭前的罪恶心态

● 李耐因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主要成员被隔离审查时，从姚文元住处查获他手写的若干本札记。按姚文元在札记中说，这是他记录下来作“斗争参考”的，他在其中一篇中还给他的札记起了名字，叫《革命狂想曲札记》，并加了括号（浪漫主义的）。现在，我们原原本本摘录其中1976年“清明”前后的一部分札记，并稍作删节，发表于下。从这札记中可以看出“四人帮”是怎样密谋、策划、制造舆论打倒邓小平、压制悼念周恩来和疯狂镇压人民群众的，也透露出他们阴谋颠覆共和国、篡夺最高权力的野心。

1976年清明到1997年，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四人帮”的主犯们大多已成粪土。“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今天，我国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蓬蓬勃勃建设现代化强大国家。回顾往事，大家都会更加珍惜今天。

为了便于今天不大了解当时历史真相的青年阅读，笔者在文中加了点注解、按语，介绍一点必要的背景情况。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一日

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

手无寸铁，就一枝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这枝笔剥夺掉。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

从二月六日人民日报文章（注：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发表，到明天批判不肯改悔走资派的“三项指示为纲”，批邓是深入一步，群众也发动起来了。

外国人都说，宣传工具是在左派手中。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

现在运动步伐加快了。

人极累，看到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人间万窍号呼”，直指走资派，心中是高兴的。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

十七日报导（注：《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员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发表后，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资产阶级是多么渴望把新闻武器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去啊！这一武器是多么有力！

一九七六年三月七日

四川出现贴张春桥的大字报，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的。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

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

晓夫式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据说弄了一批学生（高干子弟）上街。

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

每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反动势力都要跳出来“示威”一番。也好，让革命群众看看。只是中央政治局太迟钝了。

清明节将要到，发现南京、北京、太原都有借此“悼念”总理的活动而闹事的苗头。

按语：1976年，是光明的中国同黑暗的中国决战的一年。这一年将永远载入中国史册。野心家、阴谋家可以欺骗人民于一时，却不能永久。1976年，苦难的中国人民觉醒了，不是少数而是多数，他们要讲话，要斗争，要扫除“四人帮”这伙害人虫。这一年的春天，四川、南京、西安、太原、北京……声讨“四人帮”的斗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这使得姚文元及他的同伙们心惊肉跳。多行不义必自毙，姚文元们怕得很哩，什么“不胜光荣之至”，那不过是“夜行人吹口哨”，给自己壮胆而已。不然怎么讲到准备“杀头坐牢”的话？似乎姚文元早有预感。1975年他回上海一趟，在七月二日的札记中就颇有点心惊地说：“我能回上海的时机，这怕是最后一次或接近最后一次了！”果然，他说对了。同一个时期，“四人帮”的另一个头目张春桥向他们的亲信也讲过类似的话：“准备杀头”，“赤条条来去”。“四人帮”的罪恶太大了，看来他们也早已朦朦胧胧地作了可悲下场的思想准备。

人们要注意，姚文元说他“手无寸铁，就一枝笔，是铅笔”，似乎他只是“一介书生”而已。切不可小视此人。他是“四人帮”中一员大将，控制着舆论工具，一大批煽风点火、致人于死地的文章、社论就出自此人之手。“手无寸铁”，不见得；姚文元手中的笔就是刀，吴晗、邓拓和其他许多老干部、专家、学者就丧命在这枝笔下。这时候姚文元又在写批邓的文章，什么“卖国”呀，“投降”呀，妄图致邓小平于死地。“文革”中有多少人冤死在姚文元这枝笔下！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

南京“大字报”已点了张春桥名，是“打倒”“揪出”“野心家”“阴谋家”……还是林彪庐山会议那一套。

昨晚开六人紧急会议（注：不是政治局会议，不是文革小组会议，叫“六人紧急会议”，六个什么人？没说。很有点阴谋家的味道。），我坚持起草一严肃通知……发江苏并发全国。估计这几条下去，会对这股猖狂反扑的妖风起当头一棒的作用，而使人们更加认识邓小平的反

动性。但斗争不会就此止歇。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这一点更清楚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

继江苏、浙江等地后，反动标语开始在北京出现，昨日天安门人群激增。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他们是否已用完了它的后备力量，我看还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科学院、七机部）是它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煽动冲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成为一切反革命势力的眼中钉，是人民日报的光荣。而这一切说明：如果党内走资派得逞，不仅是丧失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民主革命成果也会丧失。反共“还乡团”会一起扑上来屠杀、镇压劳动人民。还有一个搞匈牙利、林彪式政变的反革命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郎哥，更不要那拉氏”。

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

今日高潮仍是国家机关七机部、科学院等居多……反革命活动锻炼出一批革命派，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太顺了不好。

晚开政治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正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同志的名，内容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园，派民兵、部队戒严，封锁道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园。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捉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啊！太软。

前两个月批邓时我曾说，如果下次再来比这次更厉害时，人们都当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果然如此！从全国看，太原、西安、沈阳均有发现。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

按语：临近清明节，人民长期被压制的愤怒终于爆发开来。人民群众深切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这却使“四人帮”吓破了胆。姚文元那种反革命的“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感情，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了。他们是一伙什么东西，不是很清楚了吗？他说的“反革命口号”，正是革命的口号；他说的“反革命势力”，正是人民觉醒的势力。在人民觉醒面前，“四人帮”与人民为敌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姚文元不满足于

作刀笔吏了，他大声叫喊“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注：不是一个，不是少数，而是“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他叫嚷“专政不是绣花”，他叫嚷镇压人民还不够，还“太软”，他要大开杀戒了。“手无寸铁”、“温文尔雅”的姚文元剥去伪装，人们看到的是个凶神恶煞的刽子手。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

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人民广场上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今晨，我已把人民日报一份记者手写情况在政治局会上报告。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行动，开短会，不要多议了……当即决定：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外，看了广场全景。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切都在眼前出现了，宛如一场向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望远镜中，看见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

晚，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

按语：姚文元这一天的札记，很有价值。以前我们看到的是人民记述的“四·五”运动经过，现在是从姚文元和“四人帮”那里看他们的原件记述。立场不同，观点当然不一样。但姚文元的札记毕竟是第一手材料，“招认”了他们在幕后是怎样阴谋策划和镇压人民的。

人民群众送一些花圈，贴一点传单，朗诵几首悼念周总理的诗，就“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一个人爬上纪念碑放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用绳子围起来，就“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这是什么逻辑？！为这，他们就要包围、分割，“有力打击”，血洗天安门广场，制造出千古奇冤。姚文元笔下的“战果辉煌”，那是人民的生命和鲜血凝结的。

姚文元在这里供认出，为“四·五事件”定性，他还是“始作俑者”，很立了一功。

“四·五”这一天，躲在人民大会堂楼上挂有帷布的窗口后面，用望远镜向广场窥探的，不只有他，还有张春桥、王洪文等。他们是不敢走下楼来的，因为人民会

把这群给全中国带来灾难和血腥的罪魁祸首们撕成碎片的。

姚文元的这几页札记，不只记录下屠夫们的活动，也印证下人民可歌可泣的英勇。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清晨刚吃安眠药不久，把我们叫去开会……开除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是关键时刻，以果断行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粉碎了反革命事件的首脑。我提出还有份刚发出的情况，是反革命分子在民兵强大威力下被缴械的报道，应补入。由于人民日报的内部报道，把几份合成一份，时间极紧急。我立即把人民日报鲁瑛找来……投入了写稿战斗。

稿子改、排、校、送花了不少时间。

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着，八时来临，收音机响了！在这个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我们这个宣传的前线指挥部解散了。

我怀着一种战斗的喜悦回家，同时又拖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回到家时，感到一种特别的疲劳，坐在沙发上不想多说了，一天只吃了一餐，走了许多路，精神上的紧张……这时随着一个大战役的结束而迸发出来了。

我躺了一下，吃了安眠药，但始终睡不着，又爬起来。是的，不能骄傲，不能麻痹。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政治、组织问题需处理。但是



受审中的姚文元

今天这一切，都以鲜明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是有力的面向国内亿万劳动人民和全世界的宣传，把反革命阴谋煽动彻底戳穿；二是武装起群众，坚决拿起棍子（必要时枪）；三是果断的组织措施……中央机关及时的处理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叛徒。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打破一切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束缚（如要开会“选举”啊，要开“人大”通过啊……），采取果断的清除坏人的组织措施，这是粉碎反革命政变的三项基本经验。

四期简报，均是我修改后发的，留此以作历史的纪念。

（注：姚文元在这里把人民日报《情况汇报·特刊》第265期钉在他的札记本上，这是他的“得意”之作。）

按语：邓小平在“四人帮”诬陷下，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的阴谋得逞了，姚文元们“喜悦”了，但他们也知道阴谋终会被揭穿，正义是压制不了的，他们仍是坐在人民愤怒的火山口上，他们内心的空虚和惊恐仍无法消除，他是“抱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的心情回家，尽管吃了安眠药，仍然睡不着。革命人民在总结教训，反革命们也在总结经验。姚文元总结了他们同人民斗争的三条经验，这就是：制造反革命舆论；抓武装；迫害和清洗一切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革命干部，特别是在中央机构。他们是这样做的，向上海“造反派”突击发放武器（包括轻重机枪、大炮、装甲车等）就是。姚文元向他们在上海的亲信就说过：“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还是暴力解决问题。”把“四人帮”当成什么文化集团，错了，他们在谋划武装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呢，他们嫌开会讨论、人大通过都麻烦，他们一伙人说了算，这是一小撮“无法无天”之徒。

那四篇给“四·五”事件定性的对打倒邓小平起了重要作用的《简报》，是姚文元经过别有用心地剪裁、添加、歪曲、编造的“杰作”（姚文元改了什么，歪曲了什么，编造了什么，1978年《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中作了彻底的揭露）。他那么郑重地当做什么“历史的纪念”保留下来，但历史却无情地嘲弄了这个“文痞”。姚文元“留作纪念”的材料，恰好成为他谋害人民的铁证。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各地形势多数均好。反革命仍有破坏，在意料之中……绝望者狂跳，没有什么奇怪。镇压就是了……

此次天下已定，作词一首，总结以记之，以待下次斗争参考对比：

水调歌头

巍巍雄碑立，堂堂大道通。万千烈士鲜血，化作广场宏。忽见群魔乱舞，阴火嚎声四起，恶鬼逞凶狂。工农齐奋起，铁拳镇爬虫。霹雳震，怒潮涌，扫黑风。誓除明暗丑类，旌旗耀碧空。万里征途尚远，白发红颜携手，文武自（？疑为追）敌踪。回首火烧处，红接倍鲜红。

按语：姚文元的这篇札记很值得认真一读。革命人民被镇压了，邓小平被打下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不能工作了，大批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又遭批斗，“四人帮”似乎觉得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他们要坐天下了，无怪姚文元狂喜地写下“此次天下已定”。人民再有什么“反抗”，“镇压就是了”，他们是何等的踌躇志满！？这个上海滩上靠耍笔杆子陷害人，在“文革”中飞黄腾达起来的暴发文痞姚文元，还胡诌了一篇狗屁不通的《水调歌头》。真是难得的奇文。

把姚文元上述这篇歪词同下述的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的一篇悼念周恩来的激昂壮烈雄词加以对照，倒是满有趣味的。不妨抄录如下，让读者自去比较：

愤讨

山川同作证，伟绩耀八方。
歹徒击破鼓，污毁华栋梁。
含沙欲射影，丧心连病狂。
鬼计言隐晦，弄伎舞刀枪。
狂犬吠红日，无损日光芒。
虻虻撼大树，怒斥不自量！
浦江逆流滚，难阻巨舟航。
宏桥将间断，马卒陷汪洋。

（《革命诗抄》）

无独有偶，当姚文元在狂喜“天下已定”，胡诌歪诗的时候，他的同伙、“四人帮”的另一个大人物张春桥，比他早几天也写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天下已定”。这确非偶然。

张春桥是在写给上海一个人的亲笔信中说的。写信时间是1976年4月18日，也即“四·五”事件以后的十多天。

我们还是照录原信吧。

这一个月，我过得相当紧张。从南京到天安门广场到处闹。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大会堂的，如同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从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

我当着邓小平的面（注：这是晚间的事），我骂了他

是纳吉，他态度恶劣，但没有讲话。我有幸看到了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口气。这一段外人不知道，你们不要吹出去。

现在天下已定，正在扩大胜利。我感到上海镇压反革命劲头不足，不知是什么原因。

张春桥的这封信，虽说什么“不要吹出去”，其实他在上海的亲信们都知道了，而且还受到“极大鼓舞”。这封信满篇流露出的是对邓小平同志不共戴天的仇恨和卑鄙的诬陷。邓小平1974年在毛主席、周总理支持下复出后主持中央工作，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坚持党的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抵制极左思潮，使“四人帮”许多阴谋落空，成为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大障碍，他们咬牙切齿，莫可奈何。“四·五”运动是群众自发地借悼念周恩来，反对批邓，抗议“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伟大革命行动，并没有任何一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四人帮”把这次革命群众运动诬陷为“反革命性质的政治活动”，并将责任硬栽到邓小平头上，说邓小平是总后台，借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自以为是真的“出了一口气”，为此欣喜若狂。

什么“邓小平态度恶劣”，是邓小平“横眉冷对”这群丑类，对他们表示极大的蔑视；真正“丑恶的末日”，是他们自己。1976年4月6日到这一年的10月6日，只有6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最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张春桥、姚文元异口同声地说“天下已定”，似乎从那以后就是“四人帮”的天下了，大有“舍我其谁”踌躇满志的劲头。“四人帮”高兴得太早了。镇压“四·五”事件是他们反动面目的大暴露，他们搬起的石头最终砸了自己的脚。

张春桥还嫌上海镇压革命人民“劲头不足”，姚文元大叫“镇压就是了”，一派杀气腾腾的样子。“四人帮”是一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据说，张春桥曾对他女儿说，找对象要找不怕死的，怕死，不要到我们张家来。这很能说明张春桥是死硬的反革命。

“四·五”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今天重读姚文元的札记和张春桥的信，仍然使人感到触目惊心。假若“四人帮”的阴谋真的得逞，中国的今天将会是什么样子，那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姚文元、张春桥的书信、札记，很有一读的价值，它教育人民对“四人帮”这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决不可姑息，决不可饶恕，要将他们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记住“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温习这段历史，就应更加热爱今天，珍惜今天。遵义会议，使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走上成功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成功之路。今天的中国，正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国泰民安，欣欣向荣，一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盛的中国，即将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切来之何等不易呀！姚文元的“札记”应该引发人们深思。

致 读 者

本刊自1991年创刊以来，日益众多的读者对本刊对人对事对历史的求实存真的严谨态度表示认同和支持，成为本刊的挚友。编辑部每天都接到很多来信，有的亲到杂志社，从刊物内容、文字勘误、版面设计以至广告宣传、经营管理提出重大意见。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忠实而热心的读者，在期刊如林的市场竞争中，本刊的发行量逐年稳步上升。也正因为如此，本刊一直把听取读者意见，加强和读者的联系作为本刊的重要工作之一。为了及时沟通情况，有两件事告知读者：

一、社址迁移。因原址房屋维修，本刊自7月起已迁至新址：北京市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邮

编：100007，电话：64072452（直拨）；64031144 转 2191 或 2004。

开户银行：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沙滩支行；帐号 201057701—73。

二、调整定价。本刊不以营利为目的，定价一直偏低。1997年正文改用质地较好、价格较高的纸张，仍未提高定价。可是由于年初邮费和办公费用涨幅较大，运营出现亏损。本刊为无补贴、自筹资金、自负盈亏单位，持续亏损，势难为继。不得已，自4月份起将零售价由4元调至5元，订阅价仍不变。本刊零售只占发行量的八分之一，此举虽略有弥补，并未完全解决亏损问题。为了刊物的正常出版，社委会经慎重研究，决定1998年将国内定价调为4.8元（包括零售价）；港澳、台定价10港元；国外定价3美元。此乃不得不为，希望广大读者谅解。

《炎黄春秋》杂志社

老报人顾执中两次避难香港

● 刘小清

汪精卫发布对 83 人的通缉令，顾执中的名字赫然在内，遇险逃脱

“从有史以来，新闻记者之遭暗杀，从没有如此之众和如此的残酷，也从没有在一个孤苦的环境中，像上海记者们那样执笔奋战。”

曾在上海《新闻报》担任记者的顾执中，之所以能在他的《报人生涯》中写下这段话，是因为他当时身临其境，对这段中国新闻界最黑暗时期的恐怖生活有着深切的感受。

上海沦陷后，孤岛内的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屈服，特别是在租界内的新闻工作者的斗争尤为显著。当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时，上海报纸一致声讨，痛斥卖国贼。汪精卫为此大为恼怒，在其特工总部成立后，针对新闻界的爆炸、谋杀事件遂频繁发生。

1940 年 6 月中旬的一个早上，座落在望平街上的《申报》报馆突然发出两声巨响，一股浓烟从报馆楼内升腾而起。原来是汪伪特务向报馆内投掷了两枚手榴弹，弹片横飞，数人死伤。

此后，《大美晚报》、《华美晚报》、《中美日报》等报馆均未幸免。不是遭到爆炸，就是遭到持枪特务的袭击。

住新闻区域的《申报》编委瞿绍尹的家中，一日突然闯入汪伪特务数人，向瞿开枪袭击。瞿经狂奔闪躲，伤及臀部，幸得保全性命。瞿成为被袭击的第一名新闻记者。

《大美晚报》副刊编辑朱惺公，在收到特务寄来的恐吓信后，不为所惧。他继续撰文，不但对敌伪揶揄嘲讽，而且表现出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他在文中称“……如孤岛四周仍有国法者，则又何容小丑跳梁，狐鼠横行，暗无天日……余之头颅能得为无情之枪弹所贯，头颅乃不得谓之无价，头颅有价，死何憾乎？”

这不啻于又是一首文天祥的《正气歌》。此后的一天，朱独自行于北河南路，伺伏其后的特务一拥而上，用手枪射击朱的头部。朱应声倒下，血洒大地。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上海报界同人依然奋斗不息。时在《新闻报》工作的资深记者顾执中，对汪伪恐怖活动冷眼相视。他在对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学生讲课时说“我以为上海的形势更加恶化，我们中国新闻记者忠贞地坚守岗位，虽死何憾。惟愿后人踊跃参加，再接再厉。不胜利，战斗不止。”顾执中同时评论上海新闻界这种斗争精神，称：“一个人死了，依然有无数活着的人不顾生死地跟上去，跟敌作战。这些壮烈的事实，必然在中国新闻史上占上最辉煌的一页。”

顾执中依然像平时一样，坚持去报馆上班。这天，有同事将当日一份汉奸报《中华月报》交给顾执中看，上面有汪精卫以伪“国民政府代主席、行政院长”名义发表的对 83 人的“通缉令”，顾执中的名字赫然在内。83 人分别有《申报》、《新闻报》、《大美晚报》、《正言报》、《华美晚报》、《大中通讯社》等新闻界同人。“通缉令”杀气腾腾地宣称：“宜将首恶付诸重典。”显然，汪伪又要对新闻界大开杀戒。

当日，顾执中将受“通缉”的情况告知家人。家人深为担忧。为了减少无谓的牺牲，顾执中决定改住报馆，因为“家里没有铁门，没有巡捕守卫，不及报馆安全”，而报馆其时已采取措施。

《新闻报》馆为四五层楼的钢筋混凝土大厦，建筑相当坚固，在门口堆了沙袋，大门外又装了铁门。扶梯的底层以及二三层入门处也都装有铁门。访客必须填单，由被访者同意后，在会客室会晤。

据顾执中回忆：“我从 7 月 3 日起，携带了简单的铺盖，住在新闻报馆。不过报馆是没有宿舍的，报馆只

为我们置备了几只行军床，有的就设在编辑部办公桌的旁边，有的放在平日内打乒乓球的会议室内。深夜工作完了，就倒在行军床上，盖上被单和衣而睡。早上、中午和晚上，则请服务员到外边去随便买些东西吃，一天到晚，生活得十分沉闷。”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顾执中决定尽快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但当时由上海开往香港的船票非常紧张，顾执中无奈，只有等待。

就在顾执中等待之时，汪伪特务开始了对“通缉令”名单中的人员下毒手。

《大美晚报》中文版主持人张以旭，一日自己开车前往跑马地的起士林咖啡厅，不料为特务发现，乱枪齐发，张躲避不及，死于弹雨之下。

张的遇害令顾执中十分震惊。然而噩耗又接着传来。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又被特务暗杀于离家不远的地方。顾执中同事、《新闻报》编辑倪澜深深夜悄然回家，下了黄包车后即遭特务绑架，以后虽获释放，却因备受折磨，惊悸过度而死。

风声越来越紧。顾执中通过秘密渠道得到消息，汪伪特务下一步将要对他采取行动。他虽有所警惕，却终于未能幸免。以后，顾执中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教训的：“得到几方面的警告后，我自当深居简出，理应加倍警惕。可是我终以为特务并不是什么千里眼顺风耳，会对我的行动能知道得清清楚楚”。正是顾执中自己的这一大意，使他差点酿成大悲剧。

当时，顾执中次子患伤寒，父亲也有病。数日没有回家的顾执中颇不放心，于是在8月17日上午抑制不住地回家一行。顾执中家住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内，下午返回报社时，他出校门口见没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伺伏之人，遂放胆前行。下面发生的事情，顾执中在以后的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

走近萨坡赛路口金龙汽车行门

前的行人道上时，我突然听到劈啪一声，好像有人在我的后面用手重重地打我一记耳光，我立即用右手把我后颈一摸，把手臂旋转过来一看，只见手掌上全是血迹，我立刻明白了我是被枪击了，我立刻采取了行动，用跑步折入萨坡赛路北行，急速地以波浪式的跑法，敌伪特务虽连放数枪，都未命中。

以后，他在广慈医院做了手术，取出了子弹。他的遇刺被诸报端后，亲朋好友纷纷前往医院探望。就在顾执中住院的一天上午，突然医院外面路上又传来砰砰枪声。后来知道是《大美晚报》的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璋遭到暗害。他是顾执中十分熟悉的进步记者，虽被及时抬进广慈医院抢救，却因又连中数枪，伤及要害而亡。

面对这鲜血淋漓的现实，顾执中悲愤之余，不免心情沉重，离沪抵港的愿望更加强烈。他焦灼地等待机会，而两天后机会终于来了。

穿着黑袍，扮成神父， 信步跨上了开往香港 的“总统号”客轮

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上海地方学会曾发起组织“上海人民慰问第三战区代表团”，团长就是顾执中，而团员中唯一的外国人是美国记者贝尔登。当时他是美国一家通讯社记者，同时也为上海《大美晚报》撰稿。在那次活动中，顾执中与贝尔登相处非常融洽；彼此印象极好。正是这个贝尔登，在得知顾执中遇刺后，急匆匆赶往医院慰问。

正在为无法购买到香港船票而犯愁的顾执中，见到贝尔登，如遇救星。他知道贝尔登是美国人，与美国轮船公司一定有联系，于是托贝尔登代购一张赴香港的美国“总统号”客轮的船票。贝尔登慨然应允，两日后，他便将船票送到顾执中手中。顾执中大喜过望，心中石头随之坠地。

当时，在医院门外、码头上均有日伪特务密布，要躲避特务耳目是比较困难的。有一天，顾执中当神父的表弟丁兰亭来看他，表弟那特殊的装束吸引了他。于是他灵机一动，与表弟及贝尔登周密策划了逃离上海的方案。

8月27日下午，在连续的高温天气后，上海突然下起一场大雨，《新闻报》美籍总经理泼尔克开着汽车来到医院，贝尔登也准时到来。顾执中随即悄然上了汽车。贝尔登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黑袍白帽，顾执中穿上后，俨然一个中国神父。

车抵三马路黄浦滩的海关码头。泼尔克和贝尔登将顾执中夹在中间，挤上停在江面的“总统号”。在舱内，顾执中换下了神父衣服。他们紧紧拥抱告别。以后顾执中在回忆这惊险逃脱的一幕时，不无动情地说“这两个美国公民如此劳神地护送我上船，助我脱离险境，这不但是我的私人关系，无形中是中美等国家不久结成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家的一个前奏。”

到港的顾执中先借居《新闻报》驻港记者朱亚杰在九龙的家中，不久，即自行在九龙乐道租屋而居。他的枪伤也于此时在一个中国医生处基本治愈。

香港新闻界的朋友知顾执中脱险抵港，非常高兴，纷纷前来看望。在朋友的建议下，顾将他在上海被敌伪狙击的情况专门写了出来，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虽说有多处开了“天窗”，但毕竟能够揭露汪伪特务的暴行，顾执中心里也就宽慰了许多。

经先他来香港的上海朋友沈颂芳的介绍，在九龙的一家咖啡店，他与中共在港九的地下工作者潘汉年见了面。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双方只作了一般性的谈话。潘汉年留给顾执中的印象是“为人沉着，富有社会经验”。

在香港，顾执中又结识了香港

《新生晚报》的主持人黎蒙。黎是法国留学生，为人落拓不羁。顾执中与他性格相近，谈话也颇投机，当时，黎劝顾坚决留在香港。而顾却开玩笑地说：“与其在港，还不如在缅甸，万一敌前来侵袭，香港成为绝地，只能束手待毙。而仰光则尚有后路可逃。”没想到他当时这信口之言，后来竟然成为事实。

但顾执中仍然想回内地，目的地是重庆。不论走陆地或乘飞机至重庆，都难以支付全家四口人的高额旅费。迫于无奈，他遂与《新闻报》驻港记者朱亚杰商量。朱以为，顾既在上海为抗日而遭受通缉与枪击，潜逃香港，如赴内地，政府应有照顾的责任。朱随后以此向中国红十字会与救济协会交涉，经数次接洽，最后两会同意支付顾执中全家四人由香港飞重庆的机票款。

这样，顾执中在避居香港两个月后，终于又回到日夜思念的故土。

被国民党列入暗杀名单后，他秘密拜会了史良

抵达重庆的顾执中，于1943年被国民政府海外部派往印度任《印度日报》的总编辑。之后，顾执中因不满于国民党所要求的办报宗旨而辞职。当他从印度回国后，抗战已经胜利。但这时国内形势十分复杂，国民党除拼命攫取抗战胜利果实外，还在积极准备内战。同时，千方百计地拉拢新闻界人士，为其摇唇鼓舌。

顾执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抵达上海的。当时，上海正面临着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全面接收。顾执中曾为之工作过的《新闻报》，因战时被日伪利用，因而为CC派程沧波组织接收。作为新任命的驻上海新闻专员，他将亲任《新闻报》社社长，而总编辑一职，程沧波极力拉拢抵达上海不久的顾执中担任。其时，新任命的上海市长钱大钧以及淞沪警备司令李及兰，都是顾执中的连襟，

他们也希望顾能出任《新闻报》总编辑，从而能够有效地控制上海方面的宣传。

然而，顾执中却有着自己的想法。上海的两个大官，一文一武，都是我的襟亲，从一般人的心目中看来，他们都是飞黄腾达，我若依赖，不难扶摇直上。那时到上海去的重庆要人，只要在政治上有些办法，金条、洋房、美女、汽车等，都可以恣意索取，成为阔人。我岂可抛弃我的操守，跟那些行尸走肉辈同流合污。

这就是顾执中，他始终不与国民党为伍。就是亲戚，他也因人各有志，而保持距离。对《新闻报》，他是有感情的，但他对此曾打过一个比喻：“珍馐美味的东西，我自然欢喜吃的，但其中如杂有足以令人致死的鸩毒，我只有毅然地抛入垃圾箱中，岂能愚笨的连生命都不顾，把它送入口腹，自丧生命。”在顾执中看来，当时迎合国民党就是“自丧生命”。

顾执中情有独钟的仍然是他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这所他含辛茹苦一手建立起来的学校，在上海沦陷后被迫解散，现在他要将它在上海恢复起来。顾执中一生为新闻教育倾注了极大精力，这项事业也成为他的希望所在。

1946年春，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在上海复校，顾任校长，副校长为陆诒，教育长为陈翰伯。顾执中自己称，从此“完全丢掉一切杂务，不兼外面一职一事，使用出我的全部精力来搞民治新专的新闻教育”。

这期间，顾执中先后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成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在当时国民党反动专制的年代里，即使是民主党派，处境也是令人堪忧的。而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失败，他们对民主进步力量的迫害则愈演愈烈。

1948年6月下旬，特种刑庭书记官何某气势汹汹地来到民治新专，找到顾执中，提出要有关问题

进行调查，同时出具了由刑庭庭长签发的书面调查指令。顾执中看过后大吃一惊。问题竟有15个之多，其中称民治新专为共产党外围组织；该校常有共产党会议，名曰聚餐，实是吸收学生入党等。顾执中知道这是国民党有意加害于他，于是一方面虚与委蛇，敷衍应付；另一方面加紧内部工作，凡涉及到调查的内容都作了准备。此事虽然被敷衍过去了，但民治新专仍在国民党特务的监控之下。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顾执中更多地是为他的学生担心。他在《报人生涯》中曾这样说过“民治新专的同学们，特别在这一时期，在政治斗争中是非常勇敢的，无论在反饥饿游行中，或其它政治上的示威和支持工人罢工的行动中，他们都持着大旗，走在各学校的前列……我身为学校的负责人，一方面赞成和支持他们的行动，同时，时刻提心吊胆地担忧着这批青年人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毒手。在每次出发前，我总是谆谆地嘱咐他们要小心机警，时刻保持警惕。他们出发后，我的心老是怦怦地跳着，直到他们安全回来了，我才能平静下来。”当时，国民党特务明目张胆地在民治新专的校门口、操场内日夜不息地监视着，致使不少教师和学生不能到校上课。终于有一天，顾执中收到了上海市教育局取缔民治新专的通知。

1949年的新年，上海市民是在惶恐不安中度过的。其时，有中共地下工作者得知上海警备司令部正在拟就一个枪杀的黑名单，顾执中亦在其列。中共地下党随即通过有关渠道通知顾执中。顾执中没有别的选择，惟有再度避难香港。

行前，顾执中秘密地来到开纳路165号史良家中，将自己的危险处境以及避难香港的打算告诉了她。随后他要求史良设法与上海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并由他们通知香港的中共人士，以便他到香港后

能与他们取得联系。史良满口应允。

顾执中匆匆安排了上海的有关事务，于1949年3月24日上午，告别家人，登上了一艘荷兰客轮，再次前往香港。

在香港皇后大道的一个咖啡店里，潘汉年带来了“上海解放在即”的消息

在六国饭店，行装甫卸的顾执中很快雇车前往湾仔菲林明道11号，那是香港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所在地。

早在1946年，面对国民党政府不断摧残进步力量的这一严酷现实，顾执中就萌发了在香港举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想法。一方面，那里远离国民党的统治，可以排除来自国民党方面的种种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形势危急时有个退路。于是在那年10月，顾执中偕民治新专第一届毕业生耿坚白和陆诒悄然抵港。经过一番艰辛筹备后，总算在香港将学校办了起来。在港办校的一切工作都是悄然进行的，随后顾执中返回内地，陆诒留港负责。

自然，尽快见到陆诒是顾执中这次抵港后最迫切的事。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此刻的陆诒正在进行学

校的结束工作。陆诒对顾执中解释说：“新中国建立，时间已不会很长。目前在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已成批北上，准备参加新政协会议。不久，你和我都要离港北上，重返祖国工作。这样，除了经济原因外，谁来港主持校务工作也是问题，不如结束港校工作。况且学校学生已学习期满，有些人已参加新闻工作。”顾执中以为陆诒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他仍不免流露出一种惋惜之情。

当时，香港表面上风平浪静，但事实上，国民党特务活动非常猖獗。民革的朱学范乘坐黄包车外出时，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汽车撞伤，险些丧命。因反对蒋介石而避居香港的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将军，在其寓所被特务开枪杀害。顾执中确有前车之鉴，因此在香港他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唯恐不测。

4月间的一个上午，顾执中应陆诒的约请来到皇后大道的一家咖啡店。陆诒将他带到二楼一个小包厢，令顾执中吃惊的是他竟然看到了潘汉年。原来这次约会是潘汉年安排的。潘汉年其时是中共在港机构的负责人，当他听说顾执中抵港后，立即请陆诒约来一见。

顾执中很高兴能在此时见到潘汉年。这虽然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

但仿佛已经十分熟悉。潘汉年询问了顾执中来港的缘由后，告诉他内地形势发展很快，上海解放在即，另外，潘汉年称自己也将要离开香港。问顾执中有什么考虑？

面对潘汉年的询问，他试探地表示希望能够北上。潘汉年沉思了一会儿后，劝他在香港再住一个时期，等候消息。

与潘汉年分手后，顾执中在焦虑不安中日复一日。虽然潘汉年并没有明确同意他北上，但他以为与其在香港无所事事，不如到北京。如没有合适的安排，他还可以在上海解放后折返上海。经过反复考虑后，顾执中遂对陆诒提出，他要北上天津。尽管陆诒劝他暂留一阵后，一起返沪，但他去意坚决。行前，顾执中考虑到北上没有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到天津后恐有诸多不便。陆诒表示可以与时在香港的乔木取得联系，请他设法致电天津方面负责人。乔木即乔冠华，是当时中共在港负责人之一。陆诒让顾执中放心北上。

1949年5月5日，春风和煦，阳光灿烂。顾执中乘坐英国商轮“岳州号”前往天津。从此结束了第二次避难香港的生活，而走向一个崭新的天地。

(责任编辑 焕然)

欢迎订阅《老人天地》月刊

《老人天地》是民政部主办的全国性老年杂志，1983年创刊，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可读、可亲、可信，为老年人所喜爱。

《老人天地》宣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老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宣传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信息和经验。

《老人天地》竭诚为老年人服务，报道老年人关心的各种问题，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为发挥老年人的聪明才智牵线搭桥。是老年人的知心朋友，中青年人了解老年人的窗口。

辟有“天地论坛”、“领袖风范”、“人物专访”、“益寿之道”、“心理保健”、“晚晴异彩”、“医药咨询”、“敬老尊贤”、“婚姻家庭”、“关心下代”、“当代名医”、“琴棋书画”、“花鸟鱼虫”、“老年工作”等栏目。

每月1日出版

定价：每册2.50元，全年3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1147/C

邮发代号：2-290，国外代号M736

地址：北京沙滩后街34号

邮政编码：100009

从战犯到居港爱国作家的

蔡省三

● 吴 琼

曾是战犯现已79高龄的蔡省三先生，居港22年来，一直为两岸统一奔走不息，还著文四千余篇，创造了他人生的辉煌。我们特请他的续弦夫人吴琼，撰写了蔡老这段传奇般的爱国事迹。

吴琼女士，是广西么佬族作家，今年44岁，她着笔严谨，读来感人至深。

22年前，中国现代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央人民政府宣布对关押在狱的全部293名国民党战犯予以特赦，他们中有十人申请去台湾，蔡省三是最年轻的一个。

赴台滞港，风波迭起

蔡省三何许人？他曾是蒋经国的亲信与助手，曾任国民党赣东北少将总大队长，解放前夕他负隅顽抗，被俘后判处死缓，与溥仪、黄维等人一道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监狱。

1975年3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释放了他们，政策是：“……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一政策对关押了25年的蔡省三来说，是既惊讶又振奋。或许他只想试一试政府的诚意，或许是关押太久他想出去走一走，或许是他太想念台湾的同事与朋友，他，第一个申

请去台湾。

1975年4月14日，十名释俘跨过了罗湖桥。他们是：

王秉钺，原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

陈士章，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

王云霄，原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

周养浩，原国民党军统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

蔡省三，原国民党赣东北少将总大队长；

段克文，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

张海商，原国民党第二〇四师上校团长；

杨南邨，原国民党第一五〇师上校团长；

赵一雪，原国民党第二八一师上校团长；

张铁石，原国民党第六十八军政工上校处长。

这伙人一到香港地头，立即被采访记者包围。话筒、闪光灯弄得他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十名战犯要经港赴台，一时轰动港九。

台湾当局对十人回台，既惊恐又尴尬。他们一方面封锁消息，一方面慌忙清理“忠烈祠”，因为十个人中，周养浩等人的灵牌已受香火二十年。台湾当局穷于应付。答应十人回台吧，对他们以往的反共宣传，无异于打了自己的耳光；不答应吧，似乎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他们在港发动了一切宣传机器，大造舆论，大肆造谣与诬陷。

受攻击最多的是蔡省三。

——“他没有一个亲人在海外，中共却放他出来，目的何在？”

——“中共释俘是玩统战伎俩，十个人是中共选派出来的统战工具。”

——“蔡省三是冒牌战犯，是中共的统战干部，要入台搞间谍活动。”



蔡省三与夫人
吴琼在书房

住进帝国饭店的蔡省三对此激愤异常。他想得更多的是，自己19岁那年，被举国上下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热情感化，毅然投笔从戎，追随了国民党，追随蒋经国，忠心耿耿，几十年出生入死。如今活过来了，竟落得如此下场。

他们不得不滞留香港。这一年，蔡省三已56岁，其余九人均六十开外，可谓是：身名未赢得，白发已蓬生！蔡省三自问，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平心而论，他只是想再次见到蒋经国，想跟这位老上司叙叙旧，谈谈25年来的坎坷与沧桑，谈谈多年来他对共产党的了解与理解。谈谈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观点与立场，谈谈他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想法与见解……退一万步说，就算台湾当局认定他是统战工具，那么其他九人呢？大可该放行吧？这些人九死一生历尽苦难，至今放了出来，就不想再介入两党间的纷争，他们只想与亲人团聚，只想安安稳稳渡过晚年，其实，就算他们想做什么，恐怕这把年纪也难有作为了。

可是台湾当局要他们公开发表反共声明，还要进行甄别，让他们以“难民”的身份提出申请。

蔡省三愤怒了，他告诉记者：我

们为国民党出生入死，到头来说我们是难民？我们不是难民！我们是光明正大而来！必得光明正大而去。有记者采访，他毫无顾忌地表达意见。

舆论大哗。港九各报刊以头版头条刊登对他的专访。

蔡省三感受最深的，是香港同胞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每天，有许多知名或不知名人士打来电话，表示对他们安慰，对他们支持与关怀。一些朋友设宴招待他们，一些朋友请他们到家畅谈，一些朋友力劝蔡省三，“不要去台湾了，到了台湾，不定那些人又把你抓起来，你这辈子还要坐多少牢。”

朋友的净净劝导，每每令蔡省三感慨万端。

这其间，就连当时亲台的一些报纸，也说了些公允的话。《星岛晚报》发表短评说，“台北方面处理此一事件采取拖延政策，不免令人感到遗憾……”

《快报》则出主意说：“我们认为，台北应该以‘统战’对‘统战’，立即予以接受，人在手里，还怕他们不慷慨激昂发表反共言论吗？但可惜台北的脓包决策者昧于情理。硬要他们在港发表反共言论，这是强人所难，更违反香港政府政策。”

来自台湾的另一种声音说：

——“蔡省三在港一再发表媚匪言论，完全暴露其为共匪的统战工具。”

——“蔡省三是中共的代言人。”

——“戳穿蔡省三留港内幕。”

更有甚者打来电话——

电话：你是蔡省三吗？

回答：是的。

电话：告诉你听着，我们对你的某些言论很反感，你攻击国府，我们要对你采取行动。

问：你们要采取什么行动？

电话：告诉你吧，你将有生命危险。

一天深夜，有人敲蔡先生的门。蔡问：“是谁？”门外不答。蔡知道不是好人，急拨电话到酒店服务台求援，服务员上楼来，敲门人悄然离去……

为预防不测，蔡省三第二天搬离了帝国酒店。报纸即时报道他神秘失踪了。

十人滞港消息牵动了千千万万同胞的心。人们一致谴责台湾当局不近人情。两岸的亲人朋友着急了。在大陆曾同为战犯的杜聿明、黄维等公开发文谴责台湾当局。在台的

亲人和朋友，纷纷为10人赴台奔走呼号。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惨事。十名战犯中的张铁石（1949年为掩护国民党首脑撤退台湾，奋力苦战，终在厦门火线上被俘。他可谓对国民党尽忠职守），他上有九旬老母，下有妻女儿孙，四代人均在台湾。由于台湾当局阻挠，他有家归不得，思亲倍焦急，终于在1975年6月4号在富都酒店自缢身亡。

张铁石由于赴台情切，听人劝告，擅自离开中旅安排的兰宫酒店，化名搬到台湾人开的富都酒店，其意是想更接近台湾一步。他留有遗书，其中一句是：“对赴台已感绝望。”

10人赴台滞港事件，以张铁石之死达到了高潮，也以张铁石之死渐渐降下帷幕。余下9人见回台无望，被迫各自寻找途径。王秉钺、陈士章、周养浩、段克文先后赴美。王、陈、周三人有亲属在美国。段克文只有一个儿子在四川当工人，特赦后儿子不愿认他，通过组织做工作还是不愿认，因此，段克文申请回台。回台不成，他向国际救援组织申请政治避难而去了美国。

张海商、杨南邨、赵一雪于9月2日返回大陆，受到中国政府的热情欢迎。三人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也得到很好的安排。张海商后为湖北省政协委员，杨南邨为四川省政协委员，赵一雪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留港的只有王云沛、蔡省三。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救援组织主动找到蔡省三，说只要他发表反共声明，就可以安排他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居住，同段克文一样，属政治避难。蔡省三拒绝说，身为中国人活要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死也要成为中国魂。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香港也是中国的领土，台湾去不成，那就留在香港吧。

感谢好友王兄，感谢许多朋友的仗义相助，为蔡省三留港提供了

必要的条件。中国政府于1975年底，用飞机将其夫人曹云霞女士送至深圳后至香港，分别25年之久的夫妻得以团聚。

不谈统战？ 就是要谈统战！

十人滞港之初，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李菊生知道蔡省三直率坦荡、想啥说啥的性格，好心地叮咛他：“老蔡，你绝对不要谈统战。”以免刺激台湾。

这一境况至今想来仍然有趣。一边让他不谈统战，一边大骂他是统战工具。两军对垒，阵容分明，蔡省三夹在中间。不知是为形势所迫，抑或天意？蔡省三以后就一直站在这中间的立场，去观察、去思考、去写文章。

统战统战，就是要大家坐下来谈判，不就是希望国共双方再一次回到统一战线上来？蔡省三开始感悟了。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谁愿意看到祖国长期分裂？谁愿意看到两岸关系紧张恶化，再打一场内战？

或许是这份朴素的平民意识，或许是他头脑中固有的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决定向一切他所认为的不平、错误公开挑战！凡有记者采访，他总是乐于接受；凡有大学或社团邀请他演讲，他都积极参加。他拿起笔，融入自己的情感、认真思索，写出一篇篇时事评论。

1975年9月，香港《七十年代》（现为《九十年代》），发表了一篇专访文章——《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国内《参考消息》连续四天予以转载。文中，蔡省三发表了他对两岸和平统一的观点与立场，并叙述他所知道的蒋经国先生从政的历程，分析蒋经国先生的特点，归纳他对蒋经国的看法，他认为蒋经国三不会，1、不会出卖；不会出卖台湾，向外国卖身投降；2、不降 不会投降大陆；3、不烂。不会把台湾搞烂，

而是将有一番作为。

文章发表以后，反响很大。那时蒋介石去世不久，蒋经国刚刚上台。这时分析台湾形势是一则重要资料。这或许也是解放后国内第一次公开报道对蒋经国先生的正面评价。

当时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总理在病中，仍然密切关注两岸关系。他连续看了《参考消息》上的四篇连载文章，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写了一段关于两岸关系的批示：

“请罗青长，家栋将蔡省三四篇，对四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托托托”三字格外令人瞩目。

1975年正是四人帮横行，极左思想当道之际。周总理有此独特的政治远见和务实精神，殊为难得。

1975年底，蔡省三写了一篇论统战的长文——《孙中山的革命联合阵线与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文中，他主张国共两党应适乎世界潮流，在外反霸权，内求团结的大前提下，重新携起手来。他写道：“谈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联合阵线，必然联系到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因为联合主要是和共产党联合。而统一，国民党的有关人员也是统一的主要对象，彼此都是党外的阶级关系问题。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当权派，却始终抹煞这种关系，奉行的是一党专政，有我无你，他们根本就讳言联合阵线……”

文章写出来后，没有刊物愿意发表。亲台的刊物不愿发表，亲共的刊物也不愿发表。因为文章中，蔡先生在论到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阶级性时指出：共产党采取的“唯阶级成分论”是错误的，将有碍于统战工作。应承认人是可以转变的，阶级立场是可以转化的，否则，对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他们

何以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领袖，那是不可理解的。

不久，周恩来总理于1976年元月8日去世，《七十年代》编辑约蔡省三写篇悼念文章，蔡先生说好，我写一段放在此文的后面，你给我全文发表。他还在给编辑的信上说：“我是一个有坚强独立意志的人，谁也不能令我发言，也不能叫我不表示自己的意见，我在国民党工作时是如此，在大陆监管当中，想啥说啥，也不例外……如承发表，文责自负，幸勿修改。顺颂、编祺。蔡省三拜上。”

可喜的是，《七十年代》的编辑先生还是有胆识的，他们全文照发了这篇长稿，连蔡先生给他们的信也照登出来。

有趣的是，此文登发出来后，一位叫陈闻的作者写了一篇文章——《从蔡省三的文章论中共的洗脑效果》。他开稿即说：“去年中共释俘十人抵港，入台证迟迟不发，群议沸腾，笔者亦曾深责国府之不当。事隔将近一年，先后奉读了十人之一蔡省三先生的访问记及《七十年代》六周年纪念特大号中蔡先生自撰的长文，乃知去年若令蔡君入台，后果必有不堪者。蔡君之文，不仅使浅学如我者惊讶中共洗脑之成功，亦复为蔡君之不能自觉悲也。”

他指出，“中共洗脑”成功例在蔡先生文中除了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论段外，还引用许多来自“中共出版物”《红旗》杂志以及《人民日报》中出现的词汇，如：“光辉教导、联合反霸、经验总结、革命联合阵线、有成份论、唯成份论”等等。

后又说：“蔡君如能向《七十年代》编者借到自己的作品《蒋经国在上海》略加对照，或可发现本文摘出的蔡君现用的词汇，当年极少乃至绝未出现过也。故本文作者不想蔡君个

人思想之转变，而悲中共洗脑之成功！”

对这位陈君的评价，蔡省三付之一笑。需要回答的，其实他早在文中，在给编辑的信中预先给予回答了。

更为有趣的是，听说这位陈君写了这篇文章，以后专研苏联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等共产党国家的“洗脑效果”，在美国得到了博士生头衔。

这位博士不了解蔡省三的“洗脑的效果”，被囚禁之初，蔡省三一股子不服气，他拼命读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百多卷以探其究竟，他还把一些重要章节背了下来，又对照世界大战史、中国革命近代史，他剖析得失，思索比较，他视野开阔了，不再囿于两党之间的恩恩怨怨，以一种全新的独立视角面对世界。25年的监禁生活，25年的读书，他新的世界观形成了。

对于海峡两岸关系问题，蔡省三一贯的主张是“反台独、反武力，主和谈、促统一”。1981年初，蔡先生在港发表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十条建议。这十条要点是：1、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自治特区存在；2、台湾现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不改变；3、台湾仍保持现行政权结构；4、台湾可拥有军队，大陆军队改编为国防军，不进驻台湾；5、台

湾继续保持与各国的民间关系；6、台湾可选举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7、大陆承认国民党合法地位，允许在大陆设置机构；8、两岸实行三通，进行文化艺术交流；9、大陆应废除“党、团、政、宪、警、特”的帽子，一律享有公民权；10、设立常设机构，负责处理两岸事务。1981年4月21日，国内大参考，即《参考资料》18559号全文转载。

同年9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叶剑英副主席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9条意见，作为中国政府对台政策而广为宣传。

或许是曾为国民党将官，或许是对台湾的朋友总怀着一份深沉的情谊，蔡先生对台湾的关注超过了其他论题。

1984年后，他将对台问题总结成16个字：“确保和平，不独不打，边谈边通，自然统一。”又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三条主张：“官不通民通，官不亲民亲，官不和平和。”台湾的朋友看了，戏称为“新三民主义”。

据台湾的朋友说，蒋经国去世前（蒋经国1988年元月去世），于1987年9月决定开放对大陆的探亲，很大程度是接受了蔡先生的建议。

1991年底，蔡先生携夫人出访台湾。他就自己的观点与台湾的老



蔡省三访台时与故友合影：姚舜、楚耘秋、萧昌乐等

尊敬的炎黄春秋老任先生纪念

收回香港主权洗雪百年耻辱

密切一国两制开创千秋光荣

蔡省三 敬上

一九九七年七月百於香港

蔡省三为庆祝香港回归给本刊题词

今天我们找错门了。我们几个也是从大陆偷渡过来的，没有办法找工作，生活所逼呀。对不起，对不起，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找我好了。几个“江湖好汉”拍拍胸脯走了。

这些情节说起来有点像小说，然而决非杜撰。

抢劫事件发生后，夫妻俩商量着把诊所关了。另租了一处住家。

蔡省三“统战”吊颈岭

在香港九龙区海边，有块地方叫调景岭，它原名是吊颈岭。1949年，共产党在大陆夺取政权后，一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至香港，当时的港府无力安排，将这几万名国民党人当作难民，赶到吊颈岭这片荒野去居住。这些人 here 安营扎寨，最初的生活自然是困顿和苦难的，于是有人白手起家，有人落魄流浪，有人吊颈身亡。吊颈岭因此而得名。

到了七十年代，这里已发展成香港一片繁荣的地段，建起了高楼大厦，建起许多工厂、学校。这里，也培养出不少文化程度极高世界性的专业人材。为消其原名的可怖性，取谐音改为调景岭。

夫人挂牌行医。蔡先生继续写稿。生活总算差堪维持。

两人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制定了居港“四为四不”方针。四为：为大众健康尽力量，为历史作证写回忆，为正义发言作评论，为社会人群做好事。”四不：一不求做官，二不图发财，三不贪享乐，四不作恶害人。

这里有个小插曲。一天，一位英国人上门看病，曹夫人诊病开药（自制成药），收他四千元港币。病人乐滋滋走了。

蔡省三一旁瞪大了眼睛，“你怎么收人家这么多钱？”那时，他写好几篇长文也挣不到这笔钱。

曹夫人笑道：“这些阔佬，四千元算什么？只要床上功夫强健，别说四千元，就是四万元他都愿给。”

“这不，这不违背——”蔡先生迂讷地指指玻璃板下压着的抄写得公公正正的“四不”方针。

曹夫人叹道：“你呀，书呆子！收这点钱我们发不了财，也害不了人！不多收一点，明天拿什么交房租？”

然而不久，他们制定的“四为”方针第一条被迫取消。原因是这样的：一天中午，四个衣着不整的人窜进他们的诊室，用刀、枪逼着曹夫人拿出钱来。蔡曹两人一惊，知道遇上了歹徒。她倒也没什么可惧怕的；两人都上过战场，曹夫人也曾是赫赫有名的双枪女将，这几个坏蛋算得了什么？而眼前他们手无寸铁，况又迈入了花甲之年。想想，他俩堆下笑脸，若无其事地与他们端茶倒水。曹夫人灵机一动，诉说起自己的经历。

四人中有一个是小头目，听了曹夫人自述后吃惊地问：“你们也从大陆来？”他指指蔡“你被关了25年？”他指指曹“文化大革命你被批斗？”

曹夫人道：“岂只是批斗。六月天让我穿狐皮大衣在太阳底下晒，从早晒到晚……”

小头目拍案而起，“大叔大婶，

朋友广泛交换意见，在会见当时的外交部长章孝严先生（现任台湾外交部长）时，他也直抒己见。

访台半个多月，每天都通过传真，在自己的专栏上（从1984年起，香港新报开辟了《蔡省三专栏》），把出访台湾的情况向海内外传播。他写了《同章孝严谈外交大义》、《不要台独，要反对党》、《喜见遏制台独杜绝选灾》等时评，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

一次，蔡省三回大陆省亲，在火车上，他拿出一些文章让同车厢的旅客看。一位在上海某单位工作的普通干部，年纪尚轻，没听说过蔡省三这个名字，可是他看了蔡的文章，立即感兴趣地一直看下去，看到快下车。

蔡先生问他：“怎么样？请多提意见。”

那位旅客啧啧两声，并不称赞，只是说：“你的文章，国民党看了不喜欢，共产党看了也不会喜欢。”

蔡老听后嘻嘻地笑，说：“对了，你说对了。”

生活逼成的专栏作家

香港是块高消费的地方，住酒店一晚就是100元港币。蔡省三靠写稿得来的稿酬生活，常常令他捉襟见肘。

所幸的是，中国政府为照顾他，将其妻曹云霞女士接收到香港。

蔡省三坐了大牢，曹夫人带着女儿到处流浪。为了生活，曹夫人贩过水果，摆过烟摊，在码头给人跑过生意。直到有一天，曹夫人遇到了一位老人。当老人得知曹夫人的身世后，授她一个小秘方，专治男性阳痿。老人说：“掌握了它，你以后不愁没碗饭吃。”直至今日，老人对曹夫人的恩舍，夫妻俩没齿不忘。

曹夫人到港后，小秘方大大发挥作用。夫妻二人到本港太安楼租了一套公寓，开设一家中医诊所。曹

调景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这里的人们有一股顽固的反共情绪，这里家家户户无时不挂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这里是“青天白日旗的海洋。”左派报纸记者不敢到此采访。台湾当局盛赞这里是他们在香港的密不透风的反共“特区”，是坚强的“反共堡垒”。

继蔡省三他们这批战犯释放后，又有一批国民党特工人员（也属战犯）被释放。有一名叫李荃萱的战犯到了香港，投奔他的侄子而居住于调景岭，后来，据说一家人在议论一些事情时，李荃萱为共产党说了两句公道话。他的侄子大发雷霆，将李荃萱赶出香港，李被迫不得已只好转回大陆。

当时，曹夫人的堂弟曹云秋也居住在调景岭。一段时间后，蔡曹夫妇悄悄去看望这位堂弟。亲人们历尽沧桑得以会面。谈及往事说起家乡，自是无限感慨。曹云秋有着浓浓的乡情，但是他不敢回大陆探亲，因为他的父亲、叔叔、伯伯在解放初期全部作为恶霸地主让共产党镇压了。

到了1981年，中国大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清除了极左思想，全国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凭着对共产党的理解，蔡省三夫妇认为时机已到，即刻动员曹云秋回家看看，蔡曹夫妇说他们用生命担保他进得去出得来，并主动与家乡有关部门联系。曹云秋心活了，带着女儿一起回到湖南老家耒阳县城，他们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热情欢迎和接待。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看到亲人生活安稳丰衣足食，曹云秋心里十分感动。

有人称，打开这个缺口的“始作俑”者是蔡曹夫妇。对这些言论，蔡省三已不屑反驳，他们为堂弟的行动感到欣慰与高兴，他们更大的指导思想是，希望祖国和平统一。希望亲人团聚，希望全国同胞和睦相处。

蔡先生说，我没有理由不爱这

个国家。生于斯，长于斯，就像一个人的形成与降生，均来自于父母的结晶一样，是不容置疑，不容背叛的事实。美也好，丑也好，父母只有一双，穷也好，富也好，祖国只有一个。

1982年，蔡省三接受香港《新报》的聘请，成为该报专栏作家，专栏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即《蔡省三专栏》。《蔡省三专栏》专写时事评论，每天一篇，每篇800—1000字。

自此，夫妻俩才松口气，总算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饭碗。《蔡省三专栏》从1982年一直开办到1995年。1995年底曹夫人病重住院，蔡先生陪伴，专栏始停笔（曹夫人于1996年元月病逝）。《蔡省三专栏》每天同时在世界四个地方见报，香港、台北、美国三藩市和澳大利亚。

以后，他们创办了“国情研究室”，创办了蔡氏出版公司。他们出版过好几本专著《蒋经国系史话》、《中共释俘的来龙去脉》、《赣南忆旧录》等等。大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书籍，不少资料取自他们的书中内容。

夫妻二人将原来的“四为”方针修改为 为历史作证，为正义发言，为人民请命，为真理呐喊。”

蔡先生说“四为”之中，最难的是第四条，而他本着良心，本着一份沉沉的历史责任感，通过专栏这个最好的窗口，在使劲地呐喊！

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他已写了一百多篇文章。在《香港大课的反面教材——评英国的〈香港代议政制〉白皮书》一文中，他凛然正义，毫不留情地批判英国人的殖民主义思想，批判他们在《白皮书》中唱的“在香港的英国主权”这一荒谬论调，指出他们这一论调违反了国际法，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联合国的人权公约》。诸多文章发表，严正捍卫了祖国的尊严，为香港平稳过渡顺利回归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通过《专栏》，他第一次将邓小平——“邓大人”的称呼传播海内

外；通过《专栏》，他第一次将刘少奇平反的消息传播海内外。在《毛、刘家乡连访记》这篇文章中他写道：从韶山到花明楼（刘少奇故乡），其中的交错变化，曲折反复，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经受过的可悲的折腾，还大大有待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来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我想，今后再不应该为“神化”个人或“丑化”个人而劳民伤财了！多搞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吧！”

广大读者喜欢他的文章，许是与他那份殷殷的爱国热情，与他丰富的学识，与他敏锐的判断力和他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以及他耿直的想法说啥的性格分不开。

居港22年来，每天，他要买下数十元钱的报刊，要阅读不下十份左中右报纸，他要全面掌握当天的各式新闻、言论以及各种资料，然后伏案写作。

22年来，他一共写了五百多万字计四千多篇文章。他的腰沿桌面弯成了一个自然弧。有朋友笑他“蔡省三老了，腰都弯了。”

蔡先生幽默地说：“我的腰不是老弯的，而是写弯的。待我不写时，它就像根弹簧，蹦地又弹直了。”

他也常常自叹，说他这个作家是逼出来的，为形势所逼，为生活所逼。这话说来令人心酸，只有同样地陷入过困境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认真地说，蔡省三在国民党将官之中，职位不是太高，军功也不显赫。被抓俘，判死缓，坐牢25载，历尽沧桑。唯其特赦后到了香港，秉持正义，平心论著，倒也成就了他的另一番事业。

蔡老有这么一首诗：

月明之夜深思量，
通今达变阶回章，
安得青史着一笔，
终是华夏好几郎。

或许可表其居港后的心态与理想罢！

（责任编辑 刘家驹）

九旬重新入党的传奇老人傅柏翠

● 许人俊

早年投身革命，战功卓著，毛泽东、朱德称他为大名鼎鼎傅先生

傅柏翠，1896年出生于福建上杭县蛟洋的一个地主家庭。少年时期，他凭着勤奋努力，顺利完成了小学学业，并考取了福州中学，继而进省立法政学校专攻法政专科。

1914年，他受孙中山进步思想的熏陶，东渡扶桑，考进东京早稻田大学学法律。在那里，他见到了久仰的孙中山，聆听他的教诲，并参加了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中华革命党，积极投身革命活动。

1917年，傅柏翠完成学业，返回福建蛟洋宣传孙中山的政治纲领和革命思想。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傅柏翠同《新青年》等多家进步刊物建立了联系。此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革命运动。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傅柏翠在中共福建省委罗明支持下创建一个新革命团体——建南社，提出重新建设福建南部。他还利用家庭富有的优势，拿出200多银元，资助建南社开展活动。

经过白色恐怖严峻考验的傅柏翠于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在广东潮汕受挫，又挥师重返赣南建立根据地。傅柏翠肩

负着党组织的重托，再次离开上杭，返回家乡蛟洋继续发动群众，为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各项准备。

1928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决定在闽西组建红军，任命王海萍为总指挥，傅柏翠为副总指挥，并把（龙）岩、永（定）、上（杭）暴动武装整编为闽西红七军第十七师，龙岩白土和上杭蛟洋的农民武装编为五十五团，傅柏翠兼任团长，陈锦辉任党代表；溪南里的农民武装为五十七团，张鼎丞任团长，邓子恢任党代表。

1929年3月，我中央红军进入闽西南作战，在长汀一举歼灭国民党郭风鸣的部队，反动头目郭风鸣被击毙，群众士气大振。为加强闽西南根据地的武装建设，福建省委特地派罗瑞卿、曾省吾到上杭、蛟洋，帮助傅柏翠组建红军教导队，开展军事训练，培养红军骨干。后来，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又传达上级指示，将教导队组建为红军五十九团，由傅柏翠任团长，曾省吾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

这一年5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进入闽西，会见了傅柏翠。1929年6月2日，傅柏翠、罗瑞卿率领红军五十九团，配合伍中豪、蔡协民、罗荣桓指挥的红四军三纵队协同作战，一举攻克闽西重镇龙岩城。他们完成歼敌任务后，奉命到龙门镇听取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风趣地对傅柏翠说：“傅先生，看起来你是个文

质彬彬的书生，可又是一位能打仗的猛将！”由于毛泽东、朱德等都尊称他为“傅先生”，于是，“闽西傅先生”、“大名鼎鼎的傅先生”，就广为流传开来。

同年6月中旬，红四军在闽西连城新泉镇改编，朱德军长宣布红四军新组建第四纵队，由傅柏翠任司令员，张鼎丞任党代表。后来又派谭震林任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一纵队仍由林彪任司令员。不久，红四军在龙岩隆重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林彪、傅柏翠分别以一、四纵队司令员身份出席。大会选举陈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朱德、毛泽东、林彪、伍中豪、傅柏翠等为前委委员。会后，毛泽东又带领傅柏翠前往蛟洋文昌阁出席闽西第一次党代会。邓子恢被选为闽西特委书记，傅柏翠被选为闽西军委委员。这一时期，傅柏翠已成了闽西南地区家喻户晓的大名人。

上杭县是闽西的历史名城，建有坚固的城墙，易守难攻，素有“铁上杭”之称。为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1920年9月中旬，红四军和闽西特委调集优势兵力攻打上杭。20日夜里，朱德指挥二、三纵队发动突然袭击，傅柏翠奉命率预备队冒险架设浮桥，并掩护林彪的一纵队用云梯强攻攻城，战斗十分激烈。负隅顽抗的守军，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终于全部被歼，闽西的龙岩、永定、上杭从此连成一片，发展和巩固了闽西根据地。

捷报传来，毛泽东异常兴



1983年底，全国政协会议一角，陈丕显（左一）、谭震林（左二）、项南（右二）、傅柏翠（右一）

奋，为纪念此次胜利，后来写下了《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是春光，胜似春光，廖廓江天万里霜。”

1930年被开除党籍；肃反时被错定为社会民主党头目，以致武装拒捕，脱离革命

在频繁的战斗中，毛泽东和傅柏翠建立了深厚的友情。1929年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闽西古田镇召开。会前，毛泽东同傅柏翠作过交谈，通知他出席会议，参与研究对敌斗争部署。因天气寒冷，他提出回蛟洋家中取些棉衣，毛泽东要他速去速回，不要耽误会议。

傅柏翠回家后，因家务缠

身未能及时到古田出席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会上，一些战友对他的某些思想提出了批评。他的前委委员落选了。为此，毛泽东特地从古田赶到蛟洋同他谈心说：“闽西有的同志对你有意见，说你态度消极，爱看旧书。我的意见，你最好还是回部队去，如果不愿带兵，可以做些别的工作。爱看旧书，前委有些没收来的书，我们可以一起看。红四军准备组织一个社会调查委员会，你来当主任。”

当时，傅柏翠确实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因此拒绝毛泽东的劝告说：“我粗心浮躁，不习惯做细致的填表、写报告等工作，想在家乡组织一种共生产、共消费的农村共家团。敌人来了，我就同群众一起打游击。”毛泽东劝说无效，只好告辞，但仍

动员傅柏翠：“最好是跟部队出发。”

这一期间，闽西土地革命斗争蓬勃开展，而傅柏翠却态度消极，在许多问题上与苏维埃领导成员意见分歧，而且日趋尖锐。他多次写信给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认为农民要求的主要不是土地分配，而是要求发动“共家运动”，组织“共家团”。他反对暴力的土地革命斗争，指责邓子恢、陈毅在闽西领导暴力革命是犯了盲动主义错误。

为帮助傅柏翠转变错误思想，邓子恢、蔡协民等曾多次同他交谈，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但他性格固执，谈话毫无效果。1930年3月，闽西首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他作为闽西党的重要领导，竟拒绝出席，代表们以大局为重，选举他为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兼财政经济部长，委托特委领导再三做思想工作，他继续意气用事，甚至发展到公开对抗。

遵照中央指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多次通知傅柏翠到闽西特委工作，他依然不去。随后，中央又通知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他借口不习惯机关工作，加以推辞。他把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搞颠倒了，在歧途上越走越远，以致酿成终生憾事。

1930年底，党中央派邓发到闽西主持召开闽粤赣边区党代表大会，成立边区特委会和军事委员会，邓发任边委会书记和军委主席。傅柏翠是大会代表，但他拒绝出席党代

会。基于傅的一系列错误表现，党代会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当时正盛行肃反扩大化，到处抓AB团和社会民主党分子。几个战士被捕后，在诱逼供信的情况下，他们称傅柏翠是社会民主党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肃反委员会以此为据，决定派部队捉拿傅柏翠。

1931年3月，闽西苏维埃组织三千多红军和赤卫队，向所谓社会民主党巢穴——古蛟进攻，追捕傅柏翠，围剿其武装力量。傅柏翠深感事态严重，心情十分矛盾。如果抵抗，双方工农子弟势必伤亡。如果不抵抗，自己和部分骨干将会被当作社会民主党遭无辜枪杀。他左右为难，决定动员群众暂时转移上山，避免正面冲突。

然而，被激怒的古蛟的群众毫不理会他的劝告，主张武装自卫，保卫家园，不幸的武装冲突终于发生了，双方开了火。古蛟群众毕竟不是对手，伤亡较大。傅柏翠只好率众撤离，红军紧追不舍，有数名战士遭伤亡。

傅柏翠终于逃离，上山打游击，红军占领了古蛟地区。此后，北三区与北四区群众形成对立，相互残杀，有近百人在对抗中遇难，成了闽西革命史上的一大悲剧。

国民党反动派对此欣喜若狂，通过报刊大肆渲染，称：“闽西赤匪内部残杀，傅柏翠反赤树帜。”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曾约见傅柏翠，力

图实行招安，但遭拒绝。

拥兵自立，形式上接受国民政府收编，实际上与共产党保持合作。解放前夕率部起义

傅柏翠被开除党籍后，陷入极度悲痛，曾写诗抒情：“犹记当年一剑持，扬鞭四海抱雄思。中途忽动归休念，为避贤来悔已迟。”

1931年初，傅柏翠陷入迷茫，他感到自己正遭红军讨伐，如再与国民党军对抗，必将腹背受击。于是傅柏翠有条件地与十九路军建立了军事联系，将自己所部古蛟农民自卫军改称国民政府杭、岩、连边界保安总队，傅柏翠任总队长。但他一直拒绝与红军作战，只求拥兵自卫，固守古蛟，不向周围扩展，致使国民党当局认为他有“通共嫌疑”。

1932年4月，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要傅柏翠出任龙岩县长，被他拒绝。后因对方同意以“允许古蛟地区实行耕者有其田，保持分田制度不变”为条件，他才到职就任。

同年6月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再次入闽作战，途经上杭县白砂镇，曾关切地向白砂区委询问：“傅先生近来有什么动向吗？”区委答道：“他拥兵自卫，仍在古蛟独占一方，与我们没有什么冲突。”毛泽东长叹一声，不无惋惜道：“顺其自然吧，只要相安无事就好。”

是非黑白不混淆往事津津道 古蛟我幸餘生逢契友與君喜 訂忘年交

辛酉季春閱

救五同志來信吟贈 百拙老人傅柏翠

傅柏翠手迹

起义，又回到革命队伍里来了。毛主席很高兴，还问你身体如何，如没有什么问题，叫他出来工作嘛！”

傅柏翠听后思绪万千，没想到毛主席在古田别后20年来，还一直在关心自己。他既有感激之意，又有内疚之情。他总觉得是个有罪之人，只求安稳生活，不愿给组织添麻烦。但老战友伍洪祥还是竭力促成了他的福州之行。

老战友张鼎丞代表人民政府热情接待，再次转达毛主席的问候，并安排他担任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和省政府委员。

破竹，直逼蒋家王朝的大本营——南京。国民党军队分崩离析，有的溃逃，有的设法与我地下党联系，准备弃暗投明，走起义之路。

傅柏翠原先同国民党当局就貌合神离，此时，他与龙岩督察专员、原国民党十九路军军官李汉冲少将秘密商谈，两人意见相同，认为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1949年元月，李汉冲受派秘密赴香港拜见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元老李济深，由其介绍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商谈起义有关事宜。方方指示他们谨慎从事，着手做好起义前各项准备工作，并立即与闽粤赣边区党委直接联系。为表示诚意，傅、李二人随即将过去被国民党军警关押在龙岩、上杭、永定各县监狱中的共产党干部、家属及其他政治犯释放。

同年4月21日，南京解放。傅柏翠在家中召集闽西各方面要员举行秘密会议，提出：“只有向共产党投诚，才是唯一的出路。”要“跑步投降”。与会人员一致赞成，推举傅、李二人主持起义。不久，上杭城就贴满布告，宣布正式起义。随后与解放军南下部队会师，配合解放军向国民党顽军发起攻势。

全国解放后，福建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曾电邀回家休闲的傅柏翠去福州参加工作。龙岩地委书记伍洪祥还特地转告说：“毛主席从北京打电话向张鼎丞询问闽西傅先生在哪里。张鼎丞说你领导闽西

一年后，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兵变，建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蔡廷锴通过傅柏翠与中央苏区建立联系，提出合作。我党迅速响应，急派潘汉年、黄火青等经蛟洋去福州会谈，双方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商定双方友好相处，相安无事。

傅柏翠同周围苏维埃根据地及红军游击队则保持友好关系。时而与红军游击队的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魏金水等秘密谈判，商定互通情况，相互协作，一致抗日，不搞对抗。在国民党向红军游击队进攻时，他保持中立，也不对苏区的游击队搞经济封锁及粮食禁运，有时还主动秘密向红军游击队提供粮食和药品。

1932年至1949年，傅柏翠历任龙岩、永定、宁化县国民政府县长和保安团长等职。这一期间，他曾应我党要求，将县监狱中的一批红军干部和共产党员悄悄释放，为保护革命骨干做了贡献。

闽西革命根据地，是我党最早创建的著名根据地之一。1935年秋，红军主力被迫长征后，项英、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奉命率少量红军留在根据地牵制敌人，坚持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争。尽管环境恶劣，敌强我弱，但在围剿与反围制的斗争中，闽西根据地的红旗始终不倒，傅柏翠“白皮红心”暗中配合、支持，也起了一定作用。

1948年，我解放军势如

1959年，他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一次宴会活动上，周恩来总理见到他高兴地说：“你我是老相识了。南昌起义军到上杭时，你和罗明为我们办了许多事。今天我们又一同走上了康庄大道”。随即，又拉着他去同陈毅见面。周总理风趣地问：“陈老总，你看谁来了？”陈毅抬头定眼一看，立即爽朗地说：“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闽西傅先生吗！听说你在闽西领导起义立了大功，又回到革命队伍来了，欢迎，欢迎！”他一边说，一边同周总理高举酒杯向傅柏翠敬酒：“请傅先生干一杯，祝你健康长寿！”宴会厅里热情洋溢的气氛，使傅柏翠的心境久久不能平静。他曾赋诗抒情：“入座春风拂面来，满堂斑白尽颜开。听了一席关怀语，胜饮醇醪酒千杯。”

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还拜访了民革中央副主席蔡廷锴将军。老友重逢，格外亲切。他们从反蒋抗日谈到福州事变后撤兵转移；又从蛟洋文昌阁相会谈到蔡将军留下21两黄金支持蛟洋发展经济；然后谈到起义、解放……真是感慨万千。谈着谈着，傅柏翠突然从提包里取出一盒东西，双手送给蔡将军说：“当初你给21两黄金，让我办实业。我用了一些，没有办好，甚感内疚，还剩下17两，现在物归原主。”蔡老执意不收。他见蔡将军态度坚定，只好将黄金交给福建省领导，要求献给国家。省领导不便接收，他只好存入银行。直到1986年，他重新入党

后，又将这17两黄金以蔡老的名义献给了国家。

“文革”中备受磨难，但始终昂然不屈，在周恩来关怀下得到“解放”

“文革”中他被定为“大叛徒”、“老反革命”，屡遭揪斗，并逼他交代、提供邓子恢、张鼎丞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所谓罪证，而他却不为所屈，坚持实事求是，昂然写道：“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我十分敬佩他们”。“陈丕显、江一真是我介绍入党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优秀勇敢的红军战士”。造反派无可奈何，只好将他押送古田县农场劳动改造。

1971年，正当他在农场劳动改造之时，周恩来总理特地嘱咐到福建视察的叶剑英元帅，查问一下傅柏翠等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情况。叶帅到福建后，得知年已古稀的傅柏翠仍在农场劳动，便提出见傅。省革委会不明叶帅的真正意图，通知农场将傅押送到福州。傅也不明祸福，忧心忡忡地走进省交际处。不料，出现在他面前的竟是他十分敬慕的叶帅。叶帅见到他，亲切地问道：“你还认识我吗？”当年，南昌起义后，他们曾在上杭相识。于是傅柏翠兴奋地回答：“认识，认识。你是叶帅呀！”接

着，叶帅又关切地问道：“你是不是还在下放劳动改造啊？”因有人在场，傅柏翠委婉含混地回答说：“我只是在古田农场参加学习班，没有强迫劳动。”叶帅看出他的心思，拉着他的手说：“你不要有顾虑，去劳改就是去劳改。当然劳动也有好处，不过你那么大了，不要劳动过度。”最后叶帅明确提出：“你要回来多休息，保养身体才是。”短短数语，体现了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他终生难忘。身处逆境，长期孤独的心态，突然感受到鼓舞和宽慰。

不久，他就被解除隔离监护，返回省城继续担任民革福建省委副主任和省文史馆长。

历史上功过互见，晚年奋力工作，九十高龄重新入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实事求是作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傅老重新入党的念头，也在脑海里不断浮现，他渴望有生之年重返党的队伍。但又唯恐美好的愿望得不到实现，所以，迟迟未写入党申请书。直到1983年，几经思考，他才毅然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对傅柏翠的重新入党问题，看法不一。有的认为，他早年加入过我党，大革命时期有过贡献。后错定为社会民主党，被迫离开革命队伍，投向国民党，但同我党仍密切合

作，为我党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直至率部武装起义，是功大于过。如今要求回归党的队伍，应当支持和欢迎。

有的认为，他虽是革命前辈，但后来叛逃出走，有过反共行为。而且在叛逃过程中，曾率部抵抗我追捕人员，造成红军战士数人伤亡，欠有血债，过大于功。要求入党虽是好事，但他毕竟是历史罪人，不能同意。

两种意见，相互对立，各有理由和依据，很难统一。面对这一情况，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一直持积极慎重态度，主张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他先后接触了许多熟悉傅柏翠历史的当事人，听取他们的意见。

谭震林认为：“傅柏翠是闽西南地区的老共产党员，后被错打成社会民主党，因拒捕逃回老家，拉起一支队伍，一度当过国民党的县长。但在他管辖的地方，仍保留土地革命的成果，地主豪绅未敢反攻倒算。在我党坚持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对粉碎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反复清剿，一定程度上起了掩护作用。”他还指出：“傅柏翠在中央苏区被打成社会民主党头目，完全是历史冤案。那时，他不跑掉只有被杀头。他离开红军后的所作所为，历史可以作证，他是个白皮红心的萝卜。”

萧克同傅柏翠是老战友，当傅被错打成社会民主党头目被迫逃命时，他曾奉命率部

队追击。傅边跑边抵抗，造成红军战士的伤亡。对此，萧老感慨地说：“当时他不逃跑就会杀头。他逃，我们追击，他不抵抗，就得死。生和死是明摆着的，于是出现了不幸的伤亡。这都是在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正常的伤亡。”萧老作为历史见证人，对傅柏翠深表理解，并支持他重新入党。

陈丕显、江一真都是大革命时期由傅柏翠介绍入党的红军战士，文革动乱中，因受傅柏翠历史问题的牵连，他们先后被诬为“叛徒发展的假党员”，惨遭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他们除积极主张为傅老平反昭雪外，也支持其重新入党。

赞成傅柏翠重新入党的革命老人，还有罗明、李坚真等。1983年底，这些革命老人们相聚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会议期间，谭震林邀请他们和傅柏翠以及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在福建代表团住地作客，并就傅柏翠的重新入党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共识。

项南同志返回福州后，又和省委领导、省政协党组互通情况，并继续对有关同志做工作，逐步统一了认识。

1986年元旦刚过，省政协党组织就抓紧讨论傅柏翠的入党问题。省政协主席袁玫作为介绍人，向党组织介绍说：傅柏翠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担任过红四军四纵队司

令员。1930年开除党籍后，虽曾任伪职，但1949年5月又组织闽西义勇军起义，迎接解放。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统一战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并积极要求重新回到党组织里来。经审查，他的经历清楚，我愿介绍其重新入党。许多健在的老同志，如江一真、陈丕显、萧克、谭震林、魏金水等，也都表示他可以重新入党。”经过支部大会认真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傅柏翠重新入党，福建省委也迅速予以批准。

年逾90高龄的傅老重返党内，立时成为一大新闻传遍闽西大地和闽江两岸。他梦寐以求的夙愿实现了，内心感到无比的喜悦，亲朋好友也奔走相告——传递喜讯。《福建日报》还发表《九十老翁重入党》的报道，热烈给予祝贺。

傅老入党后，革命热情更为高涨，除奋力从事文史研究，埋头撰写回忆录外，还积极参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各项工。1991年，在我党诞生70周年时，96岁的傅老还执笔撰写了《古田会议前后拾忆》一文以示纪念。1993年元旦，这位在人生旅途上走了近一个世纪饱经人间风霜的98岁革命老人，溘然长逝了。他孑然一身走了，但却把坎坷的历史留给了人间。

（责任编辑 一尘）

宋氏三姊妹的父亲

宋耀如传奇



● 解力夫

当代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以宋耀如为家长的宋氏家族，对20世纪中国的历史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宋耀如本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走上海外拓荒的冒险道路，成年后相继成为传教士、企业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但真正使他名扬天下的是他鼎力襄助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他的三个女儿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三个儿子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作用。

出身于贫苦之家

宋耀如的一生，是艰苦跋涉、孜孜追求、勇于搏击的一生。根据史学家们的考证，宋氏家族可以往上追溯24代。宋耀如出身于韩氏家族，早在10世纪的北宋时期，韩氏家族祖居河南相州安阳地区，其远祖韩琦曾因戍边有功，被封为魏国公。12世纪时期，北宋衰亡，韩氏家族为避战乱，开始了千里大迁徙的历险过程。据韩氏家谱记载，公元1197年韩氏族人由原住地河南安阳到达广东廉州。12世纪末，宋耀如的祖先韩显卿冒险渡过琼州海峡，来到当时尚属蛮荒之地的海南岛文昌县古路园村，从此开始了韩氏家族的“天涯海角”的拓荒生涯。

文昌县地处沿海，民风剽悍，这里的穷人多在海外谋生。即以今天的统计数字看，文昌县全县人口只有48万，而在海外的侨胞人数却达60万以上。由此可见历史上文昌县崇尚海外拓荒风气之盛。宋耀如的父亲韩鸿翼，是一位崇尚儒家观念的商人，他为人宽厚，热心公益事业。因经办赋务，差不多耗尽了祖传的积蓄。当他步入中年时，家境日渐窘迫。1863年，宋耀如在这个家庭出生了。父亲为他取名韩教准，当时家中已有两个孩子，排行老三。这时，韩家只有四亩薄沙地，由于土质太差，连椰子树都不长。父亲韩鸿翼不得不做些副业来增加一点收入，以维持一家生计。他常常打短工，为那些境况好的农户运椰子，用扁担挑着，沿羊肠小道走几公里路，运到海边，有时还用船运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他还编织棕绳出售，也烧过砖，几乎什么赚钱的营生都干过。年少的宋耀如，为了活命，为了减轻一些父亲的负担，决心到海外去闯一闯。

漂洋过海到美国

宋耀如所走的海外拓荒的道路，是由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中国在1840年—1842年和1856年—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惨遭失败，不但割让领土，还被

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苛捐杂税的征压下，广大人民饥寒交迫，南方各省贫苦农民纷纷到海外谋生。

1872年夏天，9岁的宋耀如与哥哥韩政准离开了家乡，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投靠一个远房亲戚当学徒，宋耀如在这里干活很起劲。第二年，他一个姓宋的舅舅（他婶母哥哥）来爪哇作短暂的停留，对宋耀如的聪明伶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宋氏舅舅，是早年赴美修筑铁路的广东移民，靠自己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做生意的本领，积攒了一笔钱，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首府波士顿开了一家丝茶商店。买卖虽然兴隆，但他膝下无子，很愿意收这个堂外甥为养子。

1875年夏天，宋耀如跟随堂舅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并从此改“韩教准”的名字为宋耀如，又名宋嘉树。他们在前往波士顿的途中，饱经风浪。出发时，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洋，舅舅似有预感地说：“孩子，以后的日子就像这大海上的浪，苍天下的云，处处有起伏，时时有风险。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险恶情况，记住：只要不灰心，不绝望，拼着命去闯，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在那个时候，从中国到美国东部和加勒比海群岛，通常是由秘鲁、智利海域向南航行，经过拉丁美洲

南端的麦哲伦海峡或合恩角进入南大西洋,再沿阿根廷海岸北上至北大西洋。这条航线比凿通巴拿马运河以后的航线要长一倍的路程。不幸的是宋耀如乘坐的船行驶到太平洋的尽头,在入麦哲伦海峡前遇险了。一块从南极漂来的冰块撞坏了船舵,失去控制的船像断线的风筝,随风向南极漂去。情况越来越严重。宋耀如和他舅舅紧紧地抱在一起,舅舅安慰他说:“不要怕,有上帝保佑,我们会得救的。”果然,船在南极圈内一座小岛旁搁浅了。大家得救了,全体乘客为之欢呼!

经过紧张地抢修,机船继续航行,好不容易闯出南极圈。经过麦哲伦海峡时,又遇上海盗,船上所有贵重物品均遭抢劫,幸好旅客生命安然无恙。舅父对宋耀如说“孩子,你命大,福大,造化大,将来上帝一定能保佑我们发财!”他们航行到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港停靠时,这艘船由于历经磨难而破损严重,再也不能继续航行了。宋耀如弱小的身体经过一路颠簸,再也支持不住了。

在这种情况下,舅舅临时决定,他个人从陆路先去波士顿,宋耀如留在迈阿密港调养。宋耀如身体复原后,舅舅又托人把他送到哈瓦那和别人合伙开的一家茶丝店工作。宋耀如在那里拼命干活,努力学习店员业务,学会了不少古巴式的西班牙语和英语。直到1877年冬天,宋耀如才从哈瓦那乘船来到波士顿与舅舅团聚。

舅舅在异国他乡经营的这家商号,十分繁荣兴旺,给宋耀如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正如美国波士顿档案馆的资料所记载的,宋耀如的舅舅所经营的丝茶号是“北美华商先锋”。他们是打进美国东部的第一个专营丝茶外贸的中国商业机构。宋耀如到来之前,该店连舅父在内只有三个人,都是文昌乡亲。这家商号童叟无欺的经营作风,诚恳周到

的服务态度,赢得了波士顿市民的普遍赞赏。

崇尚林肯,不安分做个小店主

宋耀如到波士顿不久,即举行了隆重的过继仪式。养父对嗣子关怀备至,要他学习英语,并为他聘请了一位有经验的英语教师。这位教师是林肯总统的崇拜者,通晓美国革命史。宋耀如从他身上不仅学到了英语,而且知道了什么是解放黑奴运动,什么是内战,什么是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的三民主义。他对宋耀如说“要不是林肯,不是他那一颗纯洁、高尚的心,美利坚合众国将会被全世界唾骂!”

这位老师还颇为自豪地带领宋耀如参观了波士顿的历史古迹和革命纪念地。波士顿不仅是美国最古老的港口城市之一,而且是美国民族独立的革命圣地,是早期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中心。波士顿是美国革命的摇篮,是美国独立和自由的象征。在老师的带领下,宋耀如几乎参观了波士顿所有的革命纪念地,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民主主义的教育。他想,美国在历史上曾经受过殖民主义的统治和欺负,经过斗争和反抗,很快地获得了独立和自由。而中国在腐败的清朝政府的统治下,仍在遭受着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宰割。宋耀如多么希望中国也能爆发像华盛顿和林肯领导的那场革命啊!多么希望独立、民主、自由早一天降临祖国的神州大地啊!

宋耀如的视野扩大了,他想上学读书,想到外边闯荡世界,不愿一生锁在养父的店铺里做一名安分守己的小店主,过一种安定富足的小市民生活。波士顿并非他理想中的天堂;而且他渐渐发现,波士顿人也不是幸福的天使,这里的黑人老是低着头,犹太人大都缩着脑袋,印第安人满脸绝望,中国侨民则总是流

露出一一种莫名的恐惧情绪。至于他自己也屡屡遭受种族的歧视。因此,他并不想在波士顿养父所开的这个华人小店里永远生活下去。

一天晚上,宋耀如的英语老师向他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波士顿的真实故事,1854年,从弗吉尼亚州一个种植园中逃出一个名叫安东尼的黑奴。他躲在一艘开往波士顿的船上,忍饥挨饿来到这个热爱自由的港口。安东尼的主人买通了联邦官员,出动警察逮捕了这个逃跑的黑奴。安东尼痛哭自己丧失自由的眼泪,感动了一位牧师。在这位牧师的带领下,100多位市民冲进监狱,救出了安东尼。但是,在随后的混战中,牧师不幸殉难,安东尼再次被捕,并立即被押往弗吉尼亚。这位为人类自由而慷慨捐躯的牧师,给宋耀如以极大的激励;而安东尼为上学而出逃的动机,强烈地震撼了他的心灵,激起了他心底的求知欲望,他多么希望离开店铺到学校去学习啊!

另外,两位中国留学生的来访,也加深了宋耀如求知的欲望。来访者一个叫牛尚周,一个叫温秉忠,都是中国派到美国来的官方留学生。他俩当时都是17岁。在波士顿期间,这两位留学生出于对祖国故土的共同情结,常到这家华侨店铺来喝茶,并且经常谈论着如何按西方模式去改造中国。宋耀如似懂非懂地听着,心中十分钦佩这两个青年的渊博学识以及口若悬河的谈吐,从而进一步萌发了上学的强烈愿望。

在一次又一次的接触中,温秉忠和牛尚周对这位稚气未脱、而又聪明伶俐的小同乡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鼓励他走出波士顿的丝茶店,在美国接受现代文明教育,待学业成就之后回到故土报效祖国。宋耀如受他们的影响,决心向养父提出求学的请求,如遭拒绝,就要像黑奴安东尼那样,不顾一切地去追

寻那一令人神往的目标。

果然，宋耀如向养父提出进大学的要求遭到拒绝。养父所需要的是一个安分守己、能够继承他的事业的优秀商人，而不是那种不切实际的好高骛远的空想家。在他养父看来，一个中国人来到美洲大陆，能够像自己一样经营和拥有一个丝茶店，已经是最好的选择和最可夸耀的成就了，不该再有其他稀奇古怪的念头！

1879年冬，宋耀如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仍然遭到养父的拒绝，他决定逃跑。逃跑的这一天，为了麻痹养父，白天他不声不响地拼命干活，到夜深人静时，偷偷地溜出商号，匆匆地跑到波士顿港口，躲进一只即将启航开航的小艇。他并不知道这只小艇将开向何方，更不知道前头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命运之神”。

缉私艇上的奇遇

宋耀如偷偷爬上的这个小艇，是一艘由波士顿开往北卡罗来纳州名叫“考尔法克斯”号的缉私船。船只当晚出海，行驶没多久，藏匿在甲板后侧的宋耀如就被发现了，并且被带到船长面前。39岁的船长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是个敬奉上帝的挪威人，听了宋耀如的诉说，他被这个16岁少年的强烈求知欲望和冒险精神感动了，决定收留这个中国孩子，并让他在船上服役，这对宋耀如日后的命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船长的鼓励下，宋耀如剪掉了辫子，穿上了漂亮的船员制服，并以查理·琼斯·宋的名字登记入册，从此成为美国财政部税务局一名领工资的船员，埃里克船长，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从他认识宋耀如的第一天起，他就十分自信地认为，自己是上帝派来拯救这个孩子的。于是他抓住一切机会，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在岸上，都要向宋耀如灌

输耶稣基督的教义，阐释美国新教宗旨，讲述耶稣传教的故事，宣传基督教徒为拯救人类的灵魂而甘于吃苦的献身精神。埃里克耐心的说教，征服了这个东方少年，使他很快成为一名基督教的信仰者。

缉私艇上的生活是紧张、危险而又快活的。在一般情况下，缉私艇要追上走私船，总得在弹雨中拼命行驶一阵才行，而要抓到走私犯更非易事，总要进行一番生死较量。在这样的严酷环境中，宋耀如学会了击剑，拳术和射击，也学会了唱歌和吹小号。宋耀如最喜欢唱的是《大浪，请你把我埋葬》这首海军军歌，歌词大意是——

在炮火中献身，我别无奢望——

上帝保佑我，让我的灵魂升入天堂，

大浪帮助我，把我的躯体深埋海洋。

宋耀如在这艘缉私艇上愉快地生活了一年多。随着时间的流逝，埃里克船长对他倾注了一种父亲般的感情。当埃里克被调往美国南方的威明港时，宋耀如又随他而去。埃里克还慷慨地答应满足宋耀如在美国接受现代化文明和高等文化教育的愿望。当时在美国南方，极少有中国人，所以宋耀如的到来引起了当地的轰动。

通过船长的介绍，罗杰·穆尔上校和里考德牧师等人，对这位来自古老而又神秘的东方大国的年轻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很快一致作出决定，接受宋耀如参加基督教会。1880年11月7日，宋耀如在当地教堂举行了洗礼仪式，正式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他在接受洗礼后，立即向对他寄予厚望的几位美国前辈庄重宣告：他渴望上学深造，以便将来回到中国去传教，让更多的中国人信仰基督。他这番话让里考德牧师及关心他的人极其高兴。里考

德牧师则打算送他到有名的神学院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就读，以便他系统地学习宗教知识。

在美国神学院刻苦攻读

宋耀如来到圣三一学院，感到一切都很好奇和陌生。由于他以前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文化基本知识贫乏，所以在神学院他被称为“特别生”。为了补习文化，教授们把他安排在课程紧凑的“预备班”，其他学生用十年学完的读、写、算要他压缩到几个月内学完。教授们还省略掉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课程，集中力量教他学好英语，使他可以完全沉浸在《圣经》里。

宋耀如除了努力学习外，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布道和募捐活动。他的歌声充满虔诚之情，他的号音使人精神振奋。他在布道中赞扬林肯，称颂解放黑奴是伟大的壮举。他经常和反对解放黑奴的人进行辩论：“你们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而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全部争论的实质所在！”他又尖锐、深刻地指出，亚伯拉罕·林肯有一句话是需要反复强调的，那就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奴隶制是多么美好，但没有一个人愿自己去当奴隶！”这句击中要害的话，顿时使全场鸦雀无声。第二天罗利市的报纸《罗利基督教导者》报道说“这是一位来自异国的、高尚的杰出青年。本报对其言论并非苟同，然而欣赏其出类拔萃的性格与才能。”通过这次小试锋芒，查理·宋名声大振。

时间在飞逝，宋耀如在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他想念养父，想念波士顿。他开始写信给养父，告诉他自己在美国南方北卡罗来纳州的情况。但自他出走之后，养父一直闷闷不乐，无心再经营自己的店铺，从而结束了海外谋生的生涯，返回老家海南文昌去了。随着养

父的回国,宋耀如更加思念中国,想念文昌老家和一直未通音讯的父母、兄弟姐妹,游子的归心在他心中跳荡。他对同学们说:“我远离华人,久在异乡,我觉得自己真像密西西比河中顺水漂浮的一个小木片,多么渺小啊!”说完他泪流满面……

就在这时,宋耀如收到盼望已久的从中国海南文昌县的来信,得悉家乡正闹瘟疫,死尸枕藉,惨不忍睹。母亲在信中叮嘱他在美国学医,以便将来回国救死扶伤。遵照母亲的意见,宋耀如神学院毕业后,接着又参加了德比特大学医学院的入学考试。结果各项成绩都名列榜首。正在这时,马克蒂耶主教对宋耀如学医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找宋耀如谈话说:“我们是上帝的忠实仆人,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上帝的旨意。你的祖国有无数的灵魂正期待着你去拯救,请好好想想这一点吧!”接着当众宣布:“查理·琼斯·宋应立即回去为他的同胞服务,听候中国布道区林乐知教长的调遣。在东方,有千千万万迷途的羔羊盼望着上帝派去牧人。在此蹉跎岁月,有违于《圣经》的教诲!”

就在宋耀如回国前,1885年9月和10月,迫害华人的恶浪席卷美国中部和西部。华人居住的唐人街被放火烧毁,大批华工惨遭杀害,成千成万的中国人纷纷逃离美国,据不完整的统计,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国西部的中国人由11万下降到6万。

面对着大批华人惨遭杀害,宋耀如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它有美好的理想,也存在最丑恶的现实!”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海外华侨受人欺凌宰割的情况,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祖国,必须在千百万人心中点燃民主革命的火炬,推翻腐败的清朝政府。在旧金山港口,他面对太平洋起伏的波浪,思索着中国命运。他终于彻悟到,健康的头脑比健康的身

躯更重要,应该尽快回国去,给祖国带去福音,用林肯的理想去唤醒国人!

归国传教屡遭磨难

宋耀如经过10年的海外浪迹生涯后终于回国了。1886年1月13日,他乘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轮船来到上海。

在法租界码头,宋耀如受到美国监理会中国布道区教长林乐知的欢迎和接见。林乐知可谓美国卫理公会的大人物,1860年就被派到中国来,是一位中国通。他主要是办学、办报,曾在上海创办《万国公报》和英华大学,在苏州创办东吴大学。他传教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知识界,他认为,如果能用西方的科学打动中国的社会名流,他们就会欣然领悟基督思想的西方文化,这必然对中国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当时上海是帝国主义集中的场所和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中国基督教最集中的地方。宋耀如所在的美国监理会中国布道区牧师只有他一人是华人,而且还是见习牧师。教会的一切权力都操纵在外国人手里,华人牧师的一切行动都要受到美国人的管制。

宋耀如来到上海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会见他在美国结识的留学生温秉忠和牛尚周。当时温秉忠在海关工作,牛尚周在电报局工作。他们三人在“一品香”餐馆相会。老朋友相见异常兴奋,除了叙说在美国分手后各自的情况外,谈话的主题自然地转到当前的国事上。

牛尚周说:“如今清政府腐败极了,中国没有法律,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皇帝主宰一切,国民都是奴隶!”

“那我们就应该掀起革命,推出中国的华盛顿、林肯,开辟中国的新世纪!”宋耀如压低了声音愤怒地说。

“先要赶走来自英国的占领

军。”牛尚周指了指窗外跑马场内的英国和印度官兵们说,“然后再推翻本国的清朝政府!”

“如今中国到处是外国殖民者的势力,我们上海的海关大权全操在外国人手里。”温秉忠说,“我估算了一下,光上海海关这个口子,每年白白奉送给英、法、美等国的财富就在白银一亿两以上,中国这条老龙的油水快被他们榨干了,我恨这个卖国求荣的腐败政府!”

“我和你们一样,”宋耀如说,“我认为这个半奴隶制度的朝廷简直是魔鬼,应当把它打倒!……”

这次见面后,宋耀如、温秉忠和牛尚周等人经常聚会,纵论时事,漫话古今,交流思想,抒发情怀。然而,曲高和寡,他们太孤立了。他们虽有救国之心,但他们信洋教,穿洋服,这就无形中为自己设立了一道屏障,使他们无法与国人融为一体;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改革宏论,被人们斥责为崇洋媚外和高经叛道。宋耀如为此苦恼极了。

美国监理会中国教区教长林乐知了解宋耀如的思想后,警告他不要卷入政治活动,否则要受到教会和上帝严厉的惩罚。但宋耀如不听这些,而且进一步行动起来。他约集了6位好友进行了一次公开要求摘除外滩公园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抗议行动。那天早晨,天刚蒙蒙亮,6名抗议者手捧“圣经”来到了外滩。宋耀如手里还举着一块用硬纸板制成的标语牌,上面写着:“请取下侮辱我们的牌子!”这6名抗议者很快遭到英国领事馆所雇佣的印度巡捕的镇压。宋耀如被打倒在地。消息传开,美国监理会教长林乐知立即找宋耀如训话,不准他再参与政治活动,并命令他立即到吴淞乡下传教,以示对他的惩罚。

在吴淞,除了必要的布道,宋耀如还在教会开设的学校教授英文,他的通俗而生动的教学方法受到学生们的欢迎。著名的学者胡适也是

他的学生。但不到半年，又派他到昆山传教。昆山，大多数居民是佛教徒，基督教徒很少。林乐知教长要他按时前往，并以延宕时日就不发薪水相威胁。为了锻炼毅力，磨砺意志，宋耀如决心从上海步行到昆山去。

1886年12月9日，宋耀如启程了。他刚刚离开上海，一个彪形大汉就在暗中尾随着他。此人是上海会党中有名的人物，因他姓朱，掌如铁锤，故外号叫朱铁掌。今天这位朱壮士身带利器是奉命来除掉这个下乡传教的“假洋鬼子”的。所有这些，宋耀如一无所知，只顾往前赶路。当他路过一个村庄，看到一个老太太因路滑跌倒滚进一个水坑里，救上来时已经奄奄一息，全家人痛哭。宋耀如立即对这位垂危老人进行人工呼吸抢救，终于在一片“阿弥陀佛”声中把老太太救活了。全家十分感激，下跪向他致谢！

所有这一切，朱铁掌都看在眼里，他决定继续尾随跟踪，看看再动手。往前走了约有10里路，天色正晚，只见两个全副武装的骑马清兵挡住了宋耀如的去路，并大声吼道：“宋耀如！你的死期到了！你造大清王朝的反，犯了杀头之罪，何不快快束手就擒！”

朱铁掌看到这般情景愣住了。原来他要刺杀的人，是一位反对清廷的好汉。朱铁掌是太平天国军的后裔，他对反清人物一向是十分崇敬的。这时他不但不再想刺杀宋耀如，而且急步上前将两名骑马的清兵打落至马下，折断了他们的枪支，并用铁拳重重一击，两名清兵趴在地上苦苦哀求，再也起不来了。朱铁掌向宋耀如双手一拱，说声：“保重了！”便转身隐没在浓浓的雪幕中。

宋耀如可谓历尽艰险来到目的地。然而，昆山却成了他难忘的“困山”。他住在美国监理会在昆山购置的一座破瓦房里，忍饥受冻，缺这少那，十分困窘。他还发现当地老百姓

对他十分戒备，不喜欢他，见着他就躲开，有人还骂他是“洋人的狗腿子”。面对这些，他如何向纯朴善良的同胞解释他的心迹呢？为此，宋耀如苦闷极了。

兴办企业，施惠于民

就在宋耀如在昆山传教期间，他和一位姑娘相爱，并结为秦晋之好。这位姑娘名叫倪桂珍，她出生在中国一个有名望的家庭，这个家族早在1601年就皈依了天主教。婚后，倪桂珍也随丈夫来昆山传教。

就在新婚不久，宋耀如又收到林乐知的上海来信，责成他用募捐的办法自筹资金，尽快在昆山建立一座教堂。面对这一难题，宋耀如犯愁了。昆山的民众会向他捐款吗？迄今为止，昆山的市民只向他扔过砖石和泥块。可是不募捐又有什么别的办法？于是宋耀如只得硬着头皮走上街头，乞求市民施舍，但市民的反应是冷淡的。一位老太太说：“要是你造一座中国的庙堂，我就捐，可你要造一所洋教堂，供奉洋菩萨，我就反对。”一些激烈的年轻人则对他警告说“你要造洋教堂，我们就把它拆掉！绝不让西洋恶魔亵渎我们的灵魂！”

在募捐不成的情况下，宋耀如急中生智，冒出一个念头：经商！他自信有足够的本领可以通过经商迅速积聚资金。想到这里，宋耀如高兴地对愁眉不展的妻子唱起了美国田纳西州的一首民歌：

挺起胸膛，年轻人不要沮丧！

到草原放羊，

去山里开矿，

上市场经商……

从此，宋耀如真的兴办起商业来了。他用自己设计制造的一艘小汽艇，往返于昆山与上海之间，经过半年的努力，在七宝镇民众的支持下，宋耀如用经商挣的钱办了一所教会学校，一个儿童乐园和一间大众医药所。这时，宋耀如虽然继续经

营商业，但他已把主要的心血灌注在他所创办的教会学校上了。开始，这所教会学校是圣日学班，后来规模越来越大。在招收学生方面，除了吸收教徒子女入学外，还吸收父母被杀的太平军遗孤，不但准其入学，并帮助生活困难者解决吃穿问题。学生入学不受年龄限制，除学龄儿童外，还吸收青年农民听课。在教学内容上，除了教学生识文认字外，还给学生上军操课，讲授美国的独立战争，解放黑奴，和林肯总统的“三民主义”。这些活动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但却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宋耀如万万没有料到，上海道台龚照璠在与美国教长林乐知会商后，竟派骑兵直驱七宝镇捉拿他来了。一时枪声大作，宋耀如虽然在慌乱中得以脱险，但他用心血办起来的学校、儿童乐园、大众医药所却只剩下一堆瓦砾了。

1888年11月7日，宋耀如夫妇离开昆山到太仓去传教。这里离上海远，交通又不方便，再像过去那样到上海跑生意是不行了。他了解到美华圣经会中国经理处需要大批中文《圣经》，便决定在太仓办一个印刷所。他除了紧张地印刷《圣经》和学校课本外，又为当地农民印历书，印《防病须知》、《治病简法》，免费赠送。此外，他还经常打着赤脚和农民一起下田劳动，和妻子倪桂珍挨家挨户为农民看病送药。人们对这位牧师的看法开始变了，渐渐由疑虑变为信任，甚至流露出感激之情。

印刷所越办越红火，宋耀如除了将印刷所的收入拿出一部分在太仓办了一所小学外，又买了一台磨面机，为群众磨面。但不久，这台蒸气磨面机因运转过热起火，与之毗邻的宋耀如的住处以及他所开办的学校、印刷所、儿童乐园统统付之一炬。这样，宋耀如不得不离开太仓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宋耀如并没有为

连续的不幸遭遇所击倒，他仍然不屈不挠地筹集款项，准备再开一所印刷馆。当远在大洋彼岸的卡尔夫妇听说宋耀如的太仓印刷所被烧毁，汇款来资助他再开办一个现代化的印刷馆时，宋耀如自己已有财力来着手进行此事了。他把卡尔的钱如数退回，并在回信中说“谨致诚挚的感谢。赞美上帝！上帝已经佑助我，使我有能力用他恩赐给我的金钱实施我开设印刷馆的计划。”

在朋友们的热心帮助和支持下，宋耀如的上海印刷馆又开业了。工厂设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段，并取名为“华美印书馆”，决心与美国人设的“美华印书馆”决一雌雄。为了薄利广销，宋耀如打破用价格昂贵的纸张开印《圣经》的成规，大胆地用廉价的纸张开印，使其价格大大降低，销量猛增。此外，还大量印学校教科书。由于印刷精良，价格便宜，这些图书颇受国内读者的欢迎。1890年下半年，宋耀如又承印了全国销量最大的中文报刊《万国公报》。所有这些，不仅使宋耀如名声鹊起，而且也使他获得了巨额利润。宋耀如不再是无名之辈，而在上海工商界中，日渐显露头角了。

就在这个时候，宋耀如在工商企业的掩护下，和地下反清革命者的关系日益密切。1889年，他经好友牛尚周和温秉忠介绍，正式加入上海一个有势力的反清的秘密会社，开始从“传教士”到“革命者”的过渡。宋耀如不仅给革命者印了大量宣传品，给以经济资助，而且他的寓所也成了反清革命志士躲避官府追捕、秘密聚会议事的地方。一位反清志士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壮哉印书馆，“华美”天下传。

《圣经》表其志，橄文壮我胆。

党人议光复，志士制炸弹。

勇兮中华人，至此最爱看。

随着印刷业务的日益扩大和革命活动的增多，宋耀如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经商和革命活动中去，而

传教几乎成了兼职。宋耀如由于大办慈善事业，大量免费赠送《圣经》和支持地下反清革命活动，经济上又一度陷于窘境。卡尔将军在美国听到这一消息后，再次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建议宋耀如进口碾麦机，办面粉厂，他相信面粉加工将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宋耀如接受卡尔的建议，又在上海办起了面粉厂和卷烟厂。这时，宋耀如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也有了很大的增强，他决定发起成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以“尽心爱国”、“开通民智”为宗旨，打破洋人的控制和束缚，独立地开展爱国传教活动。

跟随孙中山闹革命

宋耀如和孙中山相识后，改变了他后半辈子的人生轨迹，使他成为一位坚强的反清革命志士。他女儿宋庆龄成为孙中山夫人后，孙宋两家更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1894年阳春3月，孙中山由陆皓东陪同来到上海。宋耀如到码头迎接这位久闻大名的南国志士。两人相见，相互拥抱，热烈异常。晚上，宋耀如邀请了几位好友作陪，设家宴为孙中山洗尘。席终人散，夜阑人静。宋耀如和孙中山就救国救民的主张进行了倾心交谈。宋耀如对眼前这位与自己有着几乎同样经历的南国革命志士十分敬仰，决心追随其后，为推翻清朝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次孙中山来上海，主要目的是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宋耀如虽然对孙中山的才华与胆识甚表钦佩，但却不同意采用这种上书请愿的办法去求得改良。宋耀如认为，清政府已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向其上书，犹如与虎谋皮！当他向孙中山表明自己的看法时，孙中山解释道：他之所以要上书李鸿章，是由于他认为“李鸿章在当时尚可算为识时务之大臣，如果能够听他的话，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贫弱的中国，如果上

书不行，则可择道而行”。果然不出宋耀如所料，孙中山上书失败了。他在北京用英文写信给宋耀如说：“这个王朝已腐败到生蛆的地步了，当初希望它或可奋起，如今看来，已不能用改良的方法使其进步，唯有革命才是出路。”

孙中山一回到上海，立即雄心勃勃地向宋耀如讲述他的颇具冒险精神的革命设想：用外国人的客轮把造反者载送到上海、广州、汉口等地，利用清政府对洋轮的敬畏态度使造反者登岸，然后立即冲向衙门，占领各要害处，树起革命旗帜。

宋耀如认为，这样贸然起事难以成功。列强将会持何态度？这是举足轻重的大事。尽管如此，宋耀如还是佩服孙中山的勇气和决心。他取出珍藏的一把宝剑，意味深长地对孙中山说：“这把剑具有历史意义，这是当年一位太平军的将领战死前留下的。我原想把这件宝物传给儿女，现在把它送给你。希望上帝保佑你推翻清朝，大展宏图！”

孙中山说：“等我推翻了清廷再接受你这把宝剑吧！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随后，他就和宋耀如、陆皓东三人商议起来。

他们认为要推翻清朝，光复河山，首要的是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建立革命团体，为革命大造舆论。孙中山提议，这个革命团体的名字就叫“兴中会”，所谓“兴中”就是振兴中华之意。

接着宋耀如兴奋地宣布：最近他在进口机器的业务中又赚了一大笔钱，这是上帝的恩赐，他决定将这笔钱拿出来作为捐献给“兴中会”的第一笔经费。随后，他又意味深长地说：“让我们坚信正义就是力量，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勇敢地担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坚持到底！”

“兴中会”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广大中国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迫

切要求。为了宣传群众，宋耀如通过自己的印书馆广印《兴中会章程》，暗中散发。他要求将救国主张“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亟拯斯民于水火，切夫大厦之将倾！”

孙中山准备武装起义，就需要大量的钱，经费始终是困扰他的一大问题。在此情况下，宋耀如再一次倾囊相助。他把手头的流动资金全部交给了孙中山，而自己却去借款维持他所经营的企业和商务。为了保守“兴中会”的机密，捐款的事宋耀如瞒着妻子倪桂珍。因此，即使当时他在经济上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家中的人仍是毫无察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各地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以便更好地领导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东京赤坂桧町三番黑龙会址内，召开了中国各革命团体的代表大会，会上一致同意成立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正式的成立大会将在8月份举行。孙中山电请宋耀如尽快到东京协助这项工作，并尽可能多地筹备经费。当然也要求他仍然保持秘密革命家的身份。

在东京，宋耀如以徽州茶商的身份同孙中山相见了。孙中山对他说，“我请你来，是想请你加入同盟会的领导层。革命不仅需要你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还需要你那清醒的头脑和丰富的智慧。现在同盟会的多数成员反清的怒火虽极为炽烈，但真正有远见卓识的并不多，全面了解美国的就更少！”

“问题是我以什么身份出现对革命大业更有利？”宋耀如思忖了片刻，提出这个问题与孙中山探讨。最后两人一致决定宋耀如仍然保持秘密革命家的身份，他说，“我可以一身兼两任，既做一名牧师向民众传播福音，同时又是一个忠于领袖的秘密革命党人。”

孙中山望着面前这位虔诚的爱国牧师，感慨颇多。就是这位查理牧师，冒着极大的危险，全力支持革命，支持孙中山的伟大事业。他不仅为革命筹集了巨额经费，在宣传组织方面也付出了心血。他除了印制数以万计的兴中会和同盟会章程外，还秘密出版了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这些书的出版和大量发行，在广大人民中，特别在知识分子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激励人民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

为了给革命筹款，1905年秋，宋耀如远渡重洋，再次踏上他阔别20年的美国国土。经过他深入的宣传和动员，许多旅美爱国华侨，踊跃捐款，宋耀如的老友、恩人卡尔将军也慷慨相助。宋耀如这次美国之行，历时半年，共筹措经费200多万美元，这笔巨款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啊！

经过无数革命人士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清朝政府终于被推翻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荣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在政府各部人选通过前，孙中山曾急召宋耀如议事，邀请他出任外交部长或实业部长，但都被宋耀如婉言谢绝了。

宋耀如虽然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但对革命命运、国家前途依然十分关心。袁世凯窃权后，反革命狰狞面目进一步暴露。孙中山被通缉流亡日本后，宋耀如仍鼎力相助，不仅在经济上大力支持，而且鼓励他振作起来，重整力量，讨伐邪恶，并坚信正义的事业一定会取得胜利！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

当了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既无武器，又无经济实力，受尽了西南军阀的排挤打击，搞得“政令不能出门”，而且陆荣廷、唐继尧不顾孙中

山的反对，与直系军阀妥协，致使孙中山的北伐计划成为泡影。到了1918年2月，支持孙中山的海军总长程璧光被暗杀，好不容易支撑起来的海军第一舰队又脱离孙中山返回上海，护法运动遂告失败。

正在病中的宋耀如，听到这一消息不啻是五雷轰顶，被彻底击倒了。多少年来，他寄厚望于孙中山，希冀在他手中建立起民主共和，实现“民有、民享、民治”的三民主义，使这个落伍于时代、任列强欺凌的国家能够迅速振兴。为此，他败而不馁，踞而复起，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举家追随孙中山革命。可是，想不到中华革命直到现在，政权得而复失，孙中山仍然是个手无实权的光杆司令。宋耀如在病床上连声叹息“革命的前途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他感到心力交瘁，终于一病不起！

在宋耀如病危期间，1918年4月，宋庆龄匆匆从广州赶回上海，随侍病榻之旁。宋耀如的胃痛日益加剧，进食越来越少，经医生诊断，是难以治愈的“胃癌”。尽管家人将病情瞒着他，宋耀如也知道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在弥留之际，他最牵挂的是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孙中山的安全。他说：“我再也不能为逸仙帮忙了，我相信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事业一定会获得成功，中国的革命一定会胜利。”

宋耀如还告诉宋庆龄和其他子女，他死后不要纪念，让他无声无息地离去。他说，现在唯一使他欣慰的是，他倾注心血教育的儿女们都已长大成人。他希望他们能在孙中山的旗帜下为打倒军阀，建立共和作出自己的贡献。

1918年5月3日凌晨3时，宋耀如这颗愤世嫉俗、忧国忧民、虔诚上帝、追求民主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年仅55岁。他把躯体献给了大地，他把希望留给了后人。

（责任编辑 林 跃）

用毕生精力探索 民族音乐的安波

● 白 岩

“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

54年前，一出《兄妹开荒》秧歌剧轰动了延安城，轰动了陕甘宁边区各抗日根据地，也震动了大后方的重庆。1944年4月24日，《解放日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兄妹开荒》的剧本和曲谱，并发表了社论，称它是一个“很好的歌舞短剧”。从此，扮演剧中哥哥和妹妹的演员王大化、李波成了群众心目中的明星，曲作者安波成了知名的音乐家。

1943年春节，“鲁艺”组织一个大型秧歌队，他们从“鲁艺”驻地桥儿沟出发，直奔延安县委所在地川口给老乡拜年。在川口的篮球场上，人群已是里三层外三层。当《兄妹开荒》演出开始，扮演青年农民的王大化头扎英雄结、身着毛兰短褂，腰系红色丝绒带，肩扛一把锄头，一出场就给了观众们耳目一新的感觉，博得热烈的掌声；当扮演俊俏的陕北姑娘的李波身穿蓝裤花袄，腰系大红缎带、肩挑一副送饭担儿上场时，掌声再起。随着剧情发展，两位演员且歌且舞，洋溢着兄妹劳动竞赛的情趣与欢乐，这时观众发出由衷的赞叹：“好气派呀”，“好威风呀！”成百上千的乡亲完全沉醉在他们所熟悉的新型农民的欢乐生活之中了。几千年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第一次

看见自己以主人翁姿态登上了文艺舞台，再不是脸上涂着两个白粉团、头上扎着冲天锥、两耳挂着红辣椒，被世俗偏见歪曲了的丑陋形象。

这出新秧歌剧一出现，老乡们就喜欢上了，他们中有的背着干粮带上水壶，跟着秧歌队走东村串西村，看了一场又一场，他们说：“‘鲁艺’的新秧歌剧就是唱得好，‘鲁艺’的新秧歌剧真迷人。”

打这以后，延安10个区，区区间闹起了新秧歌，区区间排演《兄妹开荒》，它既娱乐了群众，也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正在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安波在为《兄妹开荒》谱曲的那些日子里，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以自己在民族音乐方面的深厚积累和高度的驾驭能力，把传统的民间音乐与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作了创造性的结合，以明快、奔放富有活力的艺术风格，昂扬乐观的旋律，来表现边区农民新的情感、新的形象。

安波这边还在谱曲，导演那边便已指派了王大化、李波扮演兄妹的角色，两人利用晚上时间到安波的窑洞里，在幽暗的煤油灯下，安波一面写，他俩一面试唱，唱了改，改了唱……《兄妹开荒》的曲谱就这样诞生了。

《兄妹开荒》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绽开的一朵芳香四溢的奇葩，它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它表现了中国的风格、中国的气派。音乐家吕骥说：“安波《兄妹开荒》的音乐语言，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其实，安波从事音乐工作是半路出家的。他来延安后，经过一段学习，便急切要求到敌后参加对敌斗争。组织上知道他有诗歌创作才能，便决定留他在鲁艺从事民间音乐的研究。那时候，他仅会唱几首山东家乡的民歌。他接受组织分配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陌生的领域，开始了大量的搜集、学唱、记录、整理、研究陕北民歌、秦腔、道情，“郿户”等民族民间音乐，在鲁艺组织开展的以采集民歌为中心的艺术活动中，安波起了打头阵的作用，只要听说哪里有民歌，他就赶到哪里。凡是逢年过节，他都赶到秧歌扭得最欢、小喇叭吹得最响、地蹦子跳得最热闹的农村或民间艺人家里度过，仅1938年一年里，他就搜集民歌三百多首，被同志们誉为“民歌大王”。他对音乐从一窍不通到熟悉，到深深地挚爱。为记下几首喷呐曲牌，他迎着寒风，顶着飞雪到几十里外去搜集。他不论到哪里，都像是一个探矿者，想方设法把埋藏的民间乐曲挖掘出来。他到盲艺人家里学读书，写出了《关于陕北说书》一书。为了研究地方戏曲，他向秦腔老艺人学习秦腔，一字一腔地记录了全部唱腔，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有系统性的戏曲音乐专门著作《秦腔音乐》。

安波迅速地成为掌握音乐艺术各种表现形式的多面手。他对民歌、民间音乐从不生吞活剥，从不照抄、模仿，而是广采博取，厚积薄发，化形化意，脱颖而出。他善于从民歌、民间音乐中选择、发掘健康和反映现实情绪的曲调，在民歌填词配曲这种音乐形式的基础上，安波已逐步走向了娴熟地驾驭新的音乐语言反映现实音乐内容之路。他改编、创



1962年
安波在大连

作了大量节奏明快、曲调质朴生动、富于民歌风格的音乐作品，如《拥军花鼓》、《跑旱船》、《移民和船夫对口唱》、《三十里铺》、《三绣金匾》、《翻身道情》、《公祭志丹同志》、《七月里在边区》、《兄妹开荒》等一系列不朽之作，唱遍延安大地，流传到部队、机关、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抗战胜利后不久，安波受命到东北地区开展文艺工作，他先后担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社长、文工团团团长、冀察热辽联大鲁迅艺术学院院长，转战在游击战争前线。1946年秋天，我军撤出张家口和承德。在撤退过程中，安波领导的剧社和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完全靠自己应付险恶的环境，剧社变成了武工队，安波成为最高指挥员，他带领剧社转入热南雾灵山无人区，凭借山岗岗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在生死搏斗的艰苦环境里，更激发了安波的创作激情。白天拿枪同敌人作战，夜里握笔进行歌曲创作，他针对当时队伍中有少数人对我们暂时处于逆境不理解，产生悲观情绪，写出了民歌联唱《人民一定能战胜》，这是在一

个叫大碾子沟的山窝里，在烟薰火燎的松明子的火焰下写成的。安波的创作室、课堂在山野间，在战场上，在宿营地，他身边的同志常看到他在行军途中停下来写些什么，同志们终于探知了究竟，原来他在记录创作提示，记歌曲的乐句。著名音乐家刘炽讲过安波在延安时的一件趣事，刘炽当时年龄很小，很喜欢安波这位大哥哥，他们同住一个窑洞，一天夜里，刘炽熟睡中被一阵低吟浅唱的声音搅醒，他支起身子细听，歌声来自安波的床头，他明白了，赶紧拿起纸笔把安波梦中的“创作”速记下来，第二天起床后，刘炽把速记的曲谱交给安波，安波哼唱连说：“有韵味，有韵味”，引得同志们大笑不止。

安波是在战火中走上文艺岗位的，对他来说创作就是战斗，作品就是武器，祖国的独立、民族的生存、人民的解放就是他创作的题材和主题，他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谱写着醒人的乐章。

如果说，在抗战时期我们听到的是安波以农民为主要描写对象，

像《兄妹开荒》、《三绣金匾》、《翻身道情》、《三十里铺》、《拥军花鼓》等流行很广的作品；那么，到解放战争时期则创作了一批以战士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有民族特点的新军歌。1947年秋，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在辽西战场杨家障子战斗中，安波领导一个文艺小组深入前线九纵队的一个连队里，一方面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一方面搜集素材进行创作。在与战士共同战斗中，他发现有些战士对无尽无休的行军产生厌烦心理，针对这一情况，安波以他艺术的敏感在阵地上写出一首气势豪迈的兵歌《运动战，歼灭战》，这支歌一脱稿，很快传遍了九纵队，传遍全军。这支歌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焕发了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势如破竹，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此时，安波又写出了兵歌《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那铿锵有力的节奏，呐喊般的旋律，成为进军的号角，那歌声随着部队进关，南下，直唱到全国解放。这一时期安波倾其全力于军歌创作，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人民一定能战胜》、《运动战、歼灭战》、《攻坚战》、《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都因为有了共产党》、《一枝枪三枝手榴弹》、《人民解放军来自人民》、《我们是人民的战士》、《三猛歌》、《炮兵歌》。安波的创作素材取自他亲身感受的火热的战斗生活，他的艺术形式直接依傍民族民间文艺。如果说安波是一位为革命战争胜利鼓与呼的音乐家，勿宁说他是一个荷枪跃马冲锋陷阵的战士。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安波在战争烽火中，在担任繁重领导工作的间隙，写下了三百多首歌曲，这些歌曲以精致简练的素描与速写的形式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使命，人民的呼声，国家的命运，时代的要求，这些歌曲在唤醒民族，打击敌人，激励革命，讴歌建设，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展现

给人们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生活。

安波最初接触少数民族的民歌是在内蒙古喇沁旗地区。深沉的马头琴声和那如泣如诉的歌唱使他深受感动。后来鲁迅艺术文学院迁到热北一个叫那拉必流的村庄办学时，安波为培养蒙族文艺人才创建了蒙族学员短训班，他们都会唱一些本地区流行的各种形式，各种体裁的民间歌曲。安波组织音乐系教师和蒙族学员到驻地蒙族群众中搜集、记录民歌，开掘蒙族民歌的宝藏。在那段时间里，安波住的小屋里煤油灯常常是彻夜亮着，时而还传出低声的吟唱，这是他在翻译、整理大家搜集的民歌，他把一颗颗珍珠进行剖光雕琢，让他们放出异彩。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本东蒙民歌编就了。这是我国第一本少数民族的民歌专辑，无论从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从思想性艺术性来看，都有较高的水平，它的问世，对内蒙民间文艺的发展起了开创性的作用。

安波经过长期对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研究，先后出版了《陕北说书音乐》、《秦腔音乐》、《东蒙民歌选》、《东北民歌选》、《越南民歌选》。《越南民歌选》是安波出任越南文化专家时，利用工作之余搜集整理的，它是我国第一次编选出版的外国民歌集，即使在越南也是较为完全，系统，有学术价值的选本。

安波在民间音乐领域中走过的路是艰辛的历程。他从搜集汉族民歌开始，进而扩大到少数民族民歌，从国内民歌到国外民歌，从民间乐曲，戏曲音乐，直到民间驴皮影，山东琴书，评剧音乐。

那是1948年秋天，鲁迅艺术学院转移锦州的行军途中，路过一个叫王家村的地方，安波在那里看了皮影戏《巧娘传》，引起他的兴趣，他决定改造旧影戏，使其为娱乐和教育群众所用。到锦州后，他把皮影艺人陈万成召到鲁迅艺术学院学

习，并让他边学习、边办皮影艺人培训班。结业后，陈万成编写了一批新皮影脚本，在锦州各地演出二百多场，受到群众普遍欢迎。

50年代初，安波曾参与评剧《小女婿》、山东琴书《大刚与小兰》的改革音乐设计，并为它们补写了新曲。他把吕剧音乐、山东民歌的音乐揉进了山东琴书，在形式上结合得天衣无缝。他为《小女婿》谱写的“小河流水”唱段脍炙人口，至今还在全国流传。

在我国乐坛上，象安波这样珍视民间音乐，坚持探索研究民间音乐的人是不多的，恰恰是一般音乐工作者容易疏漏的品种，他却倾注极大的热情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安波通晓四国文字，对西洋音乐和美学都有精湛的研究，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戏剧家、文学家、艺术教育家，但是他却一门心思地钻研民族音乐，运用民族民间音乐，发展民族民间音乐，用毕生精力去探索一条艰难的却是自己民族的音乐之路。音乐家李焕之说：“安波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有独特贡献，他是发展民族民间音乐的组织者和开拓者。”

安波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最主要的是他遵循了毛主席《讲话》所指引的方向，时刻不忘人民群众，时刻不忘深入生活，从生活中、人民群众中吸取艺术营养。他走的路是一条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相联的路。

当周恩来总理决定为发展民族音乐创办“中国音乐学院”时，就已选定在民族音乐方面有着卓越才能的安波担当首任院长。总理在出访非洲途中电话催他尽快到任。安波肩负总理的重托，信心百倍地投入了中国音乐学院的筹建工作。在学院筹建刚刚就绪，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音乐创作又派在他的头上。在《东方红》的音乐创作中，他

强调突出革命传统和民族精神，强调尊重革命历史歌曲的时代特点。他有效地运用了民族乐器，组成了一百多人的民族乐队，用双管演奏《江河水》，同管弦乐结合起来，充分表现了旧社会人民的苦难，使民族音乐拓现出一个新的境界。

1965年6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完成不久，安波的肝病复发，住进了医院，诊断为肝癌晚期。病情很快恶化，开始出现昏迷，可一旦他苏醒过来，首先问的是工作，除学院的教学、创作之外，连辽宁人艺将要上演民族舞蹈也装在他的心里。周扬同志去看他那天，他刚从昏迷中苏醒，他谈了很多有关发展民族音乐的建议，就是只字不提自己的病和病魔带给他的痛苦。周扬离开病房时忍不住簌簌泪下。唱过安波谱曲的《兄妹开荒》、《三十里铺》、《翻身道情》、《三绣金匾》等歌曲而成名的歌唱家李波、郭兰英来病房看他时，他已睁不开眼睛，但从声音中听出是李、郭两位老战友来了，他毫无伤感之情，依然风趣地说：“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生与死的达观态度。

安波在最后与死神抗争的日子里，还完成了最后一首歌曲《毛泽东颂》的创作，这是他忍着病痛的情况下精雕细刻、反复修改完成的。

1965年6月18日，这位民族音乐的开拓者、创新者，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历程，他胸前佩带着两枚越南民主共和国授予的胡志明勋章，安然地去了。在向他遗体告别时，很多人声泪俱下，著名诗人郭小川边哭边喊：“安波啊，安波！你才49岁，你是活活累死的呀！”

安波走了，留下了他酷爱的民族音乐，留下了优美的旋律，安波的名字和业绩深深地铭刻在革命文艺运动的史册上。

（责任编辑 舒元璋）

解放前夕

《闯王进京》演出回忆

● 田 奇 李 犁

1948年冬，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平津战役即将打响之际，为了迎接“进京”，我们在战地连续演出大型京剧《闯王进京》。

李闯王那场悲剧已成为尘封的史料，轰动一时的《闯王进京》也已成为时隔半世纪的陈旧回忆，但是，历史所提供的思考也许并未过时。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发表55周年。不久前，我们一些曾在半个世纪前从事过战地文艺工作的老战友，有过一次偶然的小聚会。叙旧谈今，话题不由地从回忆《讲话》落到当年排演《闯王进京》的往事，许多情景，历历如昨。虽时过境迁，风移景易，大家却好像从旧记忆中找到许多新感觉。

旧记忆 新感觉

恰如毛主席所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确是如此。正是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有了这几十年的风雨历程，经历体验，尤其是党提出在当前的新时期应高度重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包括文艺界的风气）问题的时候，临“风”驰想，再来回味当时我们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排演这出戏的前前后后和方方面面，才在更高的“理解”度上，“更深刻地感觉”到了《讲话》的意义和排演这出戏的意义，特别是，“更深刻地感觉”到了党的历史上著名的两次西柏坡会议（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和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意义。

西柏坡会议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党中央也由西柏坡迁入北京。这是在李闯王的农民起义军

进京305年后，又一次人民革命政权轰轰烈烈的“进京”壮举。不同的是，这新一次壮举是在20世纪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进行的。进京之前，对如何迎接革命的全国胜利，在党的领导层中就有着足够的清醒认识。两次西柏坡会议在全国胜利尚未到来前，就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牢记政策、纪律之重要，特别是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这些极富先见远见的告诫，在我们进城后若干年中，犹如照彻征途的灯塔，曾经起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导航作用，使我们队伍中大多数人保持了头脑的清醒。进城前，为广大党政干部和解放军官兵演《闯王进京》，汲取那场农民革命失败的反面经验，以垂训今天和后世，就是对党的上述重要告诫的深入宣传，也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对《讲话》精神的又一次深入贯彻。

1944年，郭沫若先生写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在1944年4月所作的题为《学习和时局》的讲话中，曾说到此事：“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即指《甲申三百年祭》），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当时的八路军总政治部也曾为此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全党全军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学习这篇文章，指出：“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正是根据这个精神，解放区剧作家马少波以《甲申三百年祭》为主要参考材料，增加了一些人物和情节，编成了多幕多场大型京剧《闯王进京》。剧本以明末政治腐

败，经济凋敝，人祸天灾交相为害的境况为历史大背景，而以陕北饥民暴动为全剧开端。在众家起义军中，又以李自成起义军为全剧主线，叙述了李自成独能延揽人才，采纳忠谏，讲究政策策略，终以一哨不大的队伍，迅速“聚众百万”，取京师，亡明室，然立足未稳迅速即转入失败的过程。揭示了其胜在政策，败亦在政策，而成败又在于能不能一贯“保持优良的作风”（七届二中全会报告语）。1945年，该剧首先在胶东解放区试演，反响很好。修改的剧本在解放区出版发行后，许多文艺团体陆续演出。这是《讲话》发表后的几年中，解放区文艺界盛事之一。

我们冀东军区文工团拿到这个本子时，正是1948年秋，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变。解放大军摧枯拉朽般的胜利，解放区的迅速扩大，特别是新解放城市的大量增加，已使得向全党全军加快进行关于新区和新解放城市政策的教育，迎接全国胜利，成为非常迫切的课题。军区政治部要求我们以执行紧急战斗任务的姿态，突击排演《闯王进京》；但我们这个文工团从未演过大型京戏，团员中懂京戏的寥寥无几。时间紧，任务重，政治性强，只能克期完成，不容推卸拖延。在文工团长姚铁主持下，我们学习了《甲申三百年祭》和一些有关的文件，并特别重温了《讲话》，把排演这出戏当作文艺战士参加面临的伟大战役的至高无尚的光荣。

排练中最大的问题是对京戏那一套唱念做打几乎完全外行。好在原剧本中就附有部分现成的曲谱，又由新调来的几位曾受过一定科班训练的同志，根据剧本要求，设计了一些唱腔，他们也就成了临时的京剧教练。但相当大程度上仍不得不因陋就简和因利乘便，借文工团员们大多识谱能力强的有利条件，让各人照谱练习。唱出来倒也不大离谱，就是总缺点地道京韵味儿。我们的导演、文工团副团长康占元有相当的话剧、歌剧功底，导

演中，他就大胆揉进了话剧歌剧表现方法。这不但解决了我们念白时既不像京剧又不像话剧的问题，而且解决了观众对传统京剧唱词不易听懂的问题。这是大胆的革新，但观众接受了。为演好这出戏，我们不少同志眼睛熬红，嗓子唱哑，一身伤病。但从开排到基本可以凑合着上台，却只用了半个多月！

1948年的冬季和转年的年初，我们几乎天天行军，连续演出。多少晨霜暮雪，冷月寒星，敌机骚扰和隆隆炮声，伴随着我们度过了那段极紧张又极兴奋的战斗日子。往往是白天急行军数十里，晚上立即登台演出，第二天又赶赴另外的演出地点。演出对象主要是从白山黑水或太行北岳赶来执行平津战役任务的几十万大军和准备进城做接收工作的地方干部。演出往往从天擦黑演到后半夜，当观众在零下几度十几度的严寒中全神贯注地看戏，为剧中情节、剧中深含的思想底蕴所吸引、所感动时，我们也演得最投入最动情。观众的鼓掌、流泪、唏嘘感叹，点头摇头，都说明他们看懂了，而且有所领悟、有所收获了。记得某纵队一位首长一次在演出前向部队讲了这样几句话：“这个戏好，它演的是三百年前的事，但让我们思考的应该是明天。”

时隔半个世纪了，不久前，本文作者之一、当初演李闯王的田奇，与住在同一干休所的一位离休老干部、当年的一位营长聊起天。那位营长曾看过我们演的《闯王进京》，至今记忆犹新。他说，那时，他的营有一半是解放过来的原蒋军士兵，经过阶级教育，那些大多是贫苦农民出身的战士调转枪口打老蒋倒很勇敢，就是纪律差。看了《闯王进京》，都受到很大教育，这是形象的教育，比上几次政治课还管用。同所还有一位离休干部，当时是作战科长，现已80多岁，记忆力不大行了，但至今对这出戏还记得清清楚楚，说起来如数家珍：“这个戏我一辈子忘不了，我们只要永远记住那教训，就能永远立于不



解放区演出
《闯王进京》
的剧照

戏外音 题内话

其实，这出戏之所以令人难忘，之所以在特殊历史时刻给当时的特殊观众制造过特殊震撼，细细想来，还有若干耐人思索的戏内戏外之音，叫人久久萦回于心。

比如，李自成进城之后，不采纳将军李岩、军师宋献策的忠谏，急于准备登基做皇帝，而未对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大军和明朝为数尚多的军事力量作应有的防范，这不仅不是出于速胜而骄，而应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当时，李岩在大部分起义军进入北京城内、且纪律开始败坏之际，独能严控所部，驻军城外，纪律严明，且“访问民间情弊”，安抚人心，是引起了李自成疑心的。加上丞相牛金星借机搬弄挑拨，宋献策又早有“十八子当主神器”之言，“十八子”组成的“李”字，究竟是落在他李自成还是落在既有韬略才能，又在军民中享有威信的李岩身上？对未能摆脱臆迷迷信的李自成来说，毕竟是个难解的闷葫芦，嫌忌由此日增。于是，李自成既不能不留下足够的军队来防备萧墙之内的可能祸患，又不敢轻易让疑有贰心的李岩兄弟率部离开京师去守边。内外之虑，内重于外，这恐怕是并非缺少见识的李自成对近在山海关外的现实威胁“疏于防范”的一个难言之隐吧！“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封建宗法传统下从来如此。所以我国历代农民革命总带有两个特点：一是革命危机总爆发时，天下起义军蜂起，却很少能真正联合起来（有联合也是暂时互相利用，李自成、张献忠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一致对付封建统治者，往往是各立山头，各自图霸，互相争斗兼并的居多；二是一旦胜利，或刚刚胜利在望，就往往兔死狗烹，自伤其类，革命将要功成之日，即是内斗开始之时。兄弟袍泽自相残害的结果，导致农民革命总以两种形式失败：或领袖变质成为新的帝王，重返封建统治老路（如刘邦、朱元璋），或被旧王朝扑灭诱降，树倒猢狲散（如水浒英雄、太平天国）。不甘受苦的农民们“闯”了一番，付出血的代价，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受苦境地，反复地作圆圈式循环运动。明末的伟大起义也未能摆脱这个命运，李自成这样的英雄人物也未能摆脱小生产者的沉重的精神锁链和狭隘的思想境界。进京伊始，李岩李牟兄弟双双被杀，红娘子愤恨离去，宋献策不辞而别，刘宗敏、牛金星矛盾爆发。大业未竟，内耗已深，军心离散，势如覆水。以致山海关一败，竟至一溃再溃，百万大军的往日锐气一去不返。从进京到仓皇弃京退走，不过短短44天。

在谁“主神器”这个死结之前发生无情的内斗内耗，与胜利之后容易骄傲自满滋生腐败一样，是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培养基的。千古多少民间豪杰，一旦以匹夫田客

而南面称王，大都表现出“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的狭小器量。艰苦岁月情如手足同仇敌忾，胜利之后离心分化拔刀相向，与封建王朝内部为争夺权力往往家庭喋血六亲不认，出于一辙。不同的阶级身上，竟深深留藏有相同的遗传基因和灵魂烙印，每有条件，就要表现出来，是个虽则令人惋惜遗憾却又不容讳言的顽症。改造这基因，消除这烙印，是艰巨长期的工程，不要以为可以轻易克服而放松自我省惕。这，是不是在看了（或演了）《闯王进京》之后，应该感受到的又一深刻启示？

又如，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点上，李自成是首尾不一贯的。李岩兄弟、顾君恩、牛金星、宋献策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在李自成起义途中参加起义军的，也是帮助李自成很快从“流寇”境界过渡到“王道”境界，顺利进京问鼎的智囊班子。李岩从加入起义军伊始，就对李自成提出了若干重大政策性策略性建议，如劝自成“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提出“尊贤礼士，除暴恤民”，“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任前事，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等，并在民间广为宣传“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扩大政治影响。顾君恩则提出先取关中作为基地，然后从明朝兵力薄弱的山西北部迂回夺取北京，直捣明朝统治中心，以取得最大政治震撼效果的战略方案。这些都为李自成欣然采纳，从而大大加速了胜利进程。李自成对这些人才都极重用，几乎言听计从。

值得特别提一下有点神神道道的人物宋献策（本文作者之一的李犁扮演了他），这个人其貌不扬，以占卜星相家面貌出现，借“天命”来道出他的思想。但他却是个很有见地的人。有一件事，马少波未写进戏中，《甲申三百年祭》却据史料引用了。那是宋献策与李岩由明朝的官员们“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多见”的现象，谈到明朝政治制度之弊端的一段对话。宋认为，明朝用人取士重科举，凭资格，又发展到循人情，卖官鬻爵，“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李岩以为说得很对，“遂与宋成莫逆之交”。他们都不赞成李自成采纳牛金星之言，积极准备用弊病丛生的科举制度选士。可见他们参加起义并不仅以改朝换代为终极目的，而是还有改革旧制的某些考虑。李自成建立新朝，果能继续重用李岩、宋献策这样的人，很可能还有一番革新作为，可惜他终是被牛金星的谗言、更是被他自己的狭隘眼界耽误了。地位（和利益）改变了，能否一如既往地尊重人才，特别是尊重不同意见，这里，李自成也为我们提供了殷鉴。

尾声短 余味长

在整出戏的末尾，有短短的两场戏，叫《军民离散》和《闯王遗恨》，可看作全剧尾声。

——在大江南岸一处荒林中，几个衣衫不整、遍体血迹的农民军士兵互相搀扶着出现，他们是刚刚逃过江来的。观众可以辨出，他们多是本戏开场时的陕北饥民、随闯王造反十多年的兵。其中一老兵在各场战斗中出现尤多，作战水充前茅（我们副团长、导演康占元扮演了这个老兵）。

在这些逃散重聚的士兵把臂唏嘘时，幕后传来凄怆的、来自广大田野的歌声：

“闯兵本是百姓军，为何把百姓倒忘了？”

今日兵败武昌地，大功垂成一旦抛！……”

听到老百姓这样的含悲带怨的歌声，农民军士兵们泪如雨下。一个士兵忽哭声大喊：“我恨不能把闯王杀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这是最后一场。跟着是

——深山，残月，枯树，破庙。李自成披发仗剑自草丛中出，踟蹰张望良久，缓缓舞剑而歌，歌声苍凉悲壮：

“为民请命把兵发，群力推翻帝王家；

一步走错全盘输，如今单身走天涯！”

歌声将歇，一须发皓白、观众熟悉的那位农民老兵从草丛出，一刀向李脑后砍来。李急闪过，问：“谁？”老兵

道：“乃万岁部下，为保驾而来，万岁只身在此，想必饿了，我箭囊中有干粮，特来送饭。”李接过箭囊，见有“李岩箭囊百发百中”字样，惊愕愧悔交加，泣下数行，此处有一段自谴的唱、白：“……时乎不再来，只有一死以谢罪天下！”于是拔剑欲自刎。老兵感动，急夺剑跪倒请罪：“老汉此来非为保驾，乃为刺驾而来，箭囊内干粮有毒药！”李抚囊惊住，一时无语：“啊！……”

俄而清兵追至，老兵为掩护李，力战而死，李突围逃走。幕急落。

这不是史实，是剧作家的虚构，虚构得有深意，是神来之笔！

演员演至此处落泪，观众落泪，留下长久的、长久的思索。

史家对李自成的下场有两说：一说在湖北通城九宫山索食时被地方地主武装所杀；一说这不过是“设疑代毙”，实际是逃到石门夹山寺“禅隐”起来，当了和尚。

不管是哪一说法，都说明：他离开了人民，人民也离开了他。

（责任编辑 一 尘）

挑一本好看的文学杂志，选来选去还是《今古传奇》

今古传奇

传奇而不猎奇，通俗而不庸俗，纪实而不失实。
隆重推出二十万元文学大奖，作品质量有保障；
一贯坚持每稿必复每问必答，国内难找第二家。

定价 9 元，全年 54 元，代号 38—83

共 鸣

等待报刊转载 不如先睹为快
全国多家报刊经常转载本刊文章

主 要 栏 目

本刊专稿 热点追踪 社会广角
历史长卷 人物春秋 纪实连载
港澳多棱镜 台岛万花筒
邮发代号：46—136
统一刊号：CN44—1176/D
每期定价·4.00 元

欢迎赐稿 欢迎订阅

摩梭人母系家庭的待解之谜

● 吴象

川滇边境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有一个水面相当大的高山湖——泸沽湖，这是摩梭人世世代代聚居之地。摩梭人总数约为五万，一半左右生活在湖的四周，分属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和云南省丽江地区宁蒗县管辖。摩梭人一直延续着近似原始母系社会对偶婚的阿肖婚制，由于它隐蔽于万山深处，非常偏远闭塞，鲜为外界知悉，近些年来，国内外报刊作过一些报道，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前往观光访问者逐渐增多，但限于各方面条件限制，再加上种种不一定确切的传闻，更增加了它神秘的色彩，使其真实面目越发扑朔迷离。

1996年12月间，我同几位同志一起，从北京到成都去参加一个会议，会后由中共盐源县委书记王金铁陪同，专程到泸沽湖去作了一次访问，实地观察了摩梭人的生活、婚制、习俗；到一些摩梭人家中作客，参加了他们的篝火歌舞，同他们一起乘独特的猪槽船在湖上荡舟，并访问了摩梭人末代土司融宝成的遗孀萧淑明。萧是出生于成都的汉人，是国民党时期西康省刘文辉军需官之女，毕业于康定女子师范学校。30年代后期嫁到泸沽湖来，深受土司宠爱，有一段时间曾经是泸沽湖的实际统治者，现已年过七旬，但身体健康，对往事记忆清晰。回到县城，我们又同一些熟悉摩梭人情况的同志进行了座谈，县政协副主席杨拉珠（摩梭人，曾任解放军团长），副县长陈荣（曾在泸沽湖做基层工作十余年）所谈内容丰富而又珍贵；县委宣传部、地方志办公室还送给我们一些资料。这里竟然存在着基本上没有变形的母系家庭，实在令人惊讶，恐怕也是当今世界上罕见的奇迹。此行所见所闻，使我们对摩梭人的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同时也深感整个摩梭人的问题，

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泸沽湖·木楞子·摩梭人

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广人稀，山高路远，从自治州首府西昌到盐源县城170公里，车行需四个多小时；从盐源到泸沽湖约130公里，更是莽莽山林荒野，过去骑马或步行，要走三四天以上。1995年修了一条公路，次年夏季多处塌方，崎岖难行，但沿途景色秀丽，引人入胜。车行约四小时，终于走出密密丛林和千沟万壑，眼前豁然闪亮，望见群峰环抱着一大片水面，泸沽湖到了。

泸沽湖，当地人称“谢纳米”，意为母海，状似一弯新月，有一个半岛延伸到湖正中，从高处远眺，恰似展翅的飞燕，故又称“燕海”，湖面海拔2688米，面积50.8平方公里，平均水深40米，容水量20.32亿立方米，不知在我国高山淡水湖中可以名列第几？伫立湖边，只见湛蓝的湖水波光闪闪，显得如此辽阔，如此空旷，如此宁静，不禁令人油然而生一种回归大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之感。湖周皆山，西北面巍然矗立着奇伟壮丽的格姆山，“格”意为神鹰，“姆”为女儿，“格姆”即神鹰女山或母山，因为状如伏卧的雌狮，故又名狮子山，是摩梭人最崇拜的女神的化身。每年农历7月25日，摩梭人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换上艳丽的衣裙，佩上漂亮的服饰，带着酒菜和干粮，手持鲜花或红叶，从四面八方涌来，向格姆山女神烧香磕头，顶礼膜拜，并踏着欢声笑语，高唱低吟，绕湖缓缓前行，一边祭祀一边娱乐。一路上红红绿绿的转山转海队伍如同色彩斑斓的长龙游动在山水之间；一只只冒着青烟的猪槽船相伴而行，湖内和湖岸上不时传出阵阵嘹亮的对歌声，呈现出奇妙壮观的景象。这是信奉鬼神、崇拜大自然的摩

梭人众多节日中最隆重、最热烈、最欢乐的节日，往往延续十多个小时，至夜深不散。

泸沽湖东南部为草海。海与湖相通，草海实际是泸沽湖的溢洪道和出水口，湖水由此经盖租河注入雅砻江，草海全长7公里，宽约800米，面积近万亩，窄处有一座300多米长的木桥横跨南北，是当地人来往两岸的交通要道，水面较浅，芦苇茂密，盛产裂腹鱼、鲤鱼、草鱼、鲑鱼，以及红虾、螺蛳、菱角、海藻、贝类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水生动植物，是难得的天然牧场和养殖场。每到冬季，还有许多候鸟成群结队来此栖息。60年代困难时期，浮肿病遍及全国，摩梭人由于草海鱼虾丰盛，芦苇中处处有野鸭蛋和菱角，得以温饱无虞。

在泸沽湖四周的平地、丘陵和浅山之间，散落着百十个摩梭人的村寨（夹杂有个别纳西族、蒙族或藏族的寨子），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的房屋建筑：“木楞子”。它的墙壁是用两丈多长的树干砍方后横排着垒成的，故称“木楞子”。只有泸沽湖特有的“木楞子”房才能包容摩梭人口众多的母系家庭，而这种别处没有的房屋建筑也从另一方面展示出摩梭人母系家庭的特色，其结构为四合院或三方一照壁，再配以劈柴围墙或土围墙，形成一个独立的院落。院内分经堂，正房，楼房和畜厩。正房一般是坐北向南或坐西向东，与楼房相对；上方为经堂，下方为畜厩，中间是院坝；楼房楼上分隔为若干小单间，作为成年女子的卧室，称之为“花房”，一般不准男人进内。楼下为杂物间。上房为经堂，下方为畜圈，正房摩梭人称为“依梅”，为家庭成员集体居住之处，又是炊事、进餐、议事、聚会的场所。比较讲究的家庭，墙壁还涂上深色的油漆，或红或黄，非常耀眼，远远就能望见。屋顶为人字形坡，用杉木板覆盖，正中插有铁制三齿叉和

一面印有经文的旗子，后侧通常开有天窗。正房室内有两根一尺左右直径的圆柱，右柱为女柱，称“龙杜梅”；左柱为男柱，称“瓦杜梅”；设上火塘和下火塘，按家庭辈份及性别入座，正屋左边为卧室，右边为磨房、厨房和物品保管室。

木楞房的上梁仪式和点火仪式均很独特，上梁仪式俗称“抢耙耙”，即在男柱和女柱立好后，横架一根涂有红泥巴，并写有吉祥如意之类藏文的横梁。横梁的中下方钉一块新红布，内装供神的五谷杂粮，以及银元和当年的一本历书，表示家庭不愁吃穿不缺钱花，同时证明该房修建年代。在放过三声或九声土炮后，由主持木匠带上耙耙、硬币或铜钱、青稞等，从梁上往下抛，前来庆祝的男女老幼即刻蜂拥而上，争抢抛撒之物，之后选择属水的那一天进火，同时还要选择一名属命为水的男子和一名属命为火的女子。升火日是在太阳初照山岗之时，主人放过九声土炮后，男子即点火把从正房的后门进，女子背水从前门进，二人相遇后，同时由男子升起上下火堂的火，女子则煮水，表示水火相克，避免木楞房以后发生火灾，同时

也象征火塘里的火永不熄灭，水源源不断，接着开始念经，宴请亲朋好友，晚上举行盛大的甲搓体舞，以示祝贺。

摩梭人的家庭一般是十几人，多则几十人，均系一个始祖母的后裔组成，都是母系血统，没有什么姑嫂妯娌、公爹婆母的关系，因此也极少有家庭纠纷。家庭成员中，祖辈只有外祖母及其兄弟姐妹，她们称这一辈的男子为“阿普”，女子为“阿呀”。母辈只有母亲、舅舅和姨母，家庭中由辈份最高的祖母统率，由一名能干的妇女负责安排生产劳动及操持家庭经济、保管财物，称为“达布”；全家共同劳动，有事共同商量，民主和睦，尊老爱幼，以“攒私房钱”和闹分家为耻。抚养儿女是母亲及其姐妹兄弟的共同责任，晚辈则应尽赡养母亲及其姐妹兄弟的责任，如不守“古规”，便是没有“良心”，就会受道德的谴责和社会的批评以至惩罚。

泸沽湖是名副其实的“女儿国”，女性是母系家庭的家长，主持家中的宗教祭祀活动，也是生产劳动的主力军。摩梭人在充满母爱的家庭氛围中生活、成长，养成依恋母



摩梭人在打青稞

亲、崇敬女性的传统，性格淳朴善良，言行举止彬彬有礼，待人接物诚实谦恭。他们不说粗话、脏话，不骄横粗野，家里来了客人，无论地位高低，身份贵贱。“来的都是客”，都要请到正室火堂的贵宾座位上就坐。主人立即敬烟献茶，摆出水果、核桃、瓜子等热情款待，还要杀只鸡，煮上一圈猪膘肉，捧上新开坛的苏里玛酒。全家人柔声细语，让人在真诚的亲情中，忘却烦恼和忧伤。他们济人之难，助人为乐。村子里，无论谁家有了病痛灾难，红白喜事，都要前去探望，安慰，祝贺。泸沽湖又是歌舞的王国，歌颂母亲母爱，向往美好生活，表达男女恋情，大多婉转轻柔，情意绵绵。摩梭人自己和睦相处，同别的兄弟民族也和睦相处，据说当地治安情况良好，解放以来从未发生过情杀和械斗。

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期，地理环境对一个部落、氏族的生存、发展往往起决定性的影响。泸沽湖的特点是“高海拔”、“低纬度”，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又处在严密封闭的崇山峻岭之中，因此，摩梭人在两千年前到达这里之后，历史似乎停止了前进的脚步。尽管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的变迁，尽管这些变迁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若干痕迹，但仍然基本上保留了原始的形态，这是摩梭人之幸，还是不幸？

奇特的“阿肖”走婚

泸沽湖的魅力，主要不在它雄奇秀丽的山光水色，而在于摩梭人神秘的风俗民情，尤其是奇特的“阿肖”走婚制。

“阿肖”是摩梭人中有情爱关系的男女双方的互称，又称“肖波”。其特点是具有性爱关系的男女双方不娶不嫁，不组织双方的婚姻家庭，不承担夫妻的义务和责任，不共同生活，没有经济上的关系，仅仅保持建立在爱情上的‘走婚’关系。双方分

居母家，由男阿肖在夜间秘密或公开走访女阿肖。摩梭人称之为“色”或“色色”，意即“走”或“走走”。双方虽然建立了性爱关系，但都不是对方家庭中的成员，互相不受约束，也不太注重财富、地位和门第，惟以双方情感为取舍，但在选择时则比较注意对方的人品、相貌、才干等。在结交“阿肖”过程中，女方意愿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一般来说，成败往往取决于女方的感情。

摩梭人习俗，男孩和女孩在11—13岁行“成丁礼”，称为“穿裤子”、“穿裙子”，但男子要到17岁，女子要到15岁，方可结交阿肖，姨表和叔伯兄弟姊妹之间则禁止结交阿肖。建立阿肖关系比较自由，选择阿肖的形式也非常多，可以通过一起劳动建立感情，可以在转山转海唱歌跳舞时物色。双方认可、关系建立后，有些还要经过一段秘密走访偶居的初期阶段。最初的约会，多是避人耳目，悄悄进行。男子在夜深人静时，走到女阿肖家，按相约的暗号，或抛石子，或用烟斗敲门，等候中的女子闻声开门，将男阿肖引入卧室，而拂晓前，男子便匆匆离去，返回自己的母家。

经过一段秘密走访，男方要请一个与女方关系好的人履行一种叫“佐佐嘎”的仪式，意为互赠礼物。此人到女方家后，给女方母亲说明来意，母亲通常征求女儿的意见，如果同意，当即收下媒人带来的礼物，并回赠男方一条由女方亲自制作的麻布裤子或腰带。

履行“佐佐嘎”结交阿肖的男子，在首次正式走访女阿肖时，必须带上媒人或自己可以信赖的一个男朋友，并随身带上茶、糖或给女阿肖的衣裙等礼物。女方家中则给予盛情款待，并将男阿肖带来的糖、茶每样一点送给本村各户，或只送给自己的亲族，以此委婉地宣布她家女儿已有阿肖。入睡时，由女方母亲或姊妹将男阿肖引到女阿肖卧室，女

阿肖也可在自己的卧室内用烟酒招待男阿肖。男阿肖在走访时要回避女方兄弟或舅舅。因此，走访时均去得晚，归得早，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随便起来。

结交阿肖后，双方家庭即为“比子则黑”，即亲家。每逢节日，要互相送礼拜访，遇红白喜事要互相帮忙，对方家庭死了人，要去奔丧。男阿肖出门远行时，女方要送鸡、蛋、香肠、猪膘肉等，装在一至两个蔑制的食品盒内，谓之“打发男阿肖”，供其途中使用；男阿肖归来时，要给女方回赠衣物、茶、糖、首饰之类的礼品。这些礼品通常由共享食物的同路伙伴共同筹集。在农历十月杀猪祭祖时，习惯把猪的大肠小肠内装上大米、猪血、调料混合煮熟后互相赠送，以祭祀对方家庭的火塘神和祖先，供对方家庭成员享用。关系亲密的还互送做猪膘时刷过的猪腿。这种“比子则黑”的关系随着阿肖关系的建立而诞生，也随着阿肖关系的解除而消失。

女阿肖所生孩子一律随母而居，跟随母姓，由母亲、舅舅、姨母等共同抚养。女阿肖生小孩的第二天，女方家中要带上“巴舍巴哈”（即为小孩取名时向祖先供奉的食物）以及甜酒等到男阿肖家中道喜。男方家中也要请男方的母亲或姊妹带上丰厚的食物去看望女阿肖。第一胎孩子满月前夕，男阿肖要杀猪宰羊，到女阿肖家中举行隆重的“若哈舍”（满月酒）仪式，招待女方村内的男女老少，以示庆贺。

阿肖关系维持时间长短不一，因情而异。短则几天、几个月，长则几年、几十年，甚至终身。一般年轻时相对不稳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趋于稳定。根据维持时间的长短，可分为临时阿肖（一年以下）、短期阿肖（一至三年）和长期阿肖（三年以上）三种。多数阿肖走婚在邻近几个村内，少数到远达数十里之外，也有隔湖划船去的。男女阿肖一般不

会从一而终。无论男女，一生结交的阿肖，大多在数个以上，极少数也有多达十多个、数十个的。据盐沅县提供的资料，60年代中国科学院派往云南调查组的詹承绪等曾对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乡忠实、开坪两个乡18—50岁的426个摩梭人作过调查，共找阿肖2750人，平均每人找5.95人。其中274名女子共找阿肖1940人，人均7.08人；而188名男子共找阿肖810人，人均4.31人。当阿肖双方一旦感情淡漠、关系疏远而破裂时，阿肖关系就随之解除。阿肖关系的解除较为自由，不需要办什么手续。由于不涉及财产的划分、子女的归属等利益问题，所以阿肖很容易离异，离异也不会引起争执和纠纷。双方皆可处之泰然，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甚至能保持良好的一般朋友关系。因此也有不少离而复合的。

男女阿肖如果知道对方另找阿肖时，通常会给对方送一个包着火炭、辣椒、鸡毛的麻布小包，表示绝交或警告。对方如果想继续维持阿肖关系，则必须向送包者赔礼道歉，方可言归于好。如果不愿继续维持阿肖关系，则互不走访了事。

摩梭人的男女关系并不像喜欢猎奇的人想象的那样放荡、淫乱、轻狂，而是自然、单纯、真挚，不受经济或其他因素的束缚，哪怕男女赤身裸体，共浴一池，也无须设防，无所顾忌。位于泸沽湖西北数公里处，有一天露天温泉，名曰“瓦汝尔苦”，即瓦汝温泉。泉水由山脚岩缝间流出，流量很大，常年水温38℃，洞口处有容纳百人以上的天然池塘，供男女共浴。农闲时节，人们常骑了马，着盛装，带着鸡、蛋、肉、苏里玛酒等丰盛的食物，到温泉处露宿。浴前先美餐一顿，然后提一壶酒，边泡温泉边饮酒，一泡就是几个小时，池中热雾蒸腾，高唱低吟之声不绝于耳，一切疲劳和痛苦，烦恼和忧虑，全被蒸发、被洗涤、被放松，然后裹上衣服

美美地去睡一觉，如此反复几天，才打马而去。洗温泉既有保健治疗、娱乐消闲、营养补益的作用，也给不少有情男女互相结识、表达情意、赠送礼物以至建立阿肖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近些年来，温泉几经修建改造，已经完全隔离，男女共浴只是历史的回忆了。

摩梭人的婚姻形态，由于历史变迁，逐步趋向多样化。以阿肖走婚为主，又有阿肖同居、入赘和娶嫁婚。也就是说，既有母系家庭，又有母系父系并存家庭和父系家庭，甚至一家之内，也是几种婚姻形态并存。一般实行阿肖走婚制，都是母系家庭；少数男女阿肖，双方弟兄姊妹多，分出来同居不影响原有家庭生活，由双方家中协商，在男或女一方的村落建独立家庭，过同居生活，共同抚养孩子，这种家庭关系稳定，较少离异；入赘只发生于个别有女无男的家庭，也只入赘一个男子，其余姊妹仍实行走婚；而娶妻一般也只发生于有男无女的家庭，往往弟兄中只有一人娶妻，其他的仍走婚，纯父系家庭发展一直非常缓慢。1956年泸沽湖地区实行民主改革时估算，实行走婚的人数在70%以上（当时尚难作出确切统计）。1962年冬至1963年，詹承绪曾对泸沽湖沿岸和永宁平坝六个乡的964名女子和785名男子共1749人的婚姻状况作过比较细致的调查统计，结果如下：实行走婚的1285人（女730人、男555人），占73.5%；实行同居的182人，占10.4%；结婚的（包括入赘和娶妻）168人，占9.6%；无婚姻生活者114人，占6.5%。可见，阿肖走婚制仍然是摩梭人主要的婚姻形式，20年中变化不大。美国学者约瑟夫·爱弗·洛克博士于本世纪30年代由云南进入泸沽湖地区，在此居住了十多个春秋，回国后写过一部描述泸沽湖的专著《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80年代他逝世后，又立下遗嘱，让他的子女再渡

太平洋，不远万里把他的骨灰送来撒在泸沽湖中。

值得探索的难解之谜

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摩梭人大多愿意选择走婚而不采取其他婚姻形式？为什么不少比摩梭人生产力更低下、生活更贫困的少数民族都先后进入一夫一妻制，而摩梭人仍然实行走婚？为什么世界其他民族的母系血缘纽结和旧传统，在社会进化过程中无一例外地瓦解和崩溃，让位于新的模式，而唯独摩梭人母系血缘纽结和旧传统却能抵抗外界影响而保持至今？

我们的座谈访问就是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的，也对得到的材料作过分析研究，但始终难以找到满意的答案，由于我们对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问题非常生疏，所知甚少，只能就此次所见所闻，从摩梭人的历史发展变化过程中窥见一些端倪。

泸沽湖的摩梭人，自称为“纳”、“纳日”(NaZi)，相传发源于今青海河湟一带不断南迁的古西羌人。战国时期，在战乱中崛起的秦国不断壮大，羌人中有一支因畏惧秦国之威，率部南迁，远离众羌，从黄河、赐支河、湟河一带，逐步迁徙到赐支河曲数千里之处。这支“与众羌绝远”的古西羌人，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随居住区域不同，形成了牦牛种越西羌、白马种广汉羌、参狼种武都羌等。其中，在汉代被称为牦牛种越西羌的这一支，在迁徙到今四川甘孜南部的大渡河流域、金沙江以北后，又分两支，各成一种。自称“纳亨”的这一支，则从甘孜南部向东进入凉山州，尔后再迁入并定居于盐源、盐边和木里等县以及滇西北宁蒗等县，并在迁徙线路中，留下“摩梭沟”、“摩梭营”等古老的地名。大约在汉末，牦牛羌一称已被演化为摩西、么西、摩梭等。以上皆为同一民族的不同写法。至于

其演化过程,有关专家认为“摩”字源于牦牛羌的“牦”字,而“西”为“人”、“族”之意。从而顺理成章变为“么西、摩梭”。

摩梭人的婚姻制度何以能保存并得以延续,通过历史发展变迁的过程,结合有关历史文献,大体上可以认为:

(一)作为古西羌分支后裔的摩梭人,战国时期进入盐源一带定居后得到了生息繁衍。当中原地区进入封建社会初期,摩梭人仍然是原始母系氏族部落。汉代盐源归入中国版图,设置了郡县,中央政权对蛮夷之邦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头人接受封号,给皇帝纳贡而其民风民俗、生活方式、内部纠纷却不受干预。

(二)盐源有盐铁之利,贡税不断加重,终于引起反叛。《盐源县志》上有大量关于“平逆”的记载,说明历代封建统治者垂涎盐源这块好地方,念念不忘把“蛮夷”驱赶到更边远的“不毛之地去”。唐朝与土蕃、南诏之间多次战乱,使盐源一带的摩梭人受到摧毁性的打击,只有泸沽湖周围的一些分支,地处偏僻,几乎与世隔绝,得以侥幸保留下来。

(三)元明时期,极少受外界干扰的泸沽湖摩梭人又一次受到剧烈的冲击:一是忽必烈蒙古军队从盐源翻山越岭驻扎泸沽湖;二是喇嘛教的传入引起宗教上、精神生活上的变化;三是土司制度造成政治上的阶级对立和经济上的畸形停滞。但这一切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摩梭人根深蒂固的母系家庭传统。

(四)泸沽湖实行土司制度,是在母系社会基础上模仿汉族地区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现象,当地文化背景,经济形态以及人民的意识深处还滞留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模仿,不是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出现的,而是外界自上而下强加的,看似强大,基础脆弱。

(五)阿肖走婚制在泸沽湖地区一直绵延不绝,是由于内部和外部多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自然地理环境的优越(容易解决温饱)和封闭(较少受外界干扰)。土司、喇嘛僧侣及各族商人,为了达到个人占有妇女的目的,对这种上古流传下来的婚制加以利用、给予支持,也是其所以能保存下来并走上畸形发展道路的因素之一。

以上这些看法,是我们对当地同志和一些资料上的论点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后选定的,不一定妥当,也不能回答前面提出的难解之谜,只是提出供对此有兴趣者进行参考,继续作进一步的探索。这里再重复强调一句,时至20世纪90年代,泸沽湖摩梭人竟能保留着基本上没有变形的母系家庭,确实是中

国乃至世界上的一大奇迹,是人类远古历史的一块活化石,是世界级的重大文化遗产之一,值得认真解剖和探索。

泸沽湖摩梭人的母系家庭及其自成体系的文化习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人文景观之一,是人类上古历史的活化石,是很有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

因此,对泸沽湖的开发应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实行保护性的开发。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协同地方政府,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给予必要的投资,制订保护性的措施,防止盲目一哄而起。最好川滇两省采取联合行动,互相配合,使泸沽湖这颗高原之珠,更加璀璨明亮,光彩夺目。

(责任编辑 一尘)

· 广告 ·

欢迎订阅《金盾》杂志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82-359

《金盾》杂志是北京市公安局主办的公安法制、新闻纪实、综合通俗刊物。格调高雅,文字清新,可读性极强。它寓新闻纪实性、法律严肃性、知识趣味性、文学艺术性为一体,向您展示出一幅同各类犯罪活动作斗争的壮丽画卷,它将使您了解公安战士及政法战线广大干警的工作、生活和斗争事迹,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大案、要案作纪实性的独家报道。它以透视镜、探案寻踪、人生歧路、隐蔽战线、京城旧案、沉思录、金盾文苑等多种栏目满足各界读者的要求,它将使您在思想、道德、法律等多方面得到收益。《金盾》杂志在1998年从封面、版式到内容质量都将有大的改进,印刷、文章将更加精美,可读性增强,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杂志!

《金盾》杂志邮发代号:82-359,国内统一刊号·CN11-1381,月刊,每月6日出版。《金盾》大16开本,64页,彩色封面精印,单价4.60元,全年12期共55.20元。欢迎广大读者朋友、新老订户到当地邮局订阅。

发行部地址 北京崇文门东顺城街10号 邮政编码:100005

联系人:樊建英 田华 电话:65240931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珠市口分行正阳门分理处

帐号 144023-79

明清社会礼大于法造成的冤案

● 杜婉言

中国是文明古国，其法制的历史绵长而清晰，内涵丰富，自成体系，曾经长期走在世界法制史的前列，而被公认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中国古代的立法，自魏晋以后，都是表面上的明刑弼教与骨子里的以礼入法内外相维。所谓“法主刑辅”、“礼主刑辅”，或“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等说法，无不是用礼的感化约束与刑政的镇压相结合，用礼来防范和减少犯罪的发生，用刑来惩治犯罪，以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这是传统儒家文化中封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原则。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更是极其重视礼的作用，他强调“重礼者，盖为国之治道，非礼则无法。若专法而无礼，则又非法也”。所以在他亲自主持裁定的《明律》中，都贯穿着“重礼”的条文。《清律》以《明律》为蓝本，因此明清两代刑狱的以礼入法都很典型。以礼入法对统治者来说，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最好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它制造了大量冤狱。从明清时人的判牍、笔记中所载一些民事案件，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点。

至今保存完好，而传世极少的《酌辞》一书，是明末张肯堂任浚县知县时所处理的304个案件的判牍，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张肯堂是一位比较清正廉洁的官员，长于司法，后来官至右佥都御史，而他所判的案中，便有若干反映出

由于以礼入法而置妇女于冤屈之中的情况。

如“李邦兴”案：有个叫李国宝的男人病死，遗孀王氏“贫不能自存”，投靠兄长王金印。李国宝族人李邦兴诬告王氏挟带回娘家，要把她追回来卖。县官判定这是诬告。按律诬告应该反坐。但县官仍“断令王氏再醮之日，量给邦兴财礼银五两”。族人李从贵又再告，县官认为两人均是李国宝的远宗，但“以族谊较之，则从贵稍切”，于是将这五两银改判给李从贵。可见从法律上来看，那怕是远宗族人，亦可以合法地来收取寡妇的身价银。

又如“郭之玉”案：郭守禄把女儿郭之玉卖到妓院，陈邦杰买回作妾。陈邦杰死，郭家要把她领回，陈邦杰之孙不允，因而兴讼。县官判决郭氏与郭家“绝矣”，已不再有关系；她的再嫁应由陈家安排，但“孙鬻祖母于义亦乖”，庶祖母在家族中亦有尊卑名份，孙卖祖母不合礼，因而亦不合法，于是“则惟有官鬻之”，官府代卖妇女成为合理合法的。

这两个案例表明，在礼法一体下，妇女被父家或夫家、官府卖来卖去，都是合法的，自己没有人身自由，这是何等的冤屈。

以礼入法亦使家族中不同辈份的人在法律面前不平等。清朝著名诗人袁枚曾任江宁等地知县，他所著的《续新齐谐》一书中，记了这样一个案子。有个叫赵成的持刀逼奸了儿媳妇，

但在法律中有“干名犯义”条，她如果告家翁，便是犯了以卑幼告尊长的罪，虽然所告属实，也要被处以杖一百，徒三年。因此她不能去告，只好和丈夫赵友谅悄悄迁到外地一个亲戚牛廷辉那里去住。赵成知道后，便以探望牛廷辉为借口前往，还想强奸儿媳，而碍于赵友谅在旁难以下手。当他知道牛廷辉有20两银子后，便和孙四密谋，以均分牛的银子和把儿媳给孙为条件，让他杀死牛。孙四果然趁天黑持刀冲入牛家，赵友谅见势不好，逃到山洞藏起来。孙四、赵成杀了牛的全家然后去报案，说凶手是赵友谅。

缉拿凶手的捕快见赵友谅藏在山洞很可疑，便抓了他。严刑审讯时，赵友谅不忍指证父亲，又经不起打，便屈认了。衙役带赵成复讯，赵成以为案子就这样了结了，得意忘形地边走边唱。儿媳见到了，骂他杀人嫁祸，赵成在事实面前无法抵赖，没有作声。衙役把这情况报了官，赵成在刑讯下终于招认了罪行，案情得以大白。

按法律，杀一家五口要由犯人一家五人抵命。按察使和抚台商议，觉得赵友谅值得同情，于是上报案情时另加了对案件源起的详细说明。结果皇帝下旨：赵友谅值得怜悯，可以免死。但赵成罪大恶极，不能容他有后代。因此判赵成凌迟处死，而将赵友谅施以宫刑，阉割去生殖器再充军黑龙江。

赵友谅充军是出于家族株连，而被阉割，则因为从礼上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让犯人有后代，这是极重的污辱与惩处。为了惩处赵成，而合法地阉割了本来就是受害者的赵友谅，这真是冤哉枉也！

《庸闲斋笔记》是曾任江苏道员的陈其元“追念平生旧闻及所经历目睹事”的笔记，记的是道光、咸丰时事。其中记的父迫孝子顶凶一案，更是人间惨剧。

清代，福建富户杀人后，往往出重金募贫民代之偿命，称为“宰白鸭”。陈其元的父亲在省级司法部门工作时，曾审了这样一起凶杀案。正犯才16岁，年幼文弱，而死者伤有十几处，看来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但审讯时，不待拷打，

这青年的供词便滔滔不绝，与报上来的材料一点不差。再让他复述一遍，亦一字不错，显然对供词是背熟了的，再三驳斥盘问，他绝不改口。后来经过对他多次开导，他才哭诉是冤枉。于是把案驳回县里再审。

不久，县又按前次的审讯结果上报。这次省里再提审犯人，他却再也不肯翻供。有关官员便认为陈其元父亲迂腐，改派其他官员复审。结果依照县的审处意见上报。及至提刑按察使升堂复审，犯人仍照前供认杀人不讳。问他：“你很年轻，怎能下这毒手？”回答说：“恨极了。”

案件判定以后，陈其元父亲问他为什么这样固执，他痛哭流涕地说：“押回县以后，县官对我的刑讯更加残酷，父母又来相骂，说‘卖你的钱我们已经用尽，你这样翻供不是害父母吗？如果你被释出狱，我们一定要处死你’。我想，进退都是死，不如顺从父母而死吧”。一个16岁的青年，就这样被贪财的父母用法的力量逼死了。

这青年说的“进退皆死”并非夸张或过虑之词，因为法确保尊卑有别的礼，“不孝”是极不符合儒家礼法的、破坏封建纲常的行为，在律条中，它与谋反等危害封建统治的不忠行为同属于“十恶”。犯“十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赦免。法律中又有“骂祖父母父母”条、“殴祖父母父母”条，规定凡骂祖父母父母者，只要祖父母或父母亲告，则处以绞刑。凡子孙殴打祖父母父母者，皆斩。子孙若违犯教令，受祖父母父母“依法决罚，邂逅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因为从封建伦常来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当儿孙的只能“有顺无违”，有违就是非礼，也就是犯了法。这样儿子完全可以被父母以打骂为借口，把儿子告官依法处死，或以不服管教为名，把儿子直接打死而不被追究。这样致死的儿子，自然也都是冤案。

上述几例，仅是从礼法维护封建伦常造成冤狱的角度，揭示以礼入法为害之一斑。其它因贵贱不同，贫富不等，男女有别的“礼”，以及以礼为名与政治胶结在一起而造成的冤狱，更是不绝于书。这里限于篇幅，就不涉及了。

（责任编辑 赵友慈）

炎黄春秋



1991年陈平(左)与老领导郑天翔在交谈



摩梭人的一家

九旬重新入党的传奇老人傅柏翠

邓小平授意创办《思想战线》

被“四人帮”扼杀经过

解放前夕《闯王进京》演出回忆

摩梭人母系家族的待解之谜

明清社会礼大于法造成的冤案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邮发代号: 82 — 507

订价: 4.00元

零售价: 5.00元